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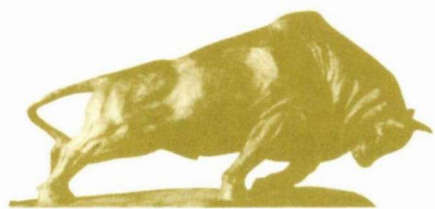
XIZHONGXUN  
ZHUZHENG  
GUANGDONG

中共党史出版社

习仲勋

主政广东





XIZHONGXUN  
ZHUSHENG  
GUANGDONG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习仲勋

主政广东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习仲勋主政广东/《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7 (2011.10重印)

ISBN 978-7-80199-752-4

I. 习… II. 习… III. 习仲勋 (1913-2002) —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2693 号

---

### 书 名: 习仲勋主政广东

---

编 著: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责任编辑: 吴 江

封面设计: 黎国泰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cbs.com](http://www.dsc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00千字

印 数: 8001—11000册

版 次: 200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4次印刷

ISBN 978-7-80199-752-4

定 价: 40.00元

---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687

#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

## 顾 问

张德江 刘玉浦 任仲夷 林 若 吴南生 王全国  
杨应彬 方 苞 梁广大 张汉青 张勋甫

## 编 委 会

主 任：蔡东士  
副 主 任：朱小丹 肖志恒 陈俊凤  
成 员：谭一鸣 蒋 斌 陈弘君 杨兴锋 张惠建  
张平安

## 编写组成员

卢 荻 陈宪宇 范向群 刘仁玉 丁晋清 陈江帆  
周 珺 张 凌

## 执 笔

卢 荻 陈宪宇 周 珺



习仲勋在广东

# 序

2004年2月，习仲勋同志夫人齐心同志致信给我，反映习仲勋系列丛书编撰情况，希望广东省委支持习仲勋传记下卷广东部分的编撰工作。4月1日，我在珠海会见齐心同志时，她再次谈起此事，我表示大力支持习仲勋传记的编写工作。为将这项工作抓落实，我提出以下要求：一、省委组织习仲勋同志传记(广东部分)编委会，请省委副书记蔡东士同志牵头，有关老同志当顾问，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档案馆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为成员，迅速成立编写组，尽快提出方案，收集资料，拟出提纲，着手编写。二、整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的大事记，附在传记后面。三、认真收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的录音、录像，并制成音像光盘。

同年4月15日，蔡东士同志主持召开编撰《习仲勋传》(广东部分)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以及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档案馆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编撰《习仲勋传》(广东部分)的意义，落实了任务。

习仲勋同志是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广东工作期间，领导全省人民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为增强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齐心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并带领全省人民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人文地缘优势，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广东应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客观、全面、



翔实、生动地写好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期间的传记。

编写组的同志不辞辛劳，广泛征集史料，采访有关老同志，于2005年7月写出初稿，请有关领导和老同志审阅。随后，又作多次修改，最终完稿。

《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地回顾了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两年多的工作历程，全面地展示了当年历史演进的趋势和特点，客观地反映了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革命精神和革命胆略，以及对国家、民族走过的这段重要历史道路进行的深刻思考。读后令人深受感动、深受启发、深受教育。该书对广东广大领导干部提高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高执政能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编写组同志采访了许多与习仲勋一起共事的亲身经历者和当事人，引用大量丰富的文献档案，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将传主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及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紧密相扣，具有很强的历史感。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说服力强。语言也较为准确简练平实。不但是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特别是广东改革开放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而且还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可以使广大青年具体了解广东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曲折历程，有利于青年一代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弘扬前辈的革命精神，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广东人民不会忘记习仲勋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2006年12月16日

## 目 录

序 .....	张德江
<b>第一章 奉命南下 主政广东</b> .....	1
一、《刘志丹》小说冤案 .....	1
二、重新出山 .....	14
三、南下主政广东 .....	18
<b>第二章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b> .....	26
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26
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补课活动 .....	37
<b>第三章 开展整风运动</b> .....	48
一、省委常委整风 .....	48
二、整风运动在全省铺开 .....	56
三、整风的成效 .....	64
<b>第四章 标本兼治 解决“偷渡外逃”问题</b> .....	68
一、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	68
二、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	76
三、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	83
四、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	87





<b>第五章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b> .....	105
一、粤东之行 .....	105
二、粤西、粤北之行 .....	115
三、海南之行 .....	121
<b>第六章 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b> .....	126
一、书记挂帅，大办农业 .....	126
二、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	131
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134
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	144
<b>第七章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b> .....	147
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	147
二、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	160
<b>第八章 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b> .....	164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	164
二、帮助基层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	169
三、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	175
<b>第九章 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各项政策</b> .....	179
一、拨乱反正，加快落实政策步伐 .....	179
二、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	193
三、“李一哲”案件平反始末 .....	199
四、复查平反“反地方主义”等案件 .....	215
<b>第十章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b> .....	227
一、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	227

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酝酿 .....	233
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提出 .....	240
四、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	249
五、创办经济特区 .....	264
<b>第十一章 初步开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b>	<b>271</b>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	271
二、价格与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 .....	279
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广“清远经验” .....	284
四、计划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 .....	294
<b>第十二章 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b>	<b>298</b>
一、访问澳大利亚 .....	298
二、访问香港、澳门 .....	305
三、访问美国 .....	310
<b>习仲勋主政广东大事年表（1978—1980） .....</b>	<b>315</b>
<b>后 记 .....</b>	<b>331</b>

# 第一章 奉命南下 主政广东

## 一、《刘志丹》小说冤案

1978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古老的北京城洋溢着一派盎然春意。习仲勋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对古都的深情眷恋和对新中国一代伟人斩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再度出现在首都的街道上。当月，他从中央组织部获悉，中共中央已决定派他南下主政广东。尽管这一职务与他当年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和国务院副总理相差甚远，但在饱经忧患、与世隔绝16年之后，能重登政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夫复何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习仲勋是黄土高原养育的一个热血硬汉，是西北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与刘志丹等人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领导了绥德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的成绩。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他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和彭德怀、贺龙转战西北战场，“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sup>①</sup>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



建国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的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9月，他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他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工作了十年左右，朝夕相处，耳提面命，亲聆教诲，获益良多”。<sup>①</sup>他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sup>②</sup>正当习仲勋大有作为的时候，1962年一场突然飞来的横祸，却把他打进了人生的深渊。

事情追溯到几年之前。1956年，工人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计划，他们看过刘景范、李建彤写的回忆刘志丹的短文，知道他们是革命烈士刘志丹的弟弟和弟媳，于是就约请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长篇小说。起初，李建彤由于各种原因不肯答应，直到出版社答应派人协助后才接受了约稿。当时，习仲勋并不知道此事。李建彤为了写这部小说，先后走访了300多位原陕西省委和陕甘苏区以及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老同志，还查阅和收集大量的史料。后来李建彤登门拜访了习仲勋，提出工人出版社约她写刘志丹之事，以便让刘志丹的光辉事迹流传千古。习仲勋表示可以写一些刘志丹革命活动的片断。<sup>③</sup>

刘志丹是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是习仲勋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曾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开展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其英名曾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他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抵达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考进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

<sup>①</sup>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

<sup>②</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

<sup>③</sup> 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页。

（即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回西北开展革命活动。历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副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西北军委会主席兼红军前委总指挥，中共陕甘边军委主席、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36年4月，刘志丹率部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泽东痛失良将，十分悲痛，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sup>①</sup>

习仲勋何尝不想让亲密战友刘志丹的英名流芳百世。但是，作为西北幸存的高层领导人，习仲勋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利弊得失。西北党的历史问题相当复杂，长期争议不休。特别是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中一些史实及纷争，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着不同意见。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领导与任弼时的直接主持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一个重大是非问题。”<sup>②</sup>这次会议虽则就过去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但问题仍未根本解决。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传记小说，势必要涉及西北当年许多有关人士和复杂的历史问题，写不好就会容易重新引起纠纷。而李建彤本人并不熟悉当时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又缺乏一定的文学修养，要写好这一重大题材的历史小说谈何容易。习仲勋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原陕北领导人高岗的问题。1953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高岗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窥测形势，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机会到了。他们攻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进行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央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

<sup>①</sup>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习仲勋文选》，第294页。

<sup>②</sup> 孙作宾、吕剑人：《实事求是 忠诚革命》，《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写历史小说《刘志丹》，必然要写到高岗在西北的一些活动。这是一个“雷区”，稍一不慎，踩着“地雷”，将有不测之祸。这就是习仲勋再三犹豫，劝李建彤不要贸然动笔的原因。

习仲勋对写《刘志丹》小说一直持慎重态度，但刘景范、李建彤决心已定，而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向习仲勋转达了“刘景范、李建彤的话”，多次劝习仲勋支持写小说《刘志丹》。刘景范还对习仲勋说：“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sup>①</sup>话说到这种程度，习仲勋如再劝阻，可能会引起战友的误会，于是他改变了初衷，要李建彤写作的时候对高岗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避而远之。

李建彤撰写的《刘志丹》初稿、二稿是传记体，1959年冬第三稿改为小说体裁，曾印成稿样，向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原陕甘根据地老同志征求意见。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不久，全国正进行“反右倾”运动，政治空气异常紧张。习仲勋看过小说之后，深感小说与当时的环境氛围不相适应，劝李建彤谨慎从事。习仲勋对李建彤说：写这样大部头的小说可不是闹着玩的，牵涉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涉及有关西北党史上的一些问题，处理不好会引起意见纠纷，如果写一些片断的革命回忆岂不是更好。李建彤不同意习仲勋的意见，表示要试试看。随后习仲勋又对刘景范说：你最好劝说李建彤不要写《刘志丹》小说，她不了解这段历史情况，不一定能写好。加上你是刘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爱人，就是写得很好，那些对历史有意见的人也不一定会放过不理。高岗反党，变坏了，写这样一部小说不涉及他是很难的。我很犯愁，难道你就没有顾虑吗？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无道理？刘景范答应回去劝说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习仲勋又把刘景范找来，希望他再劝说李建彤最好不要写这本书。刘景范表示：她要写，我也没办法。<sup>②</sup>到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四稿清样送到了习仲勋

①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第315页。

② 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498页。

那里。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田方帮助看看。田方读后，觉得许多情节都是非常感人的，只提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在李建彤的再三催促下，习仲勋在百忙中先后两次召集作者、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习仲勋请他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外，还想和马锡五来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写小说《刘志丹》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要求小说“写整个一个时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高屋建瓴地指出：“通过刘志丹，这是革命领袖人物，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大错（注：记录稿此处含意不明，似指刘志丹在陕甘的活动），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sup>①</sup>习仲勋强调小说要把刘志丹这个革命领袖人物放到整个一个时代去写，要体现毛主席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要根据西北党史把陕甘苏区写成坚持正确路线的缩影，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习仲勋还谈了一些史实，以纠正稿样欠准确的地方。有一处讲到高岗当时的主张是对的，习仲勋立即指出，“他那是历史，但书中不要写他。”<sup>②</sup>习仲勋的意思很明确，就是书中不要写高岗，不可授人以柄。

1962年夏天，李建彤根据广泛收集的意见，修改出小说上半部的第五稿，出版社印出送审样书，送请有关领导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审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征得作者同意后，开始连载小说部分章节。1962年7月，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送审样书后，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否定的意见。他指出，写《刘

<sup>①</sup> 引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sup>②</sup> 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498页。



志丹》，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性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sup>①</sup>你的文章有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同意出版。作为西北出身的老干部阎红彦，一直对当时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决议持不同看法。因此，他以当事人的身份，提出小说不宜发表。

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并研究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但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这种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为会议定下了“左”的基调，使会议用许多时间和精力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

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发表《刘志丹》小说部分章节，他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领导人提出停止发表，一面于8月17日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阎红彦建议将这本书发给参加北戴河工作会议的西北同志看看，并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一次座谈，谈清楚这本书上所涉及到的一些原则问题。阎红彦还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认为小说反映的“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目的不纯，有问题”。<sup>②</sup>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央宣传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发表《刘志丹》（《人民文学》杂志原拟发表部分章节，接通知后停发），并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康生承认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也没有做任何调查，就加油添醋地向毛泽东报告说：《刘志丹》这本小说有问题，替高岗翻案，把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不

<sup>①</sup> 引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sup>②</sup>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习乾平：《薄一波谈“炉火纯青”与“刘志丹小说冤案”内幕》，《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页。



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一些人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等等。<sup>①</sup>问题的性质由此而发生变化。

当时，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打成“反党集团”代表人物的彭德怀，在这年6月16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封很长的信，即所谓“八万言书”，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他不承认自己有“阴谋篡党”问题，不存在“彭德怀、高岗联盟问题”，也没有“里通外国”问题。8月22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两天，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处理。他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问题。这两封信被认为是彭德怀闹翻案，是向党的新进攻。因此，9月6日、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6个小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的“翻案风”。康生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他阴阳怪气地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整个事件很清楚，就是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康生在小组会上向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sup>②</sup>上有头目，下有手脚。你们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有在后台摇羽毛扇的，有在前台冲锋陷阵的，你们是想翻天哩！”<sup>③</sup>康生等人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习仲勋即成为批判彭德怀“翻案风”中另一个目标。

在康生等人的欺骗和煽动下，各组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一些人也向习仲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各种莫须有的大帽

<sup>①</sup> 习乾平：《薄一波谈“炉火纯青”与“刘志丹小说冤案”内幕》，《怀念习仲勋》，第440页。

<sup>②</sup> 贾拓夫出身于西北，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下放到抚顺电厂任厂长。

<sup>③</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共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30页；张树德：《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册，第348页。



子，一齐向他抛来。他们无限上纲上线，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并且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sup>①</sup>

康生一伙指控《刘志丹》一书是“大毒草”，并罗列了四条罪名：一是说《刘志丹》小说伪造党的历史，书中把陕甘边根据地写成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二是《刘志丹》一书中把刘志丹思想写的比毛泽东思想还高，企图以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而指导全党；三是《刘志丹》小说中人物“罗炎”是高岗的化身，因而为高岗翻案；四是《刘志丹》小说中的人物“许钟”的原型就是习仲勋，因而“吹捧习仲勋”，抬高习仲勋，企图阴谋篡党夺权。<sup>②</sup>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据原秘书张志功回忆，康生一伙指控习仲勋的几条罪状中，“要害是替高岗翻案，主要是这一条，就在政治上把习书记逼上了绝路，这真是颠倒是非，莫此为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sup>③</sup>

习仲勋据实力争，但一时无法向与会者说明事实真相，只好向周恩来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sup>④</sup>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继北戴河会议之后，再一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在毛泽东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据彭真、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6页。

<sup>②</sup> 习乾平：《薄一波谈“炉火纯青”与“刘志丹小说冤案”内幕》，《怀念习仲勋》，第438页。

<sup>③</sup> 张志功：《在习老身边工作20年》，《习仲勋革命生涯》，第423页。

<sup>④</sup>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杨尚昆后来回忆，是因为康生在会上提出《刘志丹》等问题，毛泽东才这样讲的。彭真还记得，毛泽东还说过，“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康生发现的”。<sup>①</sup>接着，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一个理论观点：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sup>②</sup>“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sup>③</sup>9月27日，全会决定设立两个审查委员会，分别对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

中央成立的以康生为组长，由20人组成的“清查习仲勋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审查，于1963年5月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了刘志丹思想”，“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因而“是一部伪造的西北党史”，“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后来，审查小组基本上停止了活动，“审查报告”没有形成正式文件。<sup>④</sup>

1966年5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又写了一份《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说这部小说是“彻头彻尾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纲领，是习仲勋图谋篡党篡国的纲领”；“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写《刘志丹》一书是一个重大反党阴谋，是企图篡党篡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②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5页。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笔者是李建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审查报告”也没有形成正式文件。<sup>①</sup>

在康生的指使下，“该书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均被指责为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sup>②</sup>，受到严重摧残。因习仲勋和小说《刘志丹》一案而受到迫害的西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多达300多人，受到株连的一般干部和群众达万余人。

经过三年审查，1965年秋，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习仲勋谈话，宣布中央决定他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12月，习仲勋离开北京，到了洛阳。

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习仲勋在劫难逃。1967年1月，他被揪到西安批斗。周恩来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批斗的照片，严肃地批评造反派：“我们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当造反派代表问起如何处理习仲勋时，周恩来语义双关地说：

“你们抓到一个习仲勋，以为如获至宝，那是一个刺猬！”接着，周恩来下令以军事管制形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sup>③</sup>

但康生、林彪、“四人帮”一伙对习仲勋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他们千方百计想从习仲勋身上捞到整周恩来的材料，但都被习仲勋顶了回去。习仲勋连遭批斗，身体有些支持不住，不得不写信给周恩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采取特殊保护的形式，用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1973年冬，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致信周恩来，提出探望自己丈夫的要求。经周恩来批准，习仲勋与世隔绝多年，终于与齐心及孩子见面。见到亲人，他悲喜交加，老泪纵横。刘景范也于1968年5月被逮捕。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刘志丹》小说案做了批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sup>④</sup>但康生一伙并未执行。直到1975年5月，习仲勋

<sup>①</sup>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sup>②</sup> 田方：《人民的忠实勤务员》，《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7页。

<sup>③</sup> 习仲勋：《永远难忘的怀念》，《习仲勋文选》，第315页。

<sup>④</sup> 引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再次写信给毛泽东。事隔两天，专案组负责人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并说明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所谓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那本书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习仲勋终于离开铁窗，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住在一间仅有24平方米房子里，但组织生活一直没有恢复。在这样的情况下，习仲勋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国家、我们党内出了坏人，这只是暂时现象，正气一定要战胜邪恶，真理永远是真理，我虽然已62岁了，我还要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出贡献。”<sup>①</sup>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继续追究此案，1977年5月17日作的关于刘景范的“审查结论”，仍说刘“一九六二年又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sup>②</sup>嗣后，随着对历史的反思，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在习仲勋的一再强烈要求下，中央重新复查此案。1978年，中央组织部将《刘志丹》小说书稿交给文化部党组组织文艺研究院审核提出意见。1978年10月，文艺研究院提出审核报告，认为：《刘志丹》是以刘志丹的革命事迹为题材写成的传记长篇小说，总的看，这部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过去把这部小说看作反党毒草，据说有四点理由：1.为高岗翻案；2.剽窃毛泽东思想；3.把陕北根据地写得太多，和中央分庭抗礼；4.美化习仲勋。关于第一点和第四点，我们在阅读中看不出有这样的问题。至于二、三点，我们感到也难成立。书中在叙述刘志丹为掌握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斗争时，经常提到毛泽东在南方的革命行动，明确提出要学习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小说一再提出，刘志丹主张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越是遭到挫折，越感到毛泽东坚持的革命道路正确。所谓剽窃毛泽东思想，是说不通的，更看不出“陕北救中央”的问题。把《刘志丹》这部小说定作毒草的四点理由是和小说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sup>③</sup>

① 马文瑞、张邦英：《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4日。

② 引自《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③ 文化部文艺研究院：《关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审核报告》，1978年10月20日。



1978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文化部党组将这个审核报告转报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根据邓小平批示，对《刘志丹》小说案进行了复查。1979年7月14日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明确指出：

经过复查，我们认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报告提出，康生等诬指写《刘志丹》是“习仲勋秘密反党集团”的“阴谋反党活动”的三条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是工人出版社的约稿，并非康生说的“蓄谋已久”，同习仲勋没有关系。第二，习仲勋只是在1960年向作者和工人出版社的同志谈了两次他对《刘志丹》稿样的意见，除此，对小说创作没有过问过。康生说习仲勋是此书主谋、“第一作者”，是没有根据的。习仲勋的两次谈话内容也是正确的。康生说习仲勋企图在小说中把陕甘写成“中国革命的正统”和“中心”，作为其“篡党篡国的纲领”，纯属诬陷不实之词。第三，习仲勋等同志在被审查时，向党说明真相，不承认康生强加的罪名，这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也是党章所保障的党员权利，更不应以此定罪。根据以上复查意见，《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这些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无辜受到株连的同志，都应给予平反。<sup>①</sup>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发

<sup>①</sup>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小说〈刘志丹〉案件的复查意见》，1979年6月。

[1979] 53号文件。中共中央指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1980年2月，中央发出通知，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sup>①</sup>

#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9〕53号



## 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组织部 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现将这个报告及其附件转发给你们。报告中提出的具体建议，请有关单位落实。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九年八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发〔1979〕53号文件影印件。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1980年2月25日。



## 二、重新出山

习仲勋因《刘志丹》小说案被流放到河南省洛阳市，饱受磨难。光阴荏苒，人世沧桑，习仲勋渴望沉冤昭雪、重新复出的梦想却依然无法成为现实。尽管蒙冤受屈的日子难熬，但习仲勋毫不气馁，他历艰难而矢志不渝，处逆境而斗志弥坚。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冤案终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随着潮起潮落，秋月春风，历史进入1976年。就中国而言，这是大悲大喜之年。悲的是，春去秋来，共和国的三位缔造者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与世长辞，邓小平第三次被错误打倒，唐山发生中外罕见的大地震。喜的是，金秋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出，神州大地，普天同庆，山河重光。11月15日，习仲勋在洛阳致信中央领导人，热烈庆贺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表示“决心养好身体，更好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无条件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党，力争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信末署名为“一个仍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毛主席的党员习仲勋”。<sup>①</sup>习仲勋这封信流露出三方面的含意：一是祝贺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二是渴望重新出山，三是希望恢复党籍。

中国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百废待兴。这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成为全党全国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

习仲勋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沉冤能够尽快洗雪。但是，令他感到失望的是，由于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继续“左”的错误，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

<sup>①</sup> 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07页。



循”）的错误方针，这就使拨乱反正和国民经济呈现步履维艰、徘徊不前的局面。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习仲勋反党一案”是经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个案不能翻。这无疑给习仲勋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因此，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向中央提出个人申诉。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邓小平再次复出，恢复被撤销的一切职务。同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习仲勋看到了希望。8月21日，他提起笔来，分别给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写信，述说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特别是被监护以后的状况，恳切请求党中央重新认真审查他的党籍问题，作出结论，早日恢复组织生活。<sup>①</sup>

8月24日，习仲勋又给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并党中央写信，一方面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大和十一届一中全会胜利召开，另一方面再次请求中央审查他的问题，“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sup>②</sup>并表示听从中央的安排，为党做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及其家属看见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恢复工作，也为习仲勋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尚未能得到解决而心急如焚。齐心在女儿桥桥的陪伴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多次找过王震。结果，王震第一个出面为习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随后，齐心还找到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和叶剑英副主席。

1978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sup>③</sup>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

<sup>①</sup> 参见范民新：《16年的苦难历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07—508页。

<sup>②</sup> 齐心：《我与仲勋相伴55个春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62页。

<sup>③</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7页。



领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迅速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齐心到中央组织部找胡耀邦申诉。胡耀邦当时身兼数职，工作非常繁忙。当他听说齐心来访时，当即接见，专门听取了齐心的意见。他关切地询问了习仲勋在洛阳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对习仲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到的种种磨难深表同情。他当即表示说，凡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昭雪，不论谁说的，谁定的。习仲勋同志的案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又说，现在是人民赋予我们权力的时候，但也是容易出错的时候，要大胆果断，也要谦虚谨慎，遵守党规党法，才能把事情办好。胡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习仲勋。而叶剑英则是坚决支持习仲勋出来工作。<sup>①</sup>当齐心把叶剑英和胡耀邦接见的情况告诉习仲勋时，长期笼罩在习仲勋头顶上的阴霾才一扫而空，露出希望的曙光。

1978年初春，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的习仲勋否极泰来，其人生历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指定由省委书记王辉负责，速将在河南的习仲勋和刘晓接回省委并护送进京。王辉即派省委组织部和保卫处有关人员当天晚上赶赴洛阳去接习仲勋，要求他们必须做到安全和保密，并指定时间坐哪趟火车，他到火车站迎接习仲勋。

习仲勋被中央特邀回京，他凭多年的政治经验，意识到康生精心策划的阴谋虽然得逞一时，但最终经不住历史的检验。这表明中共中央将要对《刘志丹》小说案作出公正的评价，推翻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所谓“习仲勋反党一案”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sup>②</sup>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深受煎熬的习仲勋苦苦等待了整整16年。

习仲勋要离开洛阳回京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开。

2月22日凌晨，习仲勋乘坐火车离开古都洛阳，天亮时到达河南省会郑州。在车站站台上，他受到王辉等人的热烈欢迎。习仲勋一下

<sup>①</sup> 参见齐心：《我与仲勋相伴55个春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63页。

<sup>②</sup> 参见齐心：《仲勋 我用微笑送你远行》，《中华儿女》2002年第6期。

火车，就情不自禁地与王辉紧紧拥抱，他激动万分地说：“这是我16年来第一次和人拥抱，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王辉说：

“习副总理，我受委托来欢迎您。在洛阳本来想见你的，但未见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您老可好？”这时，习仲勋眼含热泪，由王辉搀扶着走上汽车。到了中州宾馆，习仲勋与王辉一起吃了早点。按照中央的通知，习仲勋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白天则安排在市区的中州宾馆休息。习仲勋说：“王辉同志，我不需要休息了，我建议你能带我坐车在郑州大街小巷转一转，而后我们俩人好好谈谈心。我和外界完全隔断联系多年了，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在王辉的陪同下，习仲勋游览了市区。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郑州，虽然显得有点残旧破败，但已绽露出复苏的生机，在还弥漫着春节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下，涌动着澎湃的春潮。习仲勋先到百货公司，他在里面大约转了40分钟出来，又到“二七”纪念塔，拾级而上，在第14层塔顶上举目远眺，观望四方，郑州城景色一览无遗。习仲勋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感慨地说：“‘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又对王辉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烈士，没有烈士，哪有今天的新中国啊！”接着，他们又驱车到了劳动公园。习仲勋记忆力很强，深情地缅怀说：这里过去叫壁沙岗，劳动公园是冯玉祥将军为阵亡烈士修的，掩埋着不少进步人士，也有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共产党员，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sup>①</sup>习仲勋还没有正式复出，就凭吊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而献身的革命烈士，对长眠于中州大地的先烈寄托着无限的怀念与哀思。随后，他们又转到金水河上，在金水小吃店，王辉请习仲勋吃了郑州名吃窝子面。回到中州宾馆，习仲勋向王辉谈起他被关在一间小房子，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的情况。转圈开始从1数到10000，而后再退着走，从10000数到9990、9980到1。他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共产党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党中央对我总会有个正

<sup>①</sup> 王辉：《拥抱与热泪》，《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28—529页；贾巨川：《习仲勋二下洛阳得解放》，《中华儿女》2001年第12期。



确结论的。”王辉被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所打动。稍过片刻，习仲勋问王辉：“中央要我进京干什么？”王辉说：“你进京一定是吉，一定要你再工作。”习仲勋说：“这是我希望的，但也准备养老。”王辉请省军区尚坦司令员和省委组织部刘鸿文部长与习仲勋共聚晚餐，大家祝他身体健康，早日实现他的夙愿。习仲勋说：“感谢大家，愿我们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sup>①</sup>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习仲勋与王辉等人一一握手告别，登上北上列车。翌日，习仲勋抵达北京，他才知道被特邀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会议。

### 三、南下主政广东

2月24日至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sup>②</sup>这次会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对叶剑英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谦虚宽厚，生活节俭朴实，也一直是仰慕的。<sup>③</sup>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叶剑英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习仲勋后来回忆说：

<sup>①</sup> 王辉：《拥抱与热泪》，《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30页。

<sup>②</sup> 齐心：《仲勋 我用微笑送你远行》，《中华儿女》2002年第6期。

<sup>③</sup> 参见习仲勋：《痛悼敬爱的叶帅》，《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1日。

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  
我。他见我身体很好，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我要  
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他那宽广的胸怀、恢宏的气度，  
对同志亲切、谦和、真挚和深情厚意，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的呢！<sup>①</sup>

习仲勋激动万分地望着年届八十的叶剑英，由衷地祝贺他在党  
和国家关键时刻坚决果敢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他所起的决定  
性作用，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记功碑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韦国清身兼  
数职，已经调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兼任  
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在北  
京政务、军务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是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  
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  
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  
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  
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  
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sup>②</sup>深感责任重大。在习仲勋到广东之  
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  
接见了，对他到广东工作寄予很大的希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  
具有重大的意义。<sup>③</sup>习仲勋向中央表态，谦逊地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  
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sup>④</sup>时隔多年，习仲勋

<sup>①</sup> 习仲勋：《痛悼敬爱的叶帅》，《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1日。

<sup>②</sup> 参见齐心：《我与仲勋相伴55个春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63页。

<sup>③</sup> 《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sup>④</sup> 陈铁：《沉重悼念习老》，《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8页。



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sup>①</sup>党中央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他以充分信任和热情鼓励，使他深为感动，受到很大的鼓舞。

习仲勋接到中央的任命之后，便开始做赴任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在北京没有住处，临时住在全国总工会招待所，住宿条件较差，每个房间只能放下两张小床，他对此安之若素。由于习仲勋老友、老部下很多，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看望和送行，有时甚至凌晨两三点钟还有人前来探望。<sup>②</sup>习仲勋热情接待他们，与他们互诉衷情。

据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代表省委参加这次会议。当时我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都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有一天，韦国清对我说：“等一会开完会后还有一个小会，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有事找我们谈一谈。”会后，我和韦国清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休息室，胡耀邦已经来了。他说：“中央决定让习仲勋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这次是叶（剑英）帅提名，大家也都同意。”当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韦国清，他准备回广州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习仲勋的职务也要在会议上通过。韦国清对我说：“那与习仲勋同志联系这事由你去办吧。”我说：“那好啊。”

我原来也在河南工作，直到1975年才离开。当时习仲勋也在河南，我想通过张策同志<sup>③</sup>找到习仲勋同志，他们以前是同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的讲话》，1987年2月15、19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1987）》上，第262—263页。

<sup>②</sup> 参见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第171页。

<sup>③</sup> 张策，原在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党支部，1978年初“解放”复出，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事，张策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陕南特委书记，习仲勋是关中特委书记。我和张策比较熟，他又和习仲勋很熟，所以请他带我去找。习仲勋刚刚复出，住在北京全国总工会招待所里，环境不是很好，周围乱乱的像集市一样。一到招待所，张策就大声说：“小伙子，我带人来找你啦！”因为两人很熟，他比习大，就叫他小伙子。习仲勋已经知道他要来广州了，就和我们一起商量搬家和来粤具体时间等相关事宜。<sup>①</sup>

因为吴南生要赶着返回广州参加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以他吩咐省委派去北京专程迎接习仲勋的省委办公厅陈仲旋等人留在北京，等候陪同习仲勋前来广东。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图为他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

习仲勋复出时，他在陕北时的老部下黄静波也刚出狱不久，黄是因为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表了不同意见、讲了自己的看法，被当作“反党言论”而被投入监狱的。后经王震的营救和努力

<sup>①</sup> 访问吴南生谈话纪录，2004年7月7日。



才无罪释放。中央决定让他到吉林省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不几天，习仲勋去找黄静波说，中央决定让他去广东工作，他对黄静波过去比较了解，认为他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希望和他一起去广东。黄静波对他说：我是王震同志帮助出狱的，王震同志对我分配工作有安排，要我跟你去广东我同意，不过要先给王震同志打招呼。习仲勋为此专程找王震谈了一次话，取得王震同意后，黄静波决定随习仲勋到广东工作。本来习仲勋要同黄静波一起赴广东，但他听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在肯定和推广家庭“联产责任制”，于是派夫人齐心与黄静波去安徽请教取经。然后，他们才辗转抵达广东。<sup>①</sup>

4月5日，习仲勋在陈仲旋等人的陪同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接他。习仲勋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由北国抵达南海之滨，投入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4月6日上午，习仲勋出席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韦国清首先介绍了习仲勋和全体代表见面。代表们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热烈欢迎习仲勋来广东工作。

习仲勋在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次党中央分配我到广东工作，感到担子很重。我决心和同志们一起，在省委的集体领导下，努力做好工作。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省四次党代会的意义和成果，强调做好广东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的责任十分重大。我们一定要振奋革命精神，把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党中央和5000万广东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习仲勋指出，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必须努力学习、大力宣传十一大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的文件，大力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必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抓紧、抓好，抓到底，结合各部门、各地区的实际，抓住“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进行深入批判，分清路线是非，拨乱反正，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

<sup>①</sup> 黄静波：《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功不可没》，《怀念习仲勋》，第89—90页。



来；必须把被“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必须赏罚严明，伸张正气，打击歪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在我省真正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sup>①</sup>另外，习仲勋强调要加强学习，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生产的劳动技能和管理方法。

习仲勋在讲话中感情真挚地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他言语不多，但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溢于言表，非常感人。<sup>②</sup>习仲勋一言九鼎，他晚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之后，长期在广东居住，实践了他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的诺言。

习仲勋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的讲话，给与会代表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讲话都用稿，他讲话没有稿子。再者他的话语很朴实。他在讲话中还讲到自己的不足，说自己刚到广东，对这里的具体情况还不熟，可能会犯一些错，希望大家指正，这让我们感觉到他和我们很交心。”<sup>③</sup>

4月6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届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选举了省委常委和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以及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韦国清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焦林义当选为常务书记，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当选为省委书记。李坚真为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sup>④</sup>与此同

① 《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② 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

③ 访问方苞谈话纪录，2004年7月16日。

④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南方日报》，1978年4月8日。



时，中央还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2月改为主任）。习仲勋把主要精力放在省委这一边，省革委会的日常工作则由刘田夫主持，放手让他领导省革委会一班人大胆工作。

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之后，韦国清返回北京，由习仲勋实际主持广东的日常工作。习仲勋从他踏上南粤大地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命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他重返政坛，不过让他大展拳脚的地方，既不是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是生他养他的陕北高原，而是被誉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的南海之滨。当时，习仲勋在被“关押折磨达16年之久，还刚刚恢复组织生活，年纪也60多岁了；而作为祖国南大门的广东省，正是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后，创伤累累，百废待兴，局面纷繁复杂。要主持省委全面工作，担子极为繁重”。但习仲勋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胆略、远见卓识。大无畏气魄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既沉着面对，又雷厉风行，团结省委一班人，稳住大局，励精图治”。<sup>①</sup>

在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不久，4月11日至5月8日，叶剑英一行25人从北京乘专机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住在南湖宾馆。<sup>②</sup>在叶剑英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sup>③</sup>要他在工作中切实加以注意。习仲勋一直把这六句话作为座右铭。

习仲勋到广东工作后，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但各方面也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看法。1978年8月，叶剑英委托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信给习仲勋并省委各同志，转告他的几句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对此，习仲勋在省委的会议上说，从来信可知，不光

<sup>①</sup> 张汉青：《光彩照人的革命生涯》，《怀念习仲勋》，第418—419页。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广东省警卫工作历史资料汇编》，1994年版，第58页。

<sup>③</sup> 习仲勋：《痛悼敬爱的叶帅》，《人民日报》，1986年10月31日。

是叶副主席一个人支持，是说“我们”支持；不是支持他个人，是支持整个广东的党员和群众放手干，只要你干得对，中央就支持。<sup>①</sup>叶剑英转告的这几句话，对刚恢复工作没有多久的习仲勋无疑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习仲勋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和厚望，也没有辜负广东人民的殷切希望。他到广东之后，常对人说，耽误了16年没有工作，我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据其夫人齐心回忆，在广东，习仲勋夜以继日、废寝忘餐地工作着。他是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更加精神百倍地工作，常常干到深夜。<sup>②</sup>习仲勋在广东，殚精竭虑，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忘我工作。他不仅带领省委、省革委会（后改为省政府）一班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领导广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杀出一条血路”，开创了广东工作的新局面，而且也为全国改革开放起到了排头兵的作用。

---

<sup>③</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5页。

<sup>④</sup> 参见齐心：《仲勋 我用微笑送你远行》，《怀念习仲勋》，第29页。



## 第二章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习仲勋到广东不久，就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80年春，习仲勋和胡耀邦在广州机场。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继续“左”的错误，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天安门事件和许多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出“左”的误区，开创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其中包括许多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的强烈反对。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之前，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其

他老一辈革命家也进行了抵制。全党上下针对“两个凡是”观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表示强烈的不满。

1978年5月11日，经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亲自审定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部分地方报纸全文转载。13日，又有15家省市党报也予以转载。广东新闻界反映敏捷，《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分别于12日、13日予以转载，对推动和引导广东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针对性，因此一发表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党内外反响强烈，并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

文章首先引来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某些中央领导人和在理论战线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少数人的反对或质疑。他们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当坚持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受到压制和责难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sup>①</sup>

6月24日，《解放军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该文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和疑问，堪称是《实践》一文的姐妹篇。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20页。



习仲勋以敏锐的政治目光，密切关注着全国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他态度鲜明，支持和赞成这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观点，并认识到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6月开始，习仲勋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主持召开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通过揭露矛盾，分清是非，进一步端正思想政治路线，彻底改变工作作风。6月30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地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理论要与实践结合起来，理论要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丰富这个理论，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有些同志犯错误，就是因为不学习，没有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sup>①</sup>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

6月底7月初，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所散布的各种流毒，并围绕“文化大革命”中全省推广的海南屯昌“一批二干出人才”的教育经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7月4日，习仲勋出席这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就如何看待“屯昌教育革命经验”问题，发表意见。他说：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对屯昌教育革命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充分发表了意见，很好。从大家的意见来看，屯昌经验与“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而搞的“朝农经验”是不同的，不能说是“黑样板”。但是1971年“四人帮”炮制了“两个估计”，<sup>②</sup>向全国强制推行，我们省委也贯彻执行了，在这以后几年中“四人帮”炮制了许多黑样板，黑经验，在我省流毒很大，影响很广。因此，从1974年底开始，我们总结、推广屯昌经验，就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许多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78年6月30日。

<sup>②</sup> 所谓“两个估计”，是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根本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该《纪要》是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泽东圈阅批准的。

“四人帮”的东西，提出了不少错误的口号。例如，提出了“读书务农”、“把学校办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样就抹杀了学校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一批二干出人才”，当时的所谓批，就是批“十七年”，把十七年搞臭，干就是提倡大办农场、搞劳动。这实质上是以“两个估计”为出发点的。又如，提出的“不能把‘以学为主’理解为以课堂教学为主”，这就曲解了毛主席关于主学与兼学的关系。不是说今后学校一点劳动都不搞，有时候也要到农村、工厂去劳动，也可以自己种点菜、种点粮食。但不能把学校搞成农场，搞成生产队。那样搞，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学不好就会影响人才的培养。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的。所以，屯昌经验是错误的。习仲勋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推广屯昌经验的后果来看，也是不好的”。<sup>①</sup>习仲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通过具体事例的分析，否定了“屯昌教育革命经验”，并表示“屯昌教育革命经验是省总结、推广的，责任在省委……责任不在屯昌的同志”。他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分清是非，又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

习仲勋在次年回顾说，1978年“7月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当时没有部署基层也开展讨论，但对省委领导来说，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大的。”<sup>②</sup>

9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在广州连续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习仲勋主持了学习会。参加学习会的有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在学习会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在马列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中，都有过明确的论述。毛主席历来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都是论述实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7月4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21日。



践第一观点的光辉哲学著作。现在，弄清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对于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习仲勋强调：“要把我们全省的工作搞好，就要学习好。要广泛开展学习运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好好学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我们学习革命理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善于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实际斗争中的问题，而不是去抄现成的公式，抓住片言只语去到处套用。”<sup>①</sup>

习仲勋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解放后28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会上，大家着重讨论广东农业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广东农业发展比较快，粮食增长速度和人均粮食产量比较高，鱼肉禽蛋、水果和其他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裕。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四条：一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二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四是切实关心群众的生活。那时，省委很重视抓好农业这个基础，全党大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地方财政主要也用于农业生产。工交战线也把支农工业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肥、农药、薄膜，农用交通工具和水电综合工程等，并大办以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轻工企业，如制糖、造纸、食品和轻纺等等。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也真正落实到基层，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保留少量的自留地和经营正当的家庭工副业，允许集市贸易，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

<sup>①</sup> 《南方日报》，1978年9月17日。



农业生产一直较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动辄给干部和群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到处鼓吹要“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甚至将广大农民当作“小生产者”，肆意侵犯和损害农民的利益，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广东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有的地方甚至下降。大家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对广东农业上不去议论很多，迫切要求打翻身仗。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改进作风，就能加快广东农业发展的步伐。<sup>①</sup>

习仲勋和与会者通过对建国头17年与“文化大革命”10年广东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清路线是非与政策是非，统一认识，统一步调。与会者一致认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努力把本省各项工作搞上去。并达成共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重大意义，这是关系到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关系到革命成败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

《人民日报》9月20日（新华社广州19日电）以《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加快前进步伐》为题，在第二版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召开的这次学习会。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习仲勋在全国是最早地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在当时局面还“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习仲勋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旗帜鲜明，勇敢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

这次学习讨论会“带动了全省陆续开展了讨论，对解放全省干部、群众思想，实事求是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

<sup>①</sup> 《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409页。



效果总的是好的。”<sup>①</sup>

这次会议之后，习仲勋要求各地联系实际，广泛开展学习和讨论。省委宣传部随即召开理论学习座谈会，对全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部署。10月，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委党校先后召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sup>②</sup>接着，全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由理论界扩大到地、市、县领导机关中。

中共中山县<sup>③</sup>领导人，从报刊有关真理标准的文章中得到启发。他们从9月开始组织讨论。10月，县委常委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会。参加者除县委常委外，还有县属部、委、办和公社、镇党委的负责人，共60余人，开了两天。县委书记和常委带头发言，思想很活跃，大家感到思想上得到很大启发。这个讨论会很快推广到了县的直属机关和公社及一些生产大队。到1979年2月，全县共开各种讨论会598次，参加者有5.7万人次。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山的干部解放了思想，不但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他们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框框，大胆抓经济工作，从中山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从1978年底到1979年春，他们顶住了某种压力，大胆否定了红极一时的“大寨经验”，搞了承包责任制（即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他们为60多个被批判的所谓“暴发户”、“庄园主”、“黑旗手”平反，支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既抓粮食，又抓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出口贸易，发挥了侨乡的优势。<sup>④</sup>

10月5日，习仲勋在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意义十分重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个常识问题，但又是被林彪、‘四人帮’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这个问题

<sup>①</sup> 《陈越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言》，1979年9月17日。

<sup>②</sup> 参见《光明日报》，1978年10月3日；《南方日报》，1978年10月21日。

<sup>③</sup> 今中山市。

<sup>④</sup> 参见《南方日报》1979年9月5日李耀祺文；《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林洪、肖海鹏等人的文章。

不解决，就不可能冲破禁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也打不好，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就肃清不了，更谈不上探讨新的问题，也谈不上安定团结，大干快上。”<sup>①</sup>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从这年10月开始，全省许多地、市、县领导机关结合领导班子整风，联系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总结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对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提出了坚决的批评。习仲勋在会上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sup>②</sup>



1980年5月，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右起）在广州合影。梁伯权 摄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5日。

<sup>②</sup> 张树军著：《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7页。



12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决定韦国清不再兼任中共广东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职务；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一讲话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sup>①</sup>

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公报写入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一段话，这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②</sup>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省委在广州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1月9日，习仲勋在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感受很深地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上的一个重大是非问题，就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通过讨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可以肯定，由于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而带来的全党思想大解放，工作大跃进这个伟大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sup>③</sup>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③ 习仲勋：《关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1979年1月9日。

1月25日，习仲勋在大会上作总结讲话。他强调，要继续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管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是”的禁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这样，我们才敢于独立思考，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敢想、敢说、敢做，才能生气勃勃。在今天，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要看我们言论和行动的结果是否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否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如果是这样，就要放手大干，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要干，就要抵制。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干，去实践，实践才能出真知，才能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一点上王铁人说得对：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领导机关要搞，在基层也要搞。讨论一定要强调结合实际，不要泛泛而谈，才能讨论得生动、深入，真正有所收获。<sup>①</sup>

在省委和习仲勋的领导下，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省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广大干部群众冲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解放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加快建设步伐。

1979年1月13日和3月12日，习仲勋在省委党校读书班的结业大会和开学大会上，一再强调还要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

1979年3月12日，省委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参加这期读书班的有广州市委和各地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省直机关和地委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县委正、副书记等共300余人，深入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继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开学大会上，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习仲勋讲了话。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畅谈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认识：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我们是去年九月开始讨论的<sup>①</sup>。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在那里讲这个东西，所以我那个讲话很觉拘束。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还要知道这个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否则，就是搞唯心主义。我表态早点，我们也进行了讨论，当时也发了通知，要下面讨论，但这个讨论没展开，搞得不好。就算这样也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跟“两个凡是”对着干的。党内有同志讲，凡是毛主席决定了的，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或者毛主席划了圈圈的，今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也不能改动，这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发展了。毛主席健在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马列主义是发展的。……按“两个凡是”办，毛泽东思想不就停止了吗？就像林彪所说的到了“顶峰”了吗？没有的，还是要发展的。如果不发展毛泽东思想，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毛泽东思想，那我们就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sup>②</sup>

习仲勋这一讲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扑朔迷离、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高贵品质。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有的省由于受前两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影响，没有表态，结果现在这些地方工作很被动。他

<sup>①</sup> 习仲勋于1978年6月底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即表态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7月在机关开展学习讨论，9月上旬广东省委常委举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2日。

说，“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不但表态，而且组织大家讨论，不仅省委讨论、省委常委讨论，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sup>①</sup>因此，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广东出现了思想很活跃的局面。

广东省一些省、地领导人也在《南方日报》发表文章，批判极左思潮，主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广东省较好地抵制了极左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

## 二、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补课活动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会议还传达了3月30日下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向理论务虚会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广东省习仲勋和王全国出席了这次会议。4月23日上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会议上，在谈到学习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时，再一次肯定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作用。他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sup>②</sup>

广东省各级领导机关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由于有些单位对这个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发展也不平衡。

1979年5月14日，省委召开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开了11天，从5月26日起，全省的县委书记也参加会议，于是扩大为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一共开了28天。根据省委的决定，5月26日，习仲勋向与会者主要是县委书记作一次讲话。他明确指出：“三中全会文件还要继续学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一课，要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的教育，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应当继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2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23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续探讨。”<sup>①</sup>

6月1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三中全会方针政策，反对两种错误思潮，反对来自右的和“左”的干扰。右的思潮是公开地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左”的思潮是怀疑或反对三中全会，实际上也是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种“左”的思潮，披着“革命”的外衣，容易迷惑人，危害性更大一些。习仲勋提出，对于“极少数利用错误思潮兴风作浪，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妄图使我们倒退到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种状况去的人，必须与之坚决进行斗争，给予迎头痛击。广州市不是曾经有人公开反对‘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甚至有人贴出小字报，叫嚷‘舍得一身剐，敢把共产党拉下马’吗？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警惕的。”习仲勋指出：“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他再次强调：“为了端正思想路线，我认为要继续宣传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它来观察问题和解决事物，敢于独立思考，开动机器，冲破禁区。”他针对当时的干部思想情况，明确提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许多地方还要补上这一课。”<sup>②</sup>要继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

从7月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就在广东各地开展起来了。《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海南日报》等党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提出补课的要求。<sup>③</sup>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

<sup>②</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发言》，1979年6月10日。

<sup>③</sup> 参见《南方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基层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1979年7月20日；社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定要深入下去》，1979年9月5日；《海南日报》评论员文章：《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1979年9月2日；《广州日报》社论：《端正思想路线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保证》，1979年9月10日，评论员文章：《解放思想 立志改革》，1979年9月24日。



8月11日至23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参加小组讨论。11日，习仲勋代表省委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进一步提出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四化’为中心，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用实践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经济工作中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他强调指出：“我省今年早造农业丰收，根本原因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了许多思想禁区，逐步落实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按劳分配、建立生产责任制等政策，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地搞生产了，不再怕挨批挨斗了，从而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工交部门“要把企业搞活，也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端正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同时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大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达到了增产增收，扭亏增盈。”<sup>①</sup>

这次会议最大的特点是思想解放，讨论活跃，争论激烈，解决问题的措施具体得力。会议围绕“清远经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许多与会者反映，这场讨论实际上是补上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课。清远的经验尽管还不够完善，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实践的结果，企业搞活了，生产上去了，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会议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大规模的、生动活泼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前段这个讨论，农村比工交企业开展得深入一些，工交战线一定要认真补上这一课，紧密联系增产节约运动的实际，联系企业的实际，冲破种种禁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总结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sup>②</sup>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工交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11日。

<sup>②</sup> 《南方日报》，1979年8月25日。



8月10日至21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还召开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习仲勋代表省委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回顾指出：去年“7月开展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省委、地委、县委的领导来说，进一步解放了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用实践来检验，使我们在重大决策、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作用是很大的。”针对许多干部群众关心政策会不会变，即心有余悸的情况，他明确提出“要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独立思考，勇于实践，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继续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且要推广到基层干部中去，进而到群众中去。”<sup>①</sup>

由此可见，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收到的效果也是好的”。<sup>②</sup>广东各级党委也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省委有关指示的精神，积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8、9月间，肇庆、湛江、海南、惠阳等地委召开三级干部会或县委书记读书会，用实践检验真理标准为武器，回顾和总结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特别是半年来农村和农业生产出现的深刻变化，进一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提高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自觉性。通过实践检验，他们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没有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就不可能有当前这样的大好形势。特别是肇庆、湛江等地委第一把手带头参加学习、讨论，联系实际，带头解放思想，带头作自我批评，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问题解决得比较深透，效果都比较好。此外，中山、揭阳、琼山、清远、遂溪以及中山小榄公社，顺德勒流公社，东莞中堂公社等县、社都先后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他们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进一步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深入进行下去，8月下旬，省委宣传部在中山县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中山县在基层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经验，交流全省各地开展这一讨论的情况和经验，对进一步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21日。

<sup>②</sup> 《陈越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言》，1979年9月17日。

开展讨论作了部署。习仲勋很关心现场会议的进展情况，指定有关同志进行联系并向他报告。<sup>①</sup>

中山县主要是采取总结经验、典型对比的办法，总结三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抓住当时工作中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如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因地制宜发展农业，落实干部政策，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等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解放思想，肃清流毒，划清两条思想路线、科学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通过培养、树立、表扬先进典型，带动全县生产和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中山县树立的几个典型很有说服力。他们有公社的典型（小榄公社）、大队的典型（永宁大队），还有个人的典型（小榄公社捋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黄新文，一家以养猪为主，全年纯收入6000多元，他的事迹登报后，收到全国24个省市400多封向他取经、表示支持的来信）。顺德勒流公社和东莞中堂公社，他们联系本社多年来农业生产的实际，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极左路线，着重解决几个问题：（一）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是不是都是错误的？（二）上级肯定过的东西，是不是都是对的？（三）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安排生产对不对？（四）富了是不是一定变修？敢不敢让一部分大队、生产队和个人富裕起来？这些问题，如果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无法从过去批判过的，上级肯定过的、本本上有的等条条框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省委要求各地向中山县学习，特别是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带头学习，联系实际，把讨论普及到基层中去，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

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对实践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而且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执行，原来有些怀疑、观望、动摇的人，也开始转变过来。但是，

---

<sup>①</sup> 当时习仲勋指示张汉青打电话给在中山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询问会议情况。



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由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不少人还没有打破僵化半僵化的精神状态，少数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思想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最突出的是梅县地区大埔县的丘××，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造反派头头，1972年提为县工商局副局长，1979年3月，县委决定，调他到一个公社任公社党委会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县委书记，其内容打着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旗帜，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产物。他说三中全会是“砍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和国家已经变成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竟然提出：“现在来回顾过去开展的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个大阴谋。”他在“公开信”中说准备坐牢，相当顽固。这种人是林彪、“四人帮”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出来反对三中全会，反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毫不奇怪的。这种观点是极个别的，是极左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而令习仲勋和省委感到有问题的是，当时在广东干部队伍中有的人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抱有不同程度的抵触、不满情绪。特别是三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时，有不少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说什么“拨乱反正，越拨越乱，解放思想，解放到美国、日本去了”；也有人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是一种策略，实际上是要把毛主席讲的都翻掉。砍旗是真，高举是假”；还有人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为地富摘帽、右派改正，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

二是怀疑、担心、不理解。有的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既然是常识问题，为什么要在全国开展讨论？究竟有什么来头？是不是中央又出现了新的路线斗争？也有的同志认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去冬今春来势很猛，后来又冷下来，最近又热乎起来，放了又放，收了又收，说明问题并不简单。有的同志担心损害革命领袖和毛泽东思想的威信；有的同志担心削弱党的领导，对党委的指示抱怀疑、观望态度，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去办，搞不好会出现各执一

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的同志担心影响安定团结，说现在刚出现安定团结大搞“四个现代化”的局面，又开展这样大规模的讨论，搞不好又会乱起来；还有的同志害怕“秋后算账”，说：积二十余年之经验，还是稳点好，免得秋后算账，当“砍旗派”，弄不好，戴个什么帽子去见马克思那就不好了！上述种种怀疑、顾虑，集中表现在“砍旗”这个问题上。好像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端正思想路线，把林彪、“四人帮”强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切歪曲、阉割和不实之词统统推倒，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本来面目，就是“砍旗”；好像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形而上学的观点，就会损害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威信，就会把思想搞乱。

三是认为讨论与己无关，无用。有的同志认为，这场讨论是领导的事，是理论工作者的事，与己无关。有的同志说，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两个凡是”，都是中央几个秀才搞的，搞得我们下面团团转。也有的同志认为，权力就是真理，谁的权力大，谁的真理就多，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再解放也没有用。<sup>①</sup>

针对上述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模糊认识，习仲勋认为，广东省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开展得不算迟，但还不普遍、不深入，各级党委，包括省委，对此还抓得不够紧。因此，号召各级党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加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自觉地、坚决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sup>②</sup>

9月13日至21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委书记会议。13日，会议由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主持，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地委书记和省直属局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报告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在7月底、8月初在上海、山东、天津、安徽和海军党委几次讲话的精神，还传达了陈

<sup>①</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和省直属局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13日；《陈越平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关于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言》，1979年9月17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和省直属局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13日。



云对农轻重比例关系问题的三个观点，并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

要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提高到自觉的程度，脑子里要牢牢地树立这个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它同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根本对立的，同“两个凡是”也是根本对立的。要学会并自觉地运用实践这个标准、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是否真理，而不能以为书上讲的就是真理，上级领导讲的就是真理，或者“有用就是真理”。我们服从真理，就要尊重实践，把认识统一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就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实践，总结群众的实践；就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中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我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学习和运用越普遍、越自觉，我们的四化建设就能搞得越好。<sup>①</sup>

9月21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就关于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问题强调指出：

这个问题，省委讲了多次，省委宣传部在中山召开的现场会议也作了部署，我看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做，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带头补课，带头讨论起来。从省委起，直到各战线、部门、地、县、社、队、厂矿、车间、商店、学校，都要这样做，都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认真解决那里存在的实际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开展，不要搞任何形式主义。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为了端正思想路线。我们只要做工作，就会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和省直局以上领导干部报告会上的讲话》，1979年9月13日。

碰到一大堆问题，老大难，新大难，一齐来。怎么办？我看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也就是端正思想路线，还是最主要、最根本的。现在是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的有利时机，这就是有三中全会以来半年多的实践和出现的大好形势。半年多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但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开头比较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也是不可怕的。有的同志说这半年是在思想混乱中前进，在思想混乱中发展，这确实反映了这段时间的情况。但要看到，这期间人们的思想情况有不少变化，许多同志随着实践的发展提高了对三中全会的认识，思想由混乱到比较清楚，到坚决拥护三中全会。这是符合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我们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做转化工作，促进这种转化，使认识提高到自觉的程度。

这里，我想就指导思想问题讲几点看法：

第一，这场讨论是关系端正思想路线的大事，是关系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能否贯彻的大事，非抓不可，早抓早主动，迟抓工作一定被动。什么叫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还是照搬片言只语，“句句是真理”，“句句照办”？这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根本分歧，一定要解决好。

第二，补课要补到实处，真理标准讨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要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结合起来，同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比如总结早造丰收的经验，总结三十年来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总结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工作等，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这样才能解决得深，才能生动活泼，才能使干部、群众容易懂得。要继续批判“左”的和右的思潮，特别是要继续批判极左路线。

第三，要坚持正面教育，不搞政治运动。讨论中要实行“三不主义”，创造自由发表意见的气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不能操之过急，不能靠行政命令。有些同志一时思想不通，不要随便上纲上线，给人家扣帽子。要耐心帮助和等待，



经过一段实践，再来讨论。要做到真正弄通思想，团结同志。当然，进行实际工作，必须按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不能各取所需，自行其是。

第四，要结合这场讨论，组织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对有些干部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所谓启蒙，就是从A、B、C学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A、B、C，它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办好党校，还可以举办读书班，请人作些辅导报告。<sup>①</sup>

稍后，省委第二书记、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在共青团广州市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所有部门都要重新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课题。<sup>②</sup>

10月16日，省委批转肇庆地委《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学习讨论的情况报告》。指出肇庆地委主要负责人抓好各级领导骨干端正思想路线，解决当前中心工作存在的问题，并运用“实践标准”来分析形势，指导工作，使学习讨论落到实处，效果显著。省委要求各地要认真学习他们的经验。由于省委领导重视，抓得紧，广东各地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开展得比较普遍，比较深入，效果也显著。

习仲勋对广东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了我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解决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sup>③</sup>这场讨论“使我们各项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是一场意义极为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我们端正思想路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对于促进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两年

①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② 《南方日报》，1979年9月23日。

③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



来，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讲求科学与民主的作风开始得到恢复与发展，主观主义，生搬硬套，瞎指挥，一刀切，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以及违反科学的东西，开始得到纠正。这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他提出：“我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不够广泛深入。要使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大胆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在全省范围内把这场讨论继续深入开展下去。”<sup>①</sup>

1980年6月，在广东省工交系统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会议上，习仲勋号召要继续批判极左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他指出：“解放思想必须和深入实践统一起来。在解放思想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意见。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光在机关、会议上争论，是不能真正统一起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在实践中辨明是非，统一认识。”<sup>②</sup>他举例在全省争论很大的“清远经验”，在全省近一千个企业推广，取得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

王全国等人对习仲勋当年领导广东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印象十分深刻。他们回忆说，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sup>③</sup>广东省经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大干部群众摆脱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解放思想，分清是非，端正了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

① 习仲勋：《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②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357页。

③ 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



## 第三章 开展整风运动

### 一、省委常委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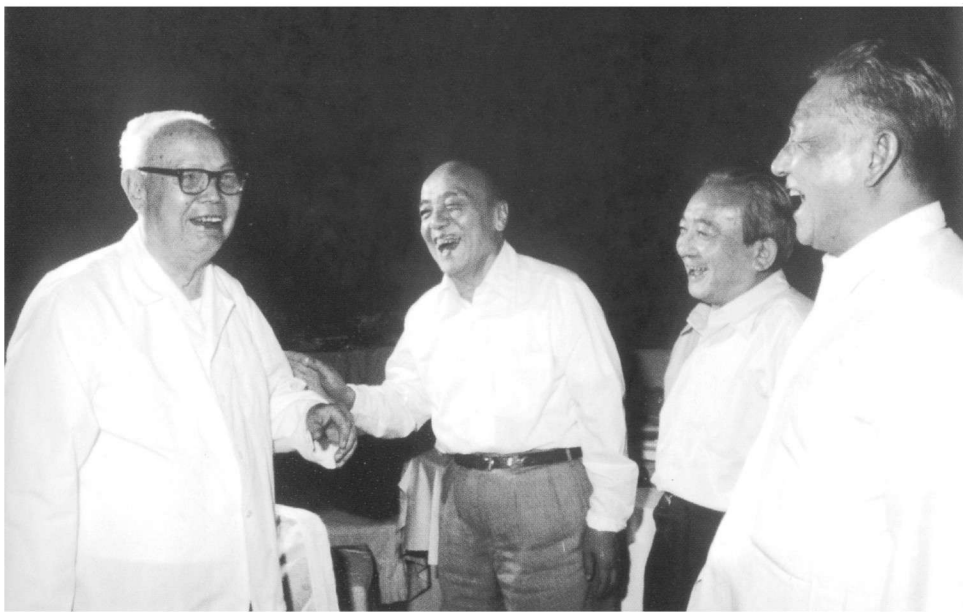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后，摆在广东领导人面前的的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举。广大干部、群众希望广东的局面能够迅速改变，尤其是农业必须迅速搞上去的心情十分迫切。而在领导干部当中，对于林彪、“四人帮”在广东的干扰破坏及其流毒、影响的严重性的估计，以及广东农业为什么上不去等问题，认识上也不够一致。习仲勋来到广东之后，在工作中发现广东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经过十年动乱，流毒不少，路线是非不分，思想不解放，许多干部心有余悸，党的路线方针未能很好地贯彻执行。面对这样的情况，采用什么样的适当方式方法才能解决问题，改变广东现有的局面呢？习仲勋和广东省委认真研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现有的问题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思想认识问题。因此，用整风的方式，可能是比较合适的解决问题办法。

原广东省委书记，时任湛江地委书记林若回忆说：

省委为什么决定实行整风，我的看法是广东自土改特别是“反地方主义”后，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因此许多干部心里都憋着气。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的整套工作还没有从“左”的政策转过来，还在进行一些本来不该进行的运动。比如1973年和1974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批修正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农村很穷。广东之前制定的政策也很“左”，养鸡鸭只许养两只，不能成群。农民以前一周有两三个圩，后来被迫减为一个，使得农产品的交换产生严重问题，农副产品的买卖也很不方便。某些干部强迫作风依

旧，引起了群众和干部的反感，就出现了一些群众不满的典型干部。同时，许多干部在文革中因所谓的“海外关系”“黑六条”，被视为“异类分子”，华侨以及和华侨有关系的人，要被另眼相看。这使得干部们心里有疙瘩，怨言不断。政策没有落实，干部群众的气都不顺，反映的问题也很多。习仲勋受极左政策的迫害也很深，他对极左政策、强迫命令的作风、脱离群众的倾向很反感，对群众的情绪感同身受。所以习仲勋决定领导整风，改变这种混乱的思想状况。<sup>①</sup>

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是想开一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以原湛江地委副书记白××为典型，对其受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影响，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群众实行强迫命令等问题进行剖析和处理，对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进一步作出部署，并促进农业的发展。地、市委书记会议开始后的第三天，参加会议的干部对省委常委在路线斗争、农业上



1980年5月，习仲勋（右一）与叶剑英、杨尚昆、刘田夫（左起）亲切交谈。

<sup>①</sup> 访问林若谈话记录，2004年8月6日。



不去、工作作风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强烈要求省委常委首先解决好路线是非问题，把全省的农业和其他各项工作搞上去。

为了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流毒，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稳定局势，习仲勋和省委决定通过常委带头整风，总结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并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动员全省干部、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骨干解放思想，积极行动起来，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因此，1978年6月，省委在考虑大家的要求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及时地把地、市委书记会议改为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开展省委常委整风。会议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省委领导人王首道、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等分别在会上作了检查。他们在检查报告中敢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总结了经验教训。有的领导第一次检查，与会者评议时认为不够深刻，还作第二次检查。有的领导作多次检查，直到与会者满意才算过关。会议打破了林彪、“四人帮”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放手发动大家帮助省委整风，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上下结合的形式，参加整风的干部把积压在心的话都讲出来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造成的党内生活的沉闷空气也为之一变。

1978年6月30日，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习仲勋在总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扼要地总结了这次省委常委整风的开展情况，他说：

这次会议，既帮助了省委常委整风，也教育了大家……我们这次会议，按延安整风的精神，紧紧抓住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中心突出，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省各级党委整风说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会议的重要特点，是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得很有生气。会议的指导思想就是贯彻党

的十一大路线，通过揭露矛盾，弄清广东在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这次会议，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sup>①</sup>

习仲勋讲话中提到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接着，习仲勋又总结了省委常委整风主要抓的几个问题。首先，这次会议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是省委常委整风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动员全党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这也是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

广东的农业工作从1965年后的12年，粮食每年平均只递增2.3%，低于全国的水平，也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977年粮食年度，全省农村口粮分配，还有将近1000万人在每月30斤（原粮）的“保护线”以下，平均每人每月只有23.4斤，其中平均每人月只有15斤的达195万人。参加省委整风的许多干部都在讨论：为什么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局势也比较稳定，农业却一直上不去呢？

习仲勋在讲话中说：“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因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吃饭的问题。现在全省还有一千多万人口缺少口粮，这个问题很大。广东农业上不去，带来一系列问题。作为祖国的南大门，就势必拖全国的后腿，对内对外影响都不好。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sup>②</sup>习仲勋说，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在一年前就提议搞农村调查和整风，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时机不成熟，所以没有开展。这一次时机成熟了，也就是要通过整风实实在在的促进农业的发展。在这次整风中，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广东农业的干扰破坏。主要是揭发了他们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业方针；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搞乱了社会主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sup>②</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这些破坏导致了广东20多年来农业发展由上升到停滞的历史。

整风中揭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说明要彻底改变广东的农业状况，扭转被动局面，关键还是要肃清流毒，拨乱反正，找到一条适合广东实际的正确的农业发展路线。几个月来，中央连续发出了三十七、四十二、四十七号文件，群众把中央的这些文件叫做“爱民政策”。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党委抓农业要抓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同时特别强调通过整风，能够改变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影响下农业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瞎指挥，以及某些干部强迫命令，甚至对农民实行专政的错误作风。树立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把中央的政策和地方的实际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促进广东农业的发展。”<sup>①</sup>

习仲勋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教育参加省委整风的干部们要深入群众，联系实际分清路线、政策的是非界限。时任省委书记的郭荣昌原来工作的罗定县，那里编织业很多，有一个搞编织的老社员，技术很高，但生产队只是给他一般的报酬，所以他就往外跑。在基本路线教育中就批斗他，说他是“副业单干”，“搞资本主义”，并宣布按规定要扣多少钱，赔多少东西，他在自留地上盖的房子也被拆掉了，家里还被没收了一些东西。结果整风时这个老人家的女儿就写了一封信给习仲勋，反映了这个问题。据郭荣昌回忆：

当时习仲勋书记把这封信给我看，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亲自去检讨”。我去到这个公社后，一开始县委、公社书记、生产队长都不同意我检讨。因为受以前“左”的思想路线影响，这就是‘单干’、‘资本主义’，而且不是单独这个生产队的一件事，全县都存在类似的事。如果要检讨那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不是全县都要检讨？许多县干部的思想都接受不了。结果变成了我代表省委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哪些才是正确的路线。<sup>①</sup>

习仲勋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农村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却被他们当作资本主义批了，或者砍掉了。你说这究竟是谁在违犯政策呢？前些时，我请荣昌同志亲自到那里处理这件事，落实了政策，反映很好。我们要划清路线、政策的是非界限，思想要端正，是非要明确，不能让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框框紧紧套住我们的头脑。”习仲勋说：“会议印发了个材料，汕头地区农民到广州来拉氨水，首先得送礼，否则人家就要卡你。卡了还不敢说，说了不但拿不到氨水，还怕报复，以后就不给你了。这怎么行，非严肃处理不可。”习仲勋在会议上强调：“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重视农业，要抓‘农、轻、重’方针的贯彻执行。”另外，还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发展速度。”<sup>②</sup>习仲勋还主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领导干部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报告，要深入群众，多下去跑跑，把一些经验教训总结出来，把中央的文件和地方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些决策让群众很高兴，群众说：“现在政府大抓农业了，有希望了！”通过整风，全省上下统一认识，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农村的若干文件，用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省委常委整风抓的另一重点问题是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进行大揭发、大批判。整风紧密联系广东实际，围绕路线是非问题展开一场大辩论。通过整风中揭露出来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同党的种种罪行，教育了干部群众，澄清了被他们弄得混乱不堪的许多大是大非问题。

从省、地两级整风中揭露的情况来看，林彪、“四人帮”对广

<sup>①</sup> 访问郭荣昌谈话记录，2004年12月27日。

<sup>②</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东的干扰破坏确实严重，称得上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党羽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七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执行“四人帮”“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搜集整理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黑材料，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在海丰制造了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家属。中央领导的东江纵队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他们在惠阳地区制造了所谓反革命集团案23个，对2000多革命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在汕头地区的澄海县制造了一宗所谓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的6000多人，原汕头地委副书记陈焕新就是被活活打死的。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达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这些触目惊心的严重事件的揭露，把广东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大大推进了一步，广大干部的思想又一次得到解放。<sup>①</sup>

习仲勋指出：“省委决定，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展开大讨论、大批判，联系实际，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级党委，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同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此外，要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关于人的政策，特别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假案、错案、血案，要彻底予以平反昭雪。要进一步处理好干部‘两退一插’的遗留问题。要区别不同情况，继续妥善地处理好所谓非正常死亡的问题。”<sup>②</sup>与此同

①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②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时，省委还直接抓了一些冤案、假案、错案的昭雪平反工作，为干部群众真正“出了气”。这样，震动比较大，在会内会外，在社会上，对省委整风的情况都很关心，议论纷纷，民主空气大为活跃。

省委常委整风的第三个中心就是通过整风，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真正把广大干部团结好。习仲勋指出，“四人帮”颠倒敌我，分裂干部队伍，挑动资产阶级派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省委要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对各种人加以正确处理，合理安排，恰当使用。他尖锐地指出，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是好的。但在一部分干部中，思想有点僵化，有一种‘老大思想’，缺乏朝气，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有的同志自己思想不解放，还处处卡别人，使得一些本来可以并且应当早日办成的事，也一拖再拖，落实不了。”<sup>①</sup>这就容易导致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习仲勋告诫干部们：“我们究竟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改造到老的共产党员？不少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整风中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sup>②</sup>

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广东工作要上去，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要整顿好领导班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领导班子的整顿，包括对班子成员进行调整和交流，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要重视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另外，还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广东历史上曾经反过地方主义，这个我们要肯定，有的同志是有地方主义，是要反的；但是这已经是历史了，这历史已经过去，不应该再去看那些，要往前看。领导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干扰，自觉维护干部队伍的团结。整顿作风，刻不容缓。”<sup>③</sup>

①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②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③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习仲勋在讲话中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给予肯定。后来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他改变了这一看法，大力为广东“地方主义”冤案平反。



按照习仲勋关于整风的要求，省委、各省直机关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整顿作风，分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省委彻底整顿机关，精简撤并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现象，加强革委会的作用；精简不必要的会议和文件，经常到下边去，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各地市也积极响应，地市委领导之间经常交心通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消除误解和分歧，在思想上拧成一股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和群众商量，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通过整风，广东的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这次省委常委的整风是完全符合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要求的，是十分有必要的，同时也为全省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开了个好头。时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说：

当时我到惠阳参加党校学习，李富林同志（惠阳地委书记）传达了省委整风的精神。从记录传达的内容中，可以看到干部群众对习仲勋的评价很高：“省委扩大会议开得好。这个会议揭开了广东新一期路线斗争的盖子，抓住了广东工作上不去的要害问题。习仲勋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很高，有党性、有革命毅力，来广东才两个月，就抓住了广东上不去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路线问题，一个班子问题。”<sup>①</sup>

## 二、整风运动在全省铺开

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地市纷纷召开会议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和习仲勋的讲话，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整风运动在广东全省迅速铺开。

<sup>①</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1978年夏收前，省委常委曾研究大搞农村调查问题。随后，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农村调查。然后，地、县委一边抓夏收夏种、夏征夏购的各项工作，一边作好整风的准备。这时，习仲勋带领工作组到宝安进行调查研究，省委常委决定派刘田夫领导省革委会机关的整风工作，王全国参加了会议研究。

省革委会机关的整风，主要是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充分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揭露矛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清理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端正指导思想，解决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以便进一步把工作做好。

1978年8、9月间，省委在广州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书记以及省直各有关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共170多人。这次会议是继6月省委常委整风会议之后召开的，是省委整风的继续。

根据省委整风的精神，很快，湛江地委进行了整风。接着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各地委以及省直机关，也相继进行整风。省委对各地市开展整风给予高度重视，组织工作组和省委许多领导奔赴各地市参加当地的整风。1978年7月到10月，在省委和习仲勋的领导下，广州市委开展了整风。习仲勋委托省委书记吴南生自始至终参加和领导了广州市的整风工作。

1978年7月14日至29日，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大会，有省委、市委领导干部近400人参加，广州市委整风正式开始。习仲勋在会议开始时讲了话。他首先强调市委召开这次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是按省委的部署进行的，很有必要。接着，他谈到广州市委整风需要注意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联系广州的实际，摆事实，揭矛盾，弄清市委在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只有弄清路线是非，才能在思想、政策、作风上分清是非，做到纲举目张。二是对广州要有两个足够的估计。第一个足够的估计是要充分认识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广州是省委的所在地，是广东的心脏，广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好坏，对全省有很大关系，对国内外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一定要把广州的工作搞好。第二个足够的估计是林彪、“四人帮”对广州的干扰、破坏极为严重，不



可低估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市委整风，实际上是省委整风的继续，是省委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强调这次整风要按照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充分发扬民主，让人家讲话，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讲什么话，正确的或错误的都可以讲，都要听。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揭露问题。整风要强调三条原则：一是敢批；二是敢揭；三要实事求是。在方法上要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四是要正确对待有错误、有问题的同志，不能用“四人帮”的方法对待他们。同时，希望那些有问题的同志不要当“溜派”，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治好自己的思想。五是要边整边改，不能因为整风就什么都不管，家里的工作不能耽误，要注意改变工作作风和出现的问题。<sup>①</sup>会后，大家普遍反映这段会议开得很好，各级干部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为市委整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8月2日到12日，市委召开60人左右的中会，主要是市委部、委、办及有关领导人参加。与会者听了焦林义、梁湘的检查发言，还有市委常委和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发言。大家对焦林义、梁湘的发言进行了评议。接着转入小会，市委常委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参加。常委进行交心、谈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期间，各部、委、办和有关领导人亲自开展调查研究，就大会提出的意见，梳成辫子，查阅了市委会议一些记录和一些档案材料，编成16份材料。其间，焦林义、梁湘作过两次检查发言，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帮助。9月12日、13日恢复了中会，焦林义、梁湘又作了检查发言。习仲勋和省委一直关心广州整风。省委专门听取了汇报，习仲勋作过两次指示。大家普遍认为中、小会无论在思想交锋方面，在材料工作方面，都比较深入，做了大量工作。<sup>②</sup>

1978年9月18日上午，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再次举行大会。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吴南生、寇庆延、陈越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先由吴南生总结了这一段广州市委整风开展的情况。接着，省委常委书记

① 《习仲勋同志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7月14日。

② 《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简报》，第269期，1978年9月19日。

兼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市委书记梁湘先后作了检查发言。随后习仲勋作了讲话。他首先肯定了广州市委整风是健康的，是好的。接着，习仲勋指出了广州市委整风继续开展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一是坚决反对派性，使每个同志都站到党性的立场上，团结起来，做好工作。二是仍要注意弄清路线是非，解决好思想理论路线上的问题。三是整顿好领导班子，以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形势。四是注意帮同志要帮到底，多提意见。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揪住一两个人不放，这是对整风的干扰。另外，习仲勋还强调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管整风还是平常的工作，一切要从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私利出发。最后，习仲勋提出市委整风再搞七、八天就可以告一段落了，整风不能妨碍抓工作。省委的意见就是要把整风和工作同时抓起来。省委决定以吴南生为主的几位同志继续帮助市委整好风，使市委整风做到善始善终。<sup>①</sup>

1978年10月5日，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举行市委整风的第三次大会，由焦林义代表市委对这次整风做总结。习仲勋在这次总结会议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整风的必要性，他说：“在市委整风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之后，我们对整风的认识需要再提高一步。这不光是广州市委整风的问题，也是全省的问题。首先，开展整风是形势逼人，非搞不可。广东面临着一个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新形势，但是我们在革命和生产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同志思想还跟不上新形势。所以，省委是从全国的大局来考虑广东的工作的，是为了使我们能跟上全国的步伐、为新长征作出贡献来下决心搞好各级党委的整风的。其次，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需要。不搞整风，不放手发扬民主，广大干部、群众长期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气就没处出，正气就不能上升，心情就不会舒畅；不搞整风，有些同志的错误到底严重程度如何，就弄不清楚，就不能取得广大干部、群众的信任。只有认真搞好整风，才能得人心，长正气，达到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第三，这是运用‘团结——批评——团结’

<sup>①</sup> 《中共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简报》，第269期，1978年9月19日。



的公式，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整顿领导班子的既积极又稳妥的好办法。”<sup>①</sup>

在广州市委整风期间，许多问题都集中到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和市委书记梁湘身上。议论很多，意见也很多。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一、焦林义为什么“解放”那么早？二、为什么林彪选择在广州另立中央？三、江青为什么多次窜来广州活动？简而言之，就是怀疑焦、梁与林彪、江青有联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一些人说话做事仍带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纲上线，极左的思想习气。对焦、梁所提的意见，一部分是实事求是的，可还有一部分是过火、过头了的。前广东省省长，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回忆：

1978年广州整风，我作为区委书记，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依我看，上纲过高，尤其是对焦、梁两人，说他们在广州担任领导职务时间长了，形成了宗派。因此，对焦、梁重用的人，都要打问号。对焦、梁问题，历史自有评说，但一些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解放”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的干部意见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省委派吴南生同志主持广州整风工作，下结论比较客观，没有过火、过头的做法。但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有一种情绪、一种气氛，即敢于对焦、梁提意见的人，好像比较正确，不太敢提意见或者意见提得比较平和的人，好像对焦、梁撕不开情面，没有说他们包庇，但对他们也有些看法。我认为在整风过程中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好的，但一些人带着有色眼镜，把焦、梁主持广州工作出现的问题看得过重。当然，焦、梁在工作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对焦林义同志的处理，我听了吴南生同志的总结讲话，对焦、梁评价较好，没有出现特别过火现象。<sup>②</sup>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5日。

<sup>②</sup> 访问朱森林谈话记录，2004年6月10日。

当时负责主持广州整风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一方面让大家讲话，同时制止有些人想把问题扩大化，另一方面组织一个小组专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档案，终于把焦、梁的事搞清楚了。<sup>①</sup>

在会议的总结讲话中，习仲勋也代表省委表明了对焦、梁问题的态度：

对林义同志、梁湘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到底他们怎么样？有人怀疑他们问题很严重，是“四人帮”那一伙的，或者是同“四人帮”有联系的。经过这次整风，大家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查一查，并没有什么联系，只能说当时思想上认识不清楚，犯了一些错误，甚至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但是，他们不是“四人帮”的人。当然，如果有的同志还有意见，有材料，可以继续提，继续摆，还可以继续查，总可以搞清楚的。我这样说，也可能还有人不同意，甚至会说，今天请你来讲话，你怎么还说那样的话！因为议论太多了，这个问题不讲清楚，那就无法工作嘛。上面讲了团结与路线的关系，林义同志在路线问题上同大家基本上一致的，有了这一条，就有了共同团结的基础……还有些错误，改了就好了嘛，还可以领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夸大一点，不减少一点。<sup>②</sup>

最后，习仲勋总结了这一次整风的收获，认为广州市这次整风分清路线是非，初步形成了民主的空气，同时还初步清理了市委在执行路线、政策和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希望广州在整风会议结束后，加紧做好会后的实际整改运动，搞好领导班子的团结，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大干快上。这不仅是习仲勋和省委对广州市的希望，也是对全省各地市的希望，广州市委的整风至此也告一段落。

1978年10月30日上午，省委常委召开会议，研究了省直机关整

<sup>①</sup> 访问吴南生谈话记录，2004年7月7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5日。



风的问题。到会的有省委常委习仲勋、焦林义、刘田夫、李坚真、邓逸凡、薛光军、杨应彬、陈越平，黄静波、梁威林等列席了会议。会议由习仲勋主持。

会上，省委办公厅负责人向常委汇报了省直机关整风的情况、存在问题以及深入搞好整风的意见。常委认为，省直机关大多数单位的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联系揭批林彪，发扬了民主，分清了路线是非，进一步落实了政策，改进了作风，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省委这段时间对省直机关的整风抓得不够紧，没认真抓好典型，以点带面，目前存在不少问题，整风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为切实搞好省直机关的整风，常委决定，利用年底前的两个月时间，集中抓一下省直机关的整风。各战线都要加强领导，抓好几个典型，以点带面，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分清路线是非的前提下，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和整改。在搞好思想整顿的基础上，搞好组织整顿。凡是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地平反昭雪。对与林彪、“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以及有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要抓紧查清，尽快作出结论和定案处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要先做透思想工作，热加工、冷处理。要加强消除派性，增强党性，要团结，不要分裂。通过整风，对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组织机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制订整改措施，搞好领导班子和机关革命化建设。

常委决定抓紧召开一次省直局以上干部会议，交流推广整风搞得较好的单位的经验，由刘田夫代表省委讲话，认真总结省直机关开展整风的经验，指出存在问题，对干部、群众提出的意见作出正确的解答，把整风搞好搞到底，力争年底前使大多数单位的整风告一段落。各省直机关在省委的指导下，积极整风、整改，生产和工作都出现焕然一新的局面。

各市、县委的整风，秋冬也陆续展开，省委书记和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帮助指导整风。如习仲勋到汕头，刘田夫到惠阳，薛光军到佛山参加各地地委的整风。习仲勋十分关注各地市整风的开展。他在



收到韶关市委常委整风情况的报告后，仔细阅读并批示说：“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有充分自我批评和敢于揭露矛盾的文件”，并要求办公厅将文件及时印发各地、市委，供各地、市、县委整风时参考。1978年7月，习仲勋到梅县和汕头地区检查工作，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7月31日，在汕头地委的整风会议上，习仲勋作了讲话。习仲勋指出汕头地区整风要抓林彪、“四人帮”在海丰所制造的大反彭湃事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它既是整个汕头地区的问题，也是全省的问题，是全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习仲勋说：“对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正确对待，要提高认识，首先应该考虑怎么做才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有利，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sup>①</sup>此外，习仲勋还强调干部“要跟上形势，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善于学习”，“各级党委都要注意培养干部”。习仲勋认为：“选拔干部不要只喜欢那些听话的。有些调皮的，你说什么他都敢提出不同意见，这怕什么呢？这些人往往有本事。特别作为一个领导者，身边有几个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做朋友，很有好处，可以防止少犯错误。”<sup>②</sup>另外，习仲勋也特别强调汕头地区要注意大力发展农业，还要发展好林业，“靠山吃山，吃山要养山”，还要把牧业和其他多种经营开展起来，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习仲勋还着重指出：“各级领导班子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机关要革命化”，“精兵简政，做到真正能办事，效率高，没有官僚主义，不搞主观主义，一切问题都要经过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作处理。”最后，习仲勋鼓励汕头地区的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让汕头地区的工作先走一步，这对全省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在省委的关心和帮助下，全省的整风运动顺利开展，干部、群众普遍反映，从整风中看到了省委的决心，增强了信心，改变了习仲勋来之前广东存在的思想混乱的问题。直至1978年底，广东全省的整风基本结束。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对汕头地委常委同志的谈话》，1978年7月31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对汕头地委常委同志的谈话》，1978年7月31日。



### 三、整风的成效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向中央汇报广东工作问题时，对广东近半年的整风作了全面的总结。

习仲勋首先总结了这次整风的主要工作：“第一，这次整风是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犯罪行的大揭发、大批判，也是对广大干部进行的一场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第二，这次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党力量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全省边整风边行动，在农村认真贯彻中央几个文件的精神，坚持把农业放在首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转变干部作风……；第三，认真把广大干部团结好，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广东的干部队伍是好的，各级领导班子总的说也是好的。这是一个必须肯定的基本估计。同时，也要看到干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在整风中，如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把全省的干部，特别是县以上干部团结起来，充分调动积极性，是关系安定团结、大干快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第四是正确估计广东过去的工作。由于受到‘四人帮’错误路线的干扰，对于建国后这么多年省委的工作，广东的干部群众一直看法不一致。通过这次整风，看法比较一致了。尤其是总结出来的省委工作存在的问题，经过整风，在这方面也补了重要一课。”<sup>①</sup>

但是，整风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用分裂干部、分裂群众的手段，企图毁灭党和国家。这方面流毒很大，危害很广。习仲勋在汇报中说：“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大批老干部，受到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这是相同的；但各人的具体处境和遭遇，又不尽相同，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同志还不自觉地在受迫害的同时，或多或少受到流毒和影响。因此，整风一开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始，干部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并不都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有思想交锋。”<sup>①</sup>

整风在干部中有一定思想阻力，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思想顾虑。有的干部怕“大开门”。怕门开大了群众议论纷纷，讲过头话，讲尖端话，讲片面话，自己难挨。群众则感到讲话不尖不能触动干部灵魂，讲的太尖又怕干部面色难看。有的干部有委屈情绪，感到过去辛辛苦苦干工作，现在又把“四人帮”干扰破坏的账查到自己身上，把传播流毒的账算在自己头上，“受骗上当难免”的情绪又来了。有的干部心有余悸，感到自己过去干的都是以上级文件、上级布置为依据的，究竟哪些是毛主席思想，哪些是“四人帮”篡改的，自己也搞不清楚，怕把毛主席讲的当“四人帮”流毒来检讨，反而会犯更大的错误。加之在全国解放后，在历次整风和政治运动中，往往出现强调组织处理，忽视思想效果的倾向，以致干部们往往会产生错觉，觉得整风运动就是“整人运动”。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干部对整风的误解。

习仲勋认识到，整风的开展必会遇到许多困难，矛盾也是难免的。在对整风的开展的掌握上他强调：“省委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发扬民主，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要放手发扬民主，彻底揭发问题；但又要强调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对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要热情帮助，耐心教育，和风细雨，摆事实，讲道理……同时强调要搞好材料工作，查清事实，严格依据事实作结论，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总之，要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既搞清问题，又稳定大局。”<sup>②</sup>但是，在整风的开展过程中，在整风精神的贯彻执行中，却很难坚持上述的原则。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许多人还没有将脱离实际、上纲上线这种错误作风扭转过来。这就导致在处理一部分同志和问题的時候方法不当，有些过火，引起了一些干部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时任湛江地委书记林若回忆：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sup>②</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因为当时整风过程中人们思想及许多发言、讲话还带有“文革”后期的作风，上纲上线，都还有些过头。所以一些干部认为这次整风没有起到什么好的结果。但冷静的想想，还是分清了一些路线是非的。<sup>①</sup>

尽管在运动的开展中，对于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有些过火，伤害了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感情。但是，开展这次整风的实质是要肃清“四人帮”流毒，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齐心协力把广东的经济尽快搞上去，使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个中心是十分正确的。

习仲勋回顾了上半年广东的抓纲整风取得的成绩。对于这次整风的收获，习仲勋的体会是：

首先，抓纲整风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分清路线是非，肃清流毒的好形式……因为我们碰到的大量矛盾大多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思想认识问题，采用整风的方法，可以比较深入地揭批林彪、“四人帮”，同时又可以广泛发动干部起来，联系实际，自己教育自己。其次，通过抓纲整风，恢复了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我党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原来有的同志怕把矛盾一揭开，不可收拾，捅出乱子。在整风中，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一方面，放手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另一方面，在对人对事的分析和处理上，坚持实事求是，治病救人。这样做，不但没有乱，而且安定团结的局面更加巩固，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断增强。再次，这次整风，实际上是对广东在第十、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重大问题的一次群众性的总结。经过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重大的

<sup>①</sup> 访问林若同志谈话记录，2004年8月6日。

路线和政策问题上，统一了认识，解放了思想，增强了团结。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省委的工作，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提高我们的领导水平的好形式。<sup>①</sup>

总的来说，习仲勋和省委领导开展的这一次整风，对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把广东的工作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各级政府、各个部门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通过整风，恢复了党在农村的正确路线，积极落实中央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使得广东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全省上下统一了认识，清理了问题，总结了教训，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自整风之后，党内真正允许讲真话了，这是一件好事；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干部群众出了气，坚定了信心；特别是大家明白了，犯了错最重要是怎样改过来。整风的开展统一了广东领导干部们的思想，明确了广东发展的方向，促进了广东国民经济的恢复，也为广东接下来的全面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 第四章 标本兼治 解决“偷渡外逃”问题

### 一、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sup>①</sup>广东地处边防，与香港、澳门山水相连，同时，还有持有内地与港澳双方的双重户籍的流动渔民。据统计，1980年初，全省共有双重户籍流动渔船4000多艘，渔民4万人。<sup>②</sup>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解放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群众性的偷渡外逃严重的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国内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加上捣乱分子造谣惑众，结果导致群众性大外逃，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因此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79年6月20日。

<sup>②</sup> 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关于调整流动渔民渔场问题的报告》，1980年2月25日。

“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sup>①</sup>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sup>②</sup>第二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四川时再次指出，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sup>③</sup>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城市政策。

邓小平指出逃港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有问题，边界人民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他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1978年7月，大约在5日至10日之间，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轻车简从，乘坐一辆七座的面包车，前往宝安视察。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

<sup>①</sup> 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广东党史》1998年第6期。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sup>③</sup> 钟文、鹿海啸编著《百年小平》（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



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sup>①</sup>看到此情此景，习仲勋的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深圳。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附城公社莲塘大队1200多人，逃出香港就有790多人；2200多亩耕地，就丢荒700多亩。这个大队的

径肚生产队原有24户，108人，外逃了22户102人。大鹏公社建国后共外逃了3679人，占当时在家劳动力4862人的79.6%，其中有三条村



1978年8月5日，习仲勋在惠阳地区调查研究。

<sup>①</sup> 访问张汉青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



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sup>①</sup>偷渡外逃对宝安的经济、思想、政治各个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搞乱了边防社会治安，严重破坏了生产。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所以上级领导到宝安，方苞等人就一定带他们到这里，沿深圳河边走边看。

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与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都丢荒了。为什么会丢荒？第一，“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允许宝安县的劳动力过境耕作，但是现在管得很死，一天才能批几个干部过去，没有劳动力进行耕作，土地自然就丢荒了。第二，以前过境探亲的政策是“三个五”，即每人每年可以过去探亲五次，每次去可以买五斤副食品，五斤副食品的总价格不超过五元钱。这本来就限制得很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批“三洋”（崇洋、靠洋、向洋）就通通禁止，不准过境探亲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了部分政策，批准一些人过去种粮食，但粮食收割了要挑回来，不准在香港那边卖。所以，虽然有很多地在香港，但劳动力不够，做不过来，地就荒废了。

方苞回忆说：

1977年春节前后，财政部长张劲夫来宝安视察时，我们在这里站了半个多小时。我给他讲了这些问题的历史背景，希望他能向中央反映，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次习仲勋来，我们同样也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包括了过境耕作、小额贸易、过境探亲等问题。<sup>②</sup>

<sup>①</sup> 参见中共广东省宝安县委员会：《关于偷渡外逃情况的报告》，1977年11月22日。]

<sup>②</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一派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

习仲勋对方苞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于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sup>①</sup>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他鼓励地处祖国南大门的干部群众，要为祖国争口气，使外边的人一进来，就感到充满新气象。

从沙头角回县城深圳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的偷渡的

<sup>①</sup> 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深切怀念习仲勋同志》，《广东党史》2002年第4期。

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第二天，习仲勋一行从县城出发，驱车往西前往皇岗。他们来到边防部队设立在一个小山坡上的瞭望哨，在那里用望远镜看到九龙新界、麻坑的情况。接着，又到了水围大队一带，走访了“渔农村”以及民兵英雄郭胜全。第三天，习仲勋前往蛇口的渔业一大队视察。这个大队有五对渔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习仲勋看了很高兴。但该大队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渔船维修没有150吨的船台，零件买不到，口粮供应不足，水产资源受破坏等。

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在听取方苞汇报后，习仲勋就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建立外贸基地问题发表谈话，他说：“外贸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讲求实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你们反映在英界那边有7000多亩的土地，但是大部分都丢荒了。这些土地还是要很好的经营。因为这是



我们边境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也是我们边境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的可以利用的一个重要资源。”方苞提出几种利用这些耕地的方法：第一是过境耕作。第二是可以在那边挖鱼塘或者养鸡，养大后就地拿到香港去卖，不用来回运输那么辛苦。这里要配额，还要考虑出口运输的问题。第三是部分荒地可以开发为仓库出租给香港人用。这样这些荒地就有好几种收益的方法，还可以收地租。另外香港很多废品还可以捡回来。方苞问习仲勋：“这些废品我们捡回来算不算走私？”习仲勋说：“可以捡回来，废物利用嘛。”他又接着说：“沙头角怎么搞上去，你们要优先考虑。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当然，全县其他地方也要加快发展、促进平衡，但是要优先考虑沙头角。现在你们讲这个农副产品配额问题，我们要回去研究。当然，增加你们的配额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国内市场商品也很缺。你们农副产品如果多了，出口有限制，你们可以内销嘛。”他说：“现在广州买剥皮鱼都要排队，你们生产多了不愁销。出口商品要注意包装，搞好包装，这样商品就更值钱。你们还可以搞大型百货市场，让香港人也进来买东西嘛。”方苞在汇报中提出希望能扩大养鸡的规模。当时都是家庭养鸡，养鸡规模比较小。1974年方苞刚调到宝安任县委书记的时候，组织全县办了163个养鸡场，每个鸡场只能养几十只到一百只鸡。而香港一个鸡场能养五万只鸡，差距很大。习仲勋听了就说：“能搞大的养鸡场当然搞大的，不能搞大的也可以搞小的。办外贸鸡场，养不了四万只可以养两万只。生猪出口也要发展，除了出口也要内销。俗话说，养一头猪可以肥一亩田，我们不要单靠化肥，主要还是靠农家肥。要提高农民养猪的积极性，农民养两头猪，一头卖给国家，一头还可以自己吃。我们这次看了，沿边很荒凉，农民负担很重。我看主要还是政策的问题，只要政策搞对头了，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这里是我们国家的南大门，你们要给国家争得荣誉，让外国人进来就看到社会主义的新气象。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很多思想和事情都搞乱了，对的也说成是错的。所以一定要抓好整风，一边整风，一边整改，看清楚

了就改，你们宝安尤其要这样。”方苞等人还提出了发展旅游业的建议，习仲勋说：“旅游业是要发展，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太多，暂时还腾不出手来搞旅游业。”

习仲勋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教育他们要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句话意味着以前被错误批判的一些政策都要恢复过来，例如过境耕作、过境探亲、小额贸易、侨务政策等。他还说：“你们有什么具体问题就找田夫、全国，他们负责具体的工作。”

“你们提出要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省委原则上同意，具体减多少，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边防地区可以不交粮食给省，农民口粮自己解决，然后出口挣外汇。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这实际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来规划、来运作。<sup>①</sup>

他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强调大力抓好外贸出口基地建设，抓好各项规划落实、资金落实。<sup>②</sup>这次宝安之行，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广东却不行。通过对如何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和制止非法外逃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③</sup>

对于方苞等人提出过境耕作和开展小额贸易等问题，习仲勋雷厉风行，指示省委和省革委会尽快落实。7月中旬，省革命委员会便批复同意宝安提出过境耕作的问题。同年冬，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宁批

<sup>①</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sup>②</sup>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1924—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355页。

<sup>③</sup> 参见齐心：《仲勋，我用微笑送你远行》，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2页、539页。



准了宝安县过境兴办养鸡场。因为办鸡场需要人员留在鸡场照看，因此养鸡需要留人在香港那边住也得到了允许。除此之外，小额贸易也进一步扩大。

根据习仲勋视察宝安时讲话的精神，8月20日，宝安县革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反偷渡斗争的领导，采取措施制止偷渡外逃。11月17日，县委成立反外逃领导小组，由县委副书记李定任组长，各公社（镇、场）成立相应机构。这些措施实施后，偷渡外逃问题曾有所好转，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县委认识到，只有顺应开放改革的要求，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办法。<sup>①</sup>

## 二、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县。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學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sup>②</sup>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与历年来较多的7月份相比，分别上升47%和△△，<sup>③</sup>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

<sup>①</sup> 深圳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大事记》（1924—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sup>②</sup> 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的情况汇报》，1978年10月20日。

<sup>③</sup> 报告原文如此。

送阅。”<sup>①</sup>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

根据习仲勋和省委的指示，同年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惠阳、佛山、汕头、肇庆地区和部分县委或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共53人。与会者就全省是年以来反偷渡外逃斗争，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形势，总结了经验教训，研究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抓好反偷渡外逃的措施。台山、东莞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如何抓好反偷渡外逃的经验，使与会者受到很大的启发。与会者一致认为，广东省偷渡外逃这么严重，与当前全国全省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称的，有损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对内对外造成不良的影响。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影响生产，影响社会治安，也影响安定团结和大干快上。为此，会议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破预谋、挖黑窝，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等项措施。<sup>②</sup>

然而，尽管各地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专门研究了反偷渡外逃问题，布置落实上述措施，但人心浮动，有的人仍然铤而走险，偷渡外逃风潮犹如脱缰之马，未能得到遏制。为此，广东省委于同年11月下旬，再次召开了有关地、县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各地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才使12月份的偷渡外逃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隐患仍然很大。<sup>③</sup>由于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水平相差过于悬殊，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000元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

<sup>①</sup> 《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

<sup>②</sup> 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的情况报告》，1978年10月20日。

<sup>③</sup> 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1978年全省反偷渡外逃情况》，1979年1月20日。



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sup>①</sup>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原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sup>②</sup>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sup>③</sup>四是“前段我们宣传上过多的讲外国先进，好像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看不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发生了不良影响。”<sup>④</sup>据统计，1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其中3月份发生51292人，逃出9882人），发生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最严重的是惠阳地区（包括深圳市），发生7.55万多人，逃出1.75万多人，占全省发生数和逃出数的62.5%和60%。4月5日一天，樟木头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达到2500多人，而当天晚上至6日凌晨，边境部

<sup>①</sup> 吴南生：《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1979年10月24日；《反外逃情况汇报提纲》（未署名，从内容来看，应为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文件），1979年6月8日。

<sup>②</sup> 田炳信：《吴健民：创建珠海特区的甘苦岁月》，《新快报》，2005年4月20日。

<sup>③</sup> 参见杨建：《七十年代末广东开展的反偷渡斗争》，《岭南学刊》，2000年第6期。

<sup>④</sup> 广东省委：《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1979年3月31日。



队又抓获了2400多人。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sup>①</sup>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0000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sup>②</sup>

1979年上半年，深圳收容站每天要收容300到400人，但深圳的车辆不够用，根本运不过来。省委为了支持深圳的工作，给他们增加了三部车。但是这还是远远不够，一部车只能装40个人。加上当时路况很不好，从深圳到汕尾来回要三天，到汕头则要三到四天，根本运转不过来。这就使得收容站十分拥挤。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当时边境一带反偷渡外逃问题一直是由省委政法系统负责处理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偷渡外逃问题被当作是敌我矛盾看待，偷渡

① 《反外逃情况汇报提纲》，1979年6月8日。

② 《反外逃情况汇报提纲》，1979年6月8日。



的人被叫做偷渡犯。”<sup>①</sup>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

“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sup>②</sup>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作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sup>③</sup>

据习仲勋夫人齐心回忆，当时“有人反映习仲勋对反外逃不重视，实际上，他不是不重视外逃问题，而是反对以‘左’的方法处理外逃问题，认为把偷渡的人一律当成犯人对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令他深思的是这种沿用以往‘左’的观点、方法和措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的。必须清理‘左’的遗毒，采取标本并治的积极态度，从源头抓起，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逃问题”。<sup>④</sup>

习仲勋和群众心连心，他连忙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

① 访问张汉青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

② 访问郭荣昌谈话记录，2004年12月27日。

③ 访问张汉青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

④ 齐心致本书编写组的复函，2006年12月12日。

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sup>①</sup>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0000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勇于作了自我批评。<sup>②</sup>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映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便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四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

<sup>①</sup> 陈宏：《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民间观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002页。

<sup>②</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习仲勋十分关注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6月10日，他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总结中，专门讲了关于制止偷渡外逃问题。他指出：

为了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今年头四个月，全省偷渡外逃的人数已达六万八千多人，其中逃出一万九千多人，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六倍和十倍。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这个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其中坏人只是极少数，但偷渡是违法行为，必须坚决反对。解决这个问题，是长期的任务。从根本上说，要从发展经济，搞好边防地区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但我们工作做得好不好，关系很大。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把工作做在基层，及时防范。要进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育，揭露林彪、“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破坏。大家共同努力，建设家园，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已发生的偷渡外逃行为，要积极进行堵截。对于收容起来的人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教育，但不要歧视他们，把他们当敌人看待。至于极少数煽动和组织外逃，搞引渡的违法分子，必须坚决给予打击。<sup>①</sup>

省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有关地委、市委、县委遵照习仲勋提出的要求，迅速行动，认真抓反偷渡外逃工作。

---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总结》，1979年6月10日。

### 三、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在听取广东汇报之后，研究了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措施。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人和外交部、港澳办、侨务办、港澳工委、铁道部、公安部、总参谋部、计委、经委、财政部、民政部、外贸部、商业部、农委、粮食部、水产总局、物资总局的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李先念等人边听汇报边插话。当寇庆延汇报到是年偷渡外逃情况很严重，5月6、7日两天有二万多群众冲到边防前沿，港英是年头5个月送三万多人时，李先念说：那么多人跑出去，这个影响坏透了。强调要组织工作组到社队去做工作，省、地、县委书记都要下去做工作，光靠部队、民兵抓还不行，抓到了又要收容遣送，哪有那么多地方收容，被动得很。要大张旗鼓宣传，要贴布告，公开宣传。要给群众讲清楚，群众是有觉悟的，是讲道理的，我们要去做工作。

当汇报到港英对我群众外逃反映强烈，反动报刊大量报导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



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有同志建议，用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文也可以。）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人平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总的是要做好思想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

王震说：广东生产一些蔬菜、水果出口，来得快，很合算，划得来。反外逃，主要还是要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谷牧说：广东省委下决心，是可以刹住的。从长远来看，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个突击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增加点部队和几十辆汽车的问题。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搞好的，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关键问题，不是给你增加几百万元，几十辆汽车，而是省委要加强领导，要做好工作。要把经济恢复工作抓紧一点。办一些事情，有些困难，用外汇进口一点东西，是可以的。我看还是工作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不难解决。慕华同志摸一下，可以给。问题是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把工作搞上去，搞好，不要满足于暂时，要从长远考虑。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的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高群

众的觉悟。港澳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落后。但我们要雄心壮志，能赶上他们。那边好多东西是靠我们供应的，我们努力很快可以发展起来。省委要重视，要加强领导，这是根本。<sup>①</sup>

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人指示，规定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要求广东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会后第二天（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指示》指出，大量群众偷渡外逃，已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少数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由于干部外逃，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无人组织群众生产和生活；由于大批劳动力外逃，地无人种，庄稼熟了无人收，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医疗站关门；不少渔船被盗，渔民无法下海，生产、生活困难；大批外逃人员乘出口货车，物资被盗窃，污损严重，影响很坏。香港舆论界对此反映也很强烈，诬我“政局不稳”，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港英当局也感到压力很大，多次向我提出交涉。为了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提出如下意见，望你们坚决贯彻执行。一、广东省各级党委，对反偷渡外逃的斗争，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在当前，要把迅速刹住外逃风，当做一项紧急任务，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组织专门力量，采取坚决有效措施，抓紧、抓狠，抓出成效。7月5日前，基本刹住外逃风。二、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反外逃的意义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三、切实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是反外逃斗争的一项根本措施。在外逃严重的地区，党委要派干部下去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安排好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四、加强边防管理，作好防范堵截工作。广东省军区要抽调兵力，布防在边防重点地区担任堵截任务，具体布防方案报广州军区批准后执行。五、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偷渡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群众，但其中也有少数坏人。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寇庆延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人汇报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

---

<sup>①</sup> 参见《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听取广东汇报偷渡外逃问题时的插话》，粤办字〔1979〕58号。



1980年春节，习仲勋（左三）与杨尚昆（左四）、刘田夫（左一）参加广州地区军政座谈会。

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国务院、中央军委不但专门为广东外逃问题开会，而且还发文件，并提出制止群众外逃要由党委第一把手挂帅，习仲勋对此高度重视，深感压力很大。他在6月17、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对开展反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省委常委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sup>①</sup>

6月18日，黄荣海副司令员带队到了深圳，19日随部队开到了指定的位置。

6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布告》。这个《布告》规定一切人员出境，都必须经过批准，按指定的口岸凭证出境；进入边境地区，必须持有效证件；对偷渡外逃者，要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79年6月20日。



按照政策收容、教育、遣送，屡教不改者，要严肃处理；对干部偷渡外逃者，要从严处理。对反偷渡外逃有功者，给予奖励；等等。6月27日，《南方日报》发表了《布告》全文，同时发表了题为《坚决执行〈布告〉，制止偷渡外逃》的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特别是边防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要坚决拥护《布告》，模范地执行《布告》，立即行动起来，同偷渡外逃活动作斗争。

省委常委会议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从广州前往惠州，路上看到有几股偷渡的，有二三十人一股的，十几人一股的，七八个人一股的。晚上到惠阳一问，原来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到了樟木头，从汽车跳下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接着，又继续结伙偷渡外逃。<sup>①</sup>

#### 四、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与会的有地委常委以及宝安、惠阳、惠东等沿海地区的县委书记。在寇庆延传达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指示之后，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地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我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他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坚决搞好。

接着，习仲勋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

<sup>①</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在珠海市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6月25日。



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如不坚决制止，就会妨碍我们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并且会由国内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习仲勋对没能有效地刹住外逃风，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偷渡外逃未能及时制止下来，责任在省委。前一段省委对反偷渡外逃抓得不够紧，没有深思熟虑，认真对待，没有作深入的全面动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下面的支持、撑腰也不够。所以，责任要由省委来负。我前段没有花大功夫来抓这件事，没有把注意力转过来，因而也就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习仲勋强调，要进一步统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认识。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造成这次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其二是问题的性质。习仲勋指出，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我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他认为，这次大量外逃的出现，主要原因一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在沿海的渔、盐地区，情况更为严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二是宣传上的片面性；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团、治保、民兵等基层工作削弱了，个别基层单位瘫痪了。三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政治边防”的干扰破坏下，边防工作也削弱了，兵力减少了许多。此外还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煽动和造谣破坏，以及对煽动、组织外逃和引渡的为首分子打击不力，等等。关于偷渡外逃的性质，习仲勋非常明确地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其中有极少数坏人。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

（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证。

谈到治标问题，习仲勋说：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队、民兵要互相配合，团结战斗。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sup>①</sup>

惠阳会议之后，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阳地委、宝安县委和部队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在宝安边境一线，第一天抓了148个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个，第三天抓了615个。<sup>②</sup>

6月24日，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不顾酷暑和连日奔波疲劳，专程赶到珠海市。珠海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1979年6月20日。

<sup>②</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在珠海市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6月25日。



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有人满之患。

25日上午，习仲勋等人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与会的有佛山地区各县、市和珠海市有关负责人（包括部分公社、大队书记），共100多人。习仲勋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地区，第一是惠阳，第二是汕头，第三是广州市，珠海是老四。他对广东没有搞好反偷渡外逃工作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习仲勋说，这个问题没有搞好，我们应该向中央作自我批评。我作为省委的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省委没有重视，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也应重视起来，坚决搞好。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任何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接着，习仲勋指出，反偷渡外逃要把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搞好。这一次我们以三个月为期限，打好这个战役。把这些人截回来，而且都要安置下去，回到他们本地上去，叫他们安心生产。接着，习仲勋在讲话中详细分析偷渡外逃的特点，偷渡外逃风造成的严重危害性以及造成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和性质。

关于习仲勋这次到珠海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吴健民回忆说：

我和习仲勋第一次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是关于珠海市反偷渡外逃的问题。1979年上半年，珠海外逃出现高潮，面对珠海的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说：“边境地区的偷渡外逃问题，妨碍了我省的安定团结，这事情一定要抓。”

记得习仲勋和我谈话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到珠海，现场召开了珠三角地区的反偷渡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省委相关负责人有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珠海市的有市委常委麦庚安、欧培、罗知、甘伟光。会议上大家的议论很多，谈了各自的看法，一度产生尖锐的对立局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逃到澳门去？形成了两种意见。我记得当时部队里的一些同志和我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认为外逃是政治原

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我则认为外逃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农村经济没有搞上去，我们本身对农村的经济政策没有落实，没有往改革方面推进，导致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摆脱贫困状况，与港澳的生活水平形成了很大的差距。讨论中，习仲勋真是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他仔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发言很简练。在最后作结论的时候，他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说：“无论是从农民的觉悟来说，还是从农民直接受到的生活压力考虑，如果把偷渡的农民都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就会把大批的农民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嘛。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更重要的是要怪我们在主持农村工作中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大，作为高层领导，如何听取意见、统一思想，习仲勋给我作了很好的榜样。这件事后，他得到了我们很多人的好感。<sup>①</sup>

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之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sup>②</sup>

<sup>①</sup> 访问吴健民谈话记录，2004年7月20日。

<sup>②</sup> 吴健民：《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8页。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他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1979年，深圳的偷渡外逃形势十分严峻。1至5月，深圳逃出人数依次为：285人，1565人，1855人，1894人，5458人。<sup>①</sup>结果造成田园荒芜，人心不稳，干部情绪低落。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sup>②</sup>会议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他认为文富祥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上思想有偏差，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于是他就向支部书记们重申了要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最终会战胜这些困

<sup>①</sup> 中共深圳市委：《关于继续抓好反外逃工作的指示》，1979年8月21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视察深圳、珠海时的讲话》，1987年2月15日、19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印《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年—1987年）上，第263、268页。

难的。<sup>①</sup>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习仲勋认为，反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这样边境就安定了，人就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宝安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一定要齐心协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7月2日，习仲勋前往深圳收容站，视察那里的情况，找了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的收容人员谈话，开始时这些被收容人员情绪低落、不安。经习仲勋教育，有明显好转，好几个都承认自己错了，再不敢偷渡了。

习仲勋临走之前，方苞等人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深圳市以及宝安县的情况。当时，宝安全县人均分配134元，最高的一年是1974年145元。土地可耕作面积是55万亩，包括旱地和水田，很多山坑地丢荒。而宝安的公余粮负担很重，征购粮食130多万担，年年加码，劳动力却只有9万。1978年最高人口33万人，最低时只有27万人，130多万担粮食，人均粮食负担900斤以上，所以老百姓劳动积极性不高。<sup>②</sup>

习仲勋反复宣传贯彻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基层干部群众研究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了干部群众的信心。

7月6日，习仲勋从反偷渡外逃前沿回到广州。7日晚上，他向国务院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就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问题作了简要报告。报告说：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我和吴南生、黄荣海、寇庆延等同志，先后于6月18、19、21日，到了外逃最严重的惠阳、汕头、佛山地区和一些市、县，同当

<sup>①</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sup>②</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地党委一起研究部署。毗邻港澳的沿海一、二线地区，由部队负责堵截，同时三线纵深地区也加强了民兵的巡逻堵截。6月21日至25日，每天在前沿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员均在千人左右。从6月26日起，深圳市收容站收容的外逃人员开始降到千人以下。6月30日共收容381人，其中港英遣送回来46人。进入7月以来，又继续下降，7月5日只收容56人，其中港英遣送回来5人。从总的趋势来看，去年底以来发生的这股偷渡外逃风，已经得到遏制。港英当局对此也表示满意。

但是，习仲勋认为，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也就是治本，任务仍很艰巨。他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反偷渡外逃，暴露了我们工作上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相当严重。惠阳地区机关科以上领导干部，送子女去香港的有42人。深圳市从去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的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香港风”已经使部分党组织丧失战斗力，惠阳县、深圳市不少地方田园荒芜，深圳市丢荒的耕地达9万亩。由于干部带头申请去香港或送子女出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群众说：“有权的批准出去，有钱的买通出去，没权没钱的逃跑出去。”这些情况，确实令人担忧，如不严加整顿，我们的这块前沿阵地就会跨下来。

在报告中，习仲勋还指出收容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是多年来把外逃人员当犯人看待。虐待外逃人员，对他们殴打、搜身、罚款是常事。收容站卫生条件极差，根本不做思想工作，遣送时戴上手铐或加以捆绑。加上遣返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许多人千方百计逃跑。6月下旬连续多次发生外逃人员在遣送途中逃跑，民兵开枪打死、打伤人的事，摔伤、摔死的也不少。这种种错误做法，不利于教育外逃人员转变思想，对打击极少数真正的坏人也很不利。但是有些同志仍坚持过去那套想法、做法，把偷渡外逃制止不下来归咎于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对待外逃分子。经过花大力气教育，已改变了一些同志的观点。收容站的条件和管理方法稍为改变之后，外逃人员的对立情绪大为改变。这样做，更有利于争取教育外逃人



员，使他们回乡安心生产。<sup>①</sup>

中共中央收到习仲勋的来电后，于7月21日复电广东省委，对省委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指示，作出具体部署，负责同志亲自到外逃严重地区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较短时间里基本上刹住了偷渡外逃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中央复电指出，要从根本上制止偷渡外逃，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广东继续抓好这项工作。首先是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和生产，稳定情绪。同时要抓好干部队伍思想和组织的整顿。表扬作风正派、敢顶歪风邪气，一贯积极为党工作的好干部和在反偷渡外逃中表现好的人员；对那些利用职权，支持子女、亲友外逃的党员、干部，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严肃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对那些领导不力的基层组织要派得力的同志去帮助工作；对个别垮掉的机构，应抽调相当的力量去改组整顿。

中央强调，公开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制造谣言、煽动策划外逃的为首分子是必要的。但要注意少捕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不要把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外逃的群众当犯人看待，不要批斗，不要歧视，而是要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以免产生对立情绪。希望你们及时总结此次反偷渡外逃的经验，提高干部、战士、边防民警的斗志和政策水平，继续作好防范和堵截工作。切不可麻痹松劲。防止出现反复。<sup>②</sup>

7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印发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指出：6月下旬以来，在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大力支援下，我省毗邻港澳的前沿地区偷渡外逃人数逐步下降。到7月初，这股偷渡外逃风已基本刹住。但这只还是治标工作。要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还要继续治本，

---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向李先念、陈慕华同志并中央的报告》，1979年7月7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复中共广东省委电》，1979年7月21日。



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要把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搞好，把党风和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把思想工作抓好。此件可传达到全体干部和党员。请你们根据仲勋同志讲话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党员和群众广泛地进行思想工作。

8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一）各级党委，特别是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党委，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对自己领导的地方，切实负起责任，分级分片包干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要求做到一出现偷渡外逃苗头，就要及时制止，使问题能够在当地得到解决。在今后一个时期，反偷渡外逃要贯彻治本治标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最根本的是要搞好生产和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二）要抓好干部队伍思想和组织整顿，搞好党风，树立正气，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三）大力做好反偷渡外逃的宣传教育工作，用社会主义占领城乡的思想阵地。（四）认真落实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切实改进收容遣送工作。偷渡外逃，总的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坏人和犯罪分子只是极少数。反偷渡外逃斗争应本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对偷渡外逃人员，要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首先动之以理，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反对惩办主义。不要把外逃群众当犯人看待，不要搜身，不要批斗，不要虐待，不要罚款，不要歧视，并且要设法稳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问题，教育他们安心生产和工作。（五）加强边防管理，继续做好防范堵截工作和收容遣送工作。有关今后水陆防卫堵截工作，请省军区和省公安厅共同负责，随时研究总结经验，提出方案报省委和广州军区确定。

这年12月7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道访问香港，当天下午，港英署理总督姬达约请习仲勋会面，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谈。其中谈到内地居民非法来港人数问题。姬达说，自11月初偷渡人数有所减少后，以后又继续上升了。近几天港方平均每天已截获逾400名偷渡者，今天更高达725人，还首次发现有来自福建的人，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心。我们是理解中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华(国锋)总理最近访英时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对广东当局在堵截外逃人员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十分感谢。事实上今年7月亦曾一度有效地遏制了外逃潮。问题是现在的数字仍然很高。此外，合法地来港人数也不少，目前每天有150多人，两者相加，香港就吃不消了。港方估计一年来香港人口因而将增加15—20万，增加率相当于6%（但本港人口自然出生率仅为1.7%）。这对香港的经济、社会福利和防务等方面都带来极大的负担。人们对此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已逐渐产生不满，且越来越不耐烦了。故希望中方能尽速设法解决，避免香港经济因不胜负荷而导致衰退。这对双方都很不利。

习仲勋对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表示对煞住外逃潮的问题，中方与港方是一致的，理解由此将带给香港若干困难，也不想为此增加港英困难。但实际上由于大批外逃对中方的生产等方面影响更大，提到约有9万亩农田已经荒芜。还强调说明中方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姬达对习仲勋的答复表示满意和高兴，并再次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习仲勋还指出，香港有不少引渡集团向内地进行活动，为患很大。我方已先后截获两艘香港“蛇船”。望港方对引渡集团严加打



击，同时，香港报刊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起了鼓励外逃的极坏影响。姬达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我们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港方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来港人数仍嫌过高。他说，不少人持有效期长达八九个月的通行证，协同全家一起来港，名义是探亲，其实都长留在港。他们实质上既欺骗了中国政府，也欺骗了港方。当习仲勋等人表示港方可将这些人劝返内地时，姬达又重弹“人道主义”和产生“黑市人口”的老调，表示港英不拟这样做。

最后，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习仲勋表示同意，具体安排将通过新华分社联系。<sup>①</sup>

12月18日晚上，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龚子荣、王德、尹林平、罗天、寇庆延、王宁、杨应彬、黄静波、熊飞，列席的有黄荣海、薛焰、庄田以及各地市委书记等人。

会议首先由杨应彬宣读了港澳工委上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外交部、广东省委和习仲勋的《习仲勋同志与署理港督姬达会见时所谈内容概要》，然后讨论了当前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习仲勋说，偷渡外逃问题，最近是从水上去的多，陆上也有。从现在情况看，主要是我们工作问题。我个人认为那个文件<sup>②</sup>没有什么大错误，从头到尾强调刹住。一个队有队管住，一个县有县管住，地区有地区管住。但有的地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这些例子多的很。惠阳县一革委会副主任兼澳头大队支书郑某，一家四口都跑了。15、16两天收容人数最多惠阳地区1800多人，汕头5000多人，深圳200多人，佛山219人，广州186人，韶关35人，肇庆33人，梅县3人，外省3人。深圳丢荒听说不止八九万亩，是十多万亩。怎么堵？特别严重的地方多发表意见。我跟许（世友）司令讲了，要人给人。派了黄（荣

<sup>①</sup> 香港工委：《习仲勋同志与署理港督姬达会见时所谈内容概要》，1979年12月12日。

<sup>②</sup> 指中共广东省委粤字〔1979〕72号文件。

海)副司令。现在跑的不止穷的地方,富的地方也跑。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四化要搞。军队也有情况反映。军队在那地方长了也有不可靠。香港有一条法律:到了市区就不抓了。这条要给他谈判,你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

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只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

王宁说,你(指习仲勋)不在家,我回来第二天就汇报,广州抓了1000多(人),有下降,但要大张旗鼓宣传。

习仲勋说,原因很多,请同志们来,想想办法,特别是深圳,责任所在,到底咋搞。由来已久,为什么搞不下。想办法。中央不是给了几条船吗,给个权力,所有的船都搜查。

黄荣海说,最近省委抓得很紧,但几个地区没有降下,反而增加。许(世友)司令有个意见要我直接向你反映,需军队帮助的给帮助。现港澳进步人士不满意,我们自己也不满意。惠阳地区12月1—15日跑了15000人。建议(一)要组织强有力的班子抓这一工作。现在谣传多。把中央二次会议和省委政策贯彻下去,现在还在上头,未到下面去。(二)第二线部队加强。盐田—沙头角方向要加强。现在两个团都堵上去了,省军区还要加大二线力量。建议独立师力量加强二线。(三)当前主要的是加强海上,大鹏岛和深圳方向要加强。(四)深圳本身加强管理。

杨尚昆说,省革委会通过的规定,请王宁研究一下,看有什么补充,提交人大(常委)会重新通过一下。底下确实有些乱,不敢管,相反还同情。逃去的家里还放鞭炮。这完全不对。要适当造点舆论。省委当时的几不准,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第一肯定(外逃)是违法的,第二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当然,也可能有些没解释清楚。这次王宁(去北京)开会,中央有的同志也有这样说法,说省委文件着重在教育方面是对的,处理方面讲少了。这话说的比较准。

刘田夫说,十条<sup>①</sup>是公安部和省一起起草的。这次省人大讨论,

<sup>①</sup> 指《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



是很强大的武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措施。有了这个，是非就分清了。几个主要地区要加强地、县、公社、大队的责任，支持他们，只要按十条办，我们就支持。下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省委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互相支持，认真贯彻到底。省要支持地委，地支持县，一级一级支持，有一条按政策办事。（习仲勋插话：宝安县有一个大队15个支委跑了10个。）现在不抓紧，还会跑。一个不跑，在三几年内不可能。但只要上下一致，像现在这样的风可以刹住。渔、盐民的问题要研究，从经济政策进一步解决。但作为这股风，真正上下解决，也不难。四条艇<sup>①</sup>要快组织起来，海上堵截要摸清它的规律。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熊飞、贾华、许士杰、刘俊杰、尹林平、杨德元、吴健民等。

会议结束前，习仲勋就如何抓好反偷渡外逃问题讲了话。他指出：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确实成了当前破坏广东省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如不解决，势必影响广东省搞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是，对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要充满信心，不要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全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决定了就干，一竿子插到底，分片包干负责，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习仲勋代表省委常委作出决议：

一、加强领导。对省原成立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要调整加强，具体人选由习仲勋和寇庆延、王宁商定。对目前偷渡外逃严重的几个县，由省和有关地区派工作组下去协助，一方面抓好反偷渡工作，一方面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努力发展生产。

二、要造舆论。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拟再提交省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俟补充修改过后予以颁布，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上下一致按照办理。《南方日报》在当前一个时期，对反偷渡外逃和整顿社会治安的问题，要结合起来作适当的宣传报道。

<sup>①</sup> 指中央拨给广东的四艘用来在海上堵截偷渡外逃人员的船只。

三、加强一、二线边防部队的堵截力量。请黄荣海副司令在前往边防察看时具体研究部署，如需充实兵力，可向省委和广州军区报告；如需港英当局配合，可请港澳工委派人来面谈。

四、要注意了解收容的和港英遣返的外逃人员的情况。对其中的坏人要严厉打击；对屡教不改的，处理时要厉害一点，以达到惩一儆百，教育干部、群众的目的。像原惠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郑某那样的人，要与港澳工委商量并请示中央，要港英当局配合，把他引渡回来，予以严处。这方面工作请王宁同志研究。对被堵截收容偷渡外逃人员，可由各地办训练班，对其中屡逃不改的要强制劳动。

五、偷渡外逃严重的地、县，要下决心抓好治本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扶植正气，打击歪风。

六、深圳市的秩序要整顿。省公安局要派出工作组到深圳市调查研究，帮助市公安局，搞好全市的社会治安和管理工作。对国内各地前往深圳设立办事机构等，要严格控制；对外地前往深圳的人员，要严格查对证件。具体由深圳市制订一个管理规定。<sup>①</sup>

12月17日至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这一规定。反偷渡外逃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

为了迅速刹住偷渡外逃风潮，省委和习仲勋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外，各级党组织下最大的决心，坚决刹住偷渡外逃风。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深圳、珠海边防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还增设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而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抢劫船只

<sup>①</sup> 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9年12月18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第70次），1979年12月19日。



偷渡的主犯等，则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惩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省开展的反偷渡外逃专项斗争取得一定的效果，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逐月减少。

尽管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有些基层干部对反偷渡外逃斗争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所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加上广东海岸线长，部队和民兵对偷渡外逃仍防不胜防，堵不胜堵。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92518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sup>①</sup>仅深圳市1—9月，就收容外逃人员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sup>②</sup>到10月底止，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

广东实际偷渡外逃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要高，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sup>③</sup>

邓小平对广东反偷渡外逃工作非常关注。这年6月10日，他就署名“一群港澳华侨”反映广东省和广州市社会秩序混乱、偷渡现象严重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件转广东省委。要解决这种问题，没有决心，没有具体办法，对违法乱纪分子（特别是公职人员、干部子女、亲属）处理如不从严，是不会有较大效果的。”<sup>④</sup>

习仲勋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过问这个问题。经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港英当局在1980年秋开始，也改变了以前的所谓“人道”的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对偷渡人员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很大的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11月份，广东偷

① 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历年来偷渡外逃人数统计》，1980年（原件无月日）。

② 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收容外逃人员数字》，1980年（原件无月日）。

③ 陈宏：《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民间观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004—00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页。



渡外逃人员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sup>①</sup>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sup>②</sup>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深有感触地对他说：

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我们当时吃也没得吃，穿得也很寒酸，所以老百姓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外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

<sup>①</sup> 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广东党史》1998年第6期。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因此，有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开工吹哨才发现，队里六七十个强劳动力一夜之间全跑了。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全都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过上了小康水平的富裕日子，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了的村子，除队长一户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回来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老人家（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sup>①</sup>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

<sup>①</sup> 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 第五章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 一、粤东之行

习仲勋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广东两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

习仲勋刚到广东工作时，正值全面拨乱反正时期，他尽管事务繁忙，再加上中央、省委的会议很多，但却主动争取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sup>①</sup>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带头恢复和发扬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认真倾听下级和群众的意见，给广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继1978年7月上旬到宝安县视察之后，习仲勋接着到粤东三区作为期一个月的考察。

197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习仲勋在省农委副主任杜瑞芝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到梅县、汕头、惠阳地区进行考察。由于当时经济工作的重心是发展农业，而广东的农业在“文革”时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濒临崩溃，以致不少地区特别广州等城市，四季常青却没有蔬菜吃。加之习仲勋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十分关心。因此，习仲勋此行主要是考察这些地区的农业问题。

7月18日至24日，习仲勋首先到梅县地区检查工作。他到兴宁、梅县、蕉岭、大埔等地，先后深入到兴宁县罗岗公社、龙北钢铁厂、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1978年8月7日在惠阳地委的谈话（记录稿）》，粤办字〔1978〕62号。



习仲勋（左一）一到广东，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共商发展广东经济的新思路。

县示范农场、宁新公社东风大队、径南公社章印大队，梅县城北公社上村大队、梅县卷烟厂、地区钢铁厂、蕉岭华侨农场等单位，还到叶剑英元帅的家乡——梅县雁洋公社雁上大队，参观了叶剑英的故居及其母校——东山中学。

习仲勋冒着酷暑，爬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和炼铁炉旁，尽量利用一切机会直接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作调查，听取地、县、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情况汇报，特别是注意了解揭批“四人帮”的情况，政策落实情况，以及“双夏”、农田基本建设、山区建设、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和养猪等情况。在调查中，习仲勋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他强调干部要切实改进作风，多和群众商量办事，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政策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根据梅县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梅县抓纲治梅，加强山区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作了重要指示，提出一些发展农业的意见和建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抓纲治梅方面，习仲勋指出，我们的工作总的来说是抓纲治国。具体到这里就是抓纲治梅，抓纲治县。抓纲要抓总纲，就是要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按照党的十一大路线，按照省委整风的精神，认真搞好整党整风，分清路线是非，作风是非，在路线上、政策上、作风上来个拨乱反正。要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把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sup>①</sup>



1980年5月，习仲勋陪同叶剑英在梅县接见干部和群众。

在山区建设方面，习仲勋对有些地区开山造田，发展山区建设，因地制宜多种番薯、木薯和南瓜，极为赞赏。他认为这件事抓得好，是关系到大局的战略考虑。他反复强调，梅县地区山多人多地少，就是要充分利用山区的有利条件，发展梅县地区的建设。山多田少的地方，就是要靠山吃山，吃山养山。根据梅县地区的实际情况，习仲勋高度评价了梅县山区的巨大潜力。他认为山区山多田少，看来是个不利的条件，但是如果能够把山区建设好，做到靠山吃山，吃山

<sup>①</sup> 《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到我区检查工作时沿途所作的重要指示》，1978年7月18日至24日，中共梅县地委办公室整理材料，1978年7月26日。



养山，物产就会越来越丰富，就会变成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鼓励大家多在山上造林，种经济林、用材林，发展油茶、茶叶、水果，发展养羊、养牛、养兔、养蜂，发展编织业，采摘各种林业副产品，利用山区的水库、水塘发展养鱼，这样就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和大大增加社员收入。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把农业搞上去，习仲勋强调要大力发展养猪业。他说，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猪多肥多，才能粮多。猪养多了，才能提高地力，稳产高产。农业要上去，不大力发展养猪是不行的。他听了各级干部汇报后认为，梅县地区采取两种所有制、三种形式养猪(即公有公养、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是可行的。公有私养对扶助贫下中农困难户有好处。他说，发展养猪还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要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重点要抓好发展集体养猪。各级领导对发展养猪要舍得花力气，只要下决心抓，发展是不难的，饲料问题在山区也容易解决。公社和大队要有良种猪场，积极繁育良种猪。公社党委书记、大队支部书记都要亲自办一个养殖场，把养殖业发展起来。习仲勋还强调，农业要上去，就要搞好科学种田。应把县农场、农科所作为全县农业科学研究的中心，搞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包括种子、土壤、植保、栽培技术等。要充分发挥各级农业技术人员的作用，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搞好农业科研队伍的建设。每个生产队都要培养一至两名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各方面都能懂一些，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县农场、农科所负责训练，同时要把周围的生产队的群众都带动起来。良种要发动群众培育，提纯复壮。县里要成立种子公司，把良种的繁育、推广、保存、调配等工作都管起来。

习仲勋在强调打农业翻身仗的同时，也强调要搞好计划生育工作。他说，要把计划生育放到与农业一样重要的位置来抓。不仅要大张旗鼓地搞宣传，还要狠抓措施的落实。农业要大上，人口要降下来。这两方面都是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一定要抓好。

在发展沼气方面，习仲勋指出，沼气是第二能源，搞起了沼气，可以搞加工，照明、烧饭都可以。还可以提高肥效，搞好卫生，

节约开支。他希望县委书记都应搞个点，由点到面地搞起来。在兴宁东风大队和梅县上村大队谈到这个问题时，当时梅县地、县、社、大队书记都在场。他当场拍板说，我们五级书记今天当面商定，就在东风大队、上村大队搞点，今年年底就把沼气搞起来。<sup>①</sup>

习仲勋特别强调领导干部作风问题。他指出，各级领导一定要坚决转变作风，特别要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实际，参加劳动。党委要亲自抓政策，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不要搞一刀切，把那些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各项政策，该恢复的都恢复过来，要用政策去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7月24日至8月4日，习仲勋到汕头地区检查工作。其间，先后到了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海丰等县（市），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所到各县县委的汇报。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座谈。他先后到饶平县新丰公社、汕头超声电子仪器厂、潮安县枫溪陶瓷公司、潮安县黄厝尾大队、揭阳县三担大队、华清大队等基层单位座谈。

习仲勋非常关心汕头工作。他说，汕头地区人多地少，社员口粮较低，困难较大，这次就是带着这个问题来作点调查，看如何把汕头地区的工作搞上去。他指出：汕头是个好地方，总的来说，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一定要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在领导作风上来一个大转变，把汕头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搞上去。<sup>②</sup>

习仲勋在汕头检查工作中，始终强调要抓好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他指出，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一定要联系汕头地区的实际，深入揭、批、查。对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残酷镇压干部、群众，一手搞起来的一些假案、冤案，一定要彻底查清，严肃处理；对搞阶级报复，造成血

<sup>①</sup> 《梅江报》，1978年7月25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1978年7月31日对汕头地委常委同志的谈话》（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1978年8月11日印发。



案的坏人及其幕后策划者，要坚决打击，否则不足以平民愤。所有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带头揭，带头批。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拨乱反正，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最近中央发出的关于减轻生产队负担和改变干部作风的两个重要文件，并坚决贯彻执行。要造成声势，逐项解决，逐项落实。在贯彻中要注意调查研究，做过细的工作。<sup>①</sup>

对汕头地区如何打好农业翻身仗，习仲勋指出，要用党的政策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认真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总结推广本地的先进经验，因为本地的经验是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的，群众看得见，容易学。学习外地经验，主要是学其精神，要结合本地实际，不能照搬，不能从形式上学。习仲勋说，汕头地区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总的来说汕头地区是人多地少，但具体分析，平原是人多地少，山区是地多人少。对这些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充分挖掘生产潜力。7月28日，习仲勋来到黄厝尾大队，当他听到这个大队去年粮食亩产达到2600多斤，当年春收作物增产，早稻亩产又可增产40多斤，计划亩产要达到2800斤时，习仲勋高度评价了黄厝尾大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抓好科学种田，抓平衡增产的经验，连声称好。他说：你们大队是潮汕平原的一面旗帜，全县、全地区、全省都要向你们学习！但你们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前进！习仲勋到揭阳县锡场公社（今揭东县）华清大队和三担大队视察时，听取了华清大队党支部书记林鹅雷等的汇报后非常高兴，高度赞赏华清党总支及广大人民群众干劲很大，信心十足，路子走对，方向对头，成果显著，特别是当他听到将2万亩的山地落实了责任制后，满意地说：“你们辛苦了，要继续好好干，要不折不扣地落实全会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并就近视察了猪场、茶厂等。在三担大队的田里，当习

<sup>①</sup> 《汕头报》，1978年8月6日。



仲勋看到春收小麦地种下的番薯，并排长着密密的番薯块，估计亩产可达到七八千斤时，感到很高兴。他对地委重视杂粮生产，安排多种点番薯，解决群众口粮问题的做法，认为很好。他说应该首先解决群众吃饱的问题。

习仲勋强调在抓好平原的同时要抓好山区建设。当饶平县委副书记黄松江汇报了他们开发山区，搞林、粮间作，“一手抓了两条鱼”的经验时，习仲勋说：这样做很对！汕头地区有1100多万亩山地，这个潜力大得很。这几年山区建设是个薄弱环节，今后要重视治山，把山区开发起来。靠山吃山，吃山还要养山，不养山就会坐吃山空。潮安县委书记林兴胜向习仲勋汇报开发山区主要采用两条做法：一是组织平原社队参加开发山区；二是注意政策，不要对群众卡得太死。习仲勋说：这两条很好！靠山公社要把山地划分好，规划好，进行开发。平原公社可以组织专业队，划出一些山头给他们，让他们参加开发山区。这里面的政策问题，可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让群众开点荒，目的是为了开发山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

习仲勋每到各县都询问沼气搞得怎么样。他说：沼气是第二能源，汕头地区燃料紧张，更应该大搞。农村要搞，城市也可以搞。沼气可以点灯、烧饭、发电。还可以提高肥效，又清洁卫生。希望地委要重视这一工作，搞得更快一些。

习仲勋还要求地委要进一步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他说，汕头地区人口这么多，不抓计划生育不行，要把计划生育作为战略性的措施，切实加强领导，把人口出生率降下来。

习仲勋在汕头检查工作中，还深入到工厂，了解汕头工业生产的情况。他说：汕头地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轻工业、加工工业，逐步搞成外贸出口基地。当地委和汕头市委领导向习仲勋汇报到全区和汕头市工业的突出矛盾是缺煤缺电缺原材料时，习仲勋说：梅县资源丰富，两个地区可以考虑搞个经济协作区。他还指出，现在集体企业问题很多，产、供、销问题没解决好，要很好调查研究，进一步办好。

习仲勋要求各级领导要在作风上来一个大转变。他说：林彪、



“四人帮”把我们党的作风败坏了。现在用改良的办法不行，必须来一场革命。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怎么能把工作搞好呢？要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作风，要密切联系群众，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扎扎实实地抓工作。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习仲勋还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能听进不同意见，下面干部敢提意见，可以提起我们的注意，很有好处。作为领导，要创造条件，让下面干部敢讲话，让人能无拘束地提意见。要带出一个好风气，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会出现，我们的班子、队伍才有力量，有战斗性。<sup>①</sup>

8月4日，习仲勋结束在汕头的考察，到惠阳地区检查工作。他先后到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7个县、市进行调查研究。8月7日，习仲勋又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和惠阳县、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对东三区之行作了重要的总结讲话。

习仲勋首先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他指出，这次出来，经过梅县、汕头、惠阳地区，共21个县、市。虽说是走马看花，但看总比不看好，下去总比不下去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接触实际，了解下情，多找一些同志谈谈，好处很多。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坐在机关里做决定，往往是主观主义的。所以，习仲勋提议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作为“班长”或领导者，也要注意多创造条件，让下级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什么顾虑。在领导身边，有几个喜欢提意见的人，爱“挑刺”的人，很有好处。不要你一说，他就说是、是、是，对、对、对，而是能动脑筋思考，想一想，到底对不对，并提出建议，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少犯错误。我们领导干部就是要有几个敢提意见的好朋友。有句古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各级领导要善于听取意见。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永远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不然的话，就

---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1978年7月31日对汕头地委常委同志的谈话》（记录稿），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1978年8月11日印发。

会脱离群众，跟群众对立，同群众就想不到一块，就不会关心群众的疾苦。最近，中央发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文件，“七一”公开发表了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指出有民主才有集中，有高度的民主才有高度的集中。中央37号文件讲的是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42号文件强调领导要转变作风，我们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省委的整风，处理白某某问题，为庄辛辛平反等，就是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来一个革命的转变。我们领导机关的作风要来一个大转变，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是为他们办事的。

第二，总结这次考察，总的感觉概括起来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形势很好。首先是政治形势好。省第四次党代会之后，省委于6月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打算以处理白某某问题作为第一步，进一步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从这次所到之处，听到的反映是好的，加深了对十一大路线的理解，省委带了一个好头，问题抓准了，广东有希望了。干部作风开始转变了，下去的多了，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了。大家的思想比以前解放了。这些，说明省党代会后，广东的工作初见成效。问题不少，一个是农业发展不快，有的还极为落后，比如在普宁县，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在耕地，使我感到很难过。这怎么得了，解放29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当然这是极个别地区的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去讲支农，可是农业并没有摆在首要的位置上，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并没有落实。现在企业讲扭亏增盈，有的是“转亏增盈”、“亏”都转到农民头上了。我们要继续搞好整风，真正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全党动员，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现在全国都在努力搞四个现代化，我们广东不要拖全国的后腿，一定要解决好吃饭问题。

现在农业问题不少。消极因素还在起作用，这种消极因素往往在上面。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把很多问题搞乱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该批，什么不该批，直至现在，还不能说都搞清楚了。你起码要叫人把肚子吃饱，不然哪能大干。要大



干，每个劳力每天没有二斤大米不行。吃“保护线”，群众的劲头就起不来。过去搞什么“割尾巴”、“铲土壤”，限制社员养几只鸭、几只鸡，超过了就要批，例子多得很。所以不搞清楚路线是非不行。

从农业看工业，问题很大。工业的问题并不比农业少，表面上有计划，实际各自为政，分散得很，如化肥、水电，各搞各的。这里一个大问题是不了解实际情况，中央和省开完会，回来一传达，或者照抄照转搞个文件，就算完成了任务，而不是以会议精神为武器，去检查解决实际问题。搞工业首先要有一个全面观点，不能光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去考虑问题。我们要搞好广东的工作，也要看到全国的大局，不能光从广东来考虑。现在有的部门就缺乏全局观念。梅县反映，烟叶一经过地区的有关公司，每担就增加成本七元；县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地区物资部门一插手，每吨就拿到六元。这样搞，是挖国家的墙脚，并且把下面的积极性都搞光了。所以，我说当前的问題，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但消极因素主要来自上面。现在整风，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同志们有意见要大胆提，决不会扣帽子，打棍子。

第三，要把农业摆在第一位，全党抓好农业，各方配合，千方百计打好农业翻身仗。

今年早造虽然遇到了40多天时间低温阴雨的影响，推迟了插秧季节，但经过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战胜了自然灾害，粮食生产仍获得了好收成。这次走的三个地区，早造丰收了，人心比较安定，群众情绪高涨，这是好的。但揭阳、普宁县，人平口粮仅有30斤左右。我们广东搞农业首先要保吃的。农民群众天天在那里辛勤劳动，连肚子都吃不饱，你说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因此，一定要尽快地把我省的农业搞上去。

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抓好晚造，要千方百计抗灾夺取晚造大丰收。把晚造丰收拿到手，明年的工作就主动了。这一篇文章作不好，下一篇文章也就难作。对这个问题，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否则就要犯错误。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要围绕夺取晚造丰收去安排自己的工作，决不能各行其是，另搞一套。全党全民都要为夺取晚造大丰

收贡献力量。<sup>①</sup>

习仲勋这次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通过考察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得出了如下结论：“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几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机具制造缺少钢材的问题，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sup>②</sup>这份汇报材料就是习仲勋通过“东三区”调查研究以及在广东工作了7个月之后经过反复思考形成的。

## 二、粤西、粤北之行

1979年2月，在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之后，根据会议的安排，习仲勋到了肇庆地区，在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的陪同下，前往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习仲勋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座谈。他着重指出，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端正了思想路线，发扬了民主，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的意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的谈话》（记录稿），1978年8月7日。

<sup>②</sup>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据陪同到肇庆的张汉青回忆，习仲勋在同基层干部座谈时，“发现有些干部挨了整，受了委屈，心情不大痛快。他说，要说委屈，他也是受委屈的。把他关起来，监护起来，不让工作，一共16年，要发牢骚是有很多可发的。但他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的锻炼。他已60多岁了，他要把一天当作两天用，尽量多做些工作，这才称得上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老干部。他希望受了委屈的同志，振作起来，好好总结一下10多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是很好的学习。这种推心置腹的交谈，使到会同志很感动。”<sup>①</sup>

1980年4月18日至20日，习仲勋到南海县调研，他调查得很认真细致、很深入。据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张汉青回忆：4月16日，南海县召开党代会，习仲勋要我先到南海找县委的同志了解一下党代会的情况，了解南海的经济为什么能够搞得比较快。他对下去的要求讲得很细，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拟提交选举的县委班子、县委的工作报告、选举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县党代会召开之后接着要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直到对南海党代会的宣传报道等，都讲了。我到了南海，听了县委书记梁广大的介绍，将有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向习仲勋作了汇报。4月18日晚上，习仲勋到了南海，他仔细地询问了县委新班子选举的情况和代表们对县委工作报告的意见。4月19日上午，习仲勋参观了平洲的一家电子塑料玩具厂。在路上，他听到南海全县在当年第一季度来料加工企业收到加工费77万美元，等于出口1万头猪，以及在那几个月里签订了72个引进外资合同，合同金额六千多万港元时，非常高兴，认为引进外资的工作还要大发展。4月19日下午，在南海县党代会闭幕式上，习仲勋讲了话。他说，他这次来，是向同志们学习，下级党委是上级党委的先生。今后领导要尽可能走出办公室，跳出文件堆，摆脱事务，到工人农民中去。脑子里原来什么都没有，只是“加工厂”，离开客观实际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他肯定

<sup>①</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6—557页。

南海的工作搞得好，并鼓励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他指出，这次党代会选举产生的班子是好班子，干实事的班子，但县委成员平均年龄达到49.4岁，大了一些，委员中没有青年干部，没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参加县委。他说，今后提拔干部要有文化水平这一条。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会领导生产，不会做经济工作里的群众工作，就不能当领导。他的话讲得很率真，也很亲切，大家听了很高兴。4月20日下午，习仲勋又找新产生的县委委员座谈，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再次肯定南海的领导班子是个好班子，并鼓励大家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做到先走一步。几天的调研之后，他问时任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回答是肯定的。对此习仲勋很满意，他肯定了南海的工作搞得好，鼓励县委领导要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在全省各县中先走一步。<sup>①</sup>

1980年7月5日至15日，习仲勋带领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副秘书长张汉青和省经委、省财厅等部门的有关负责人，到韶关地区调查研究，最主要的是了解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的经验。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先后到了清远、阳山、乳源、韶关、仁化、佛冈等地。每到一地，他都深入基层，工作很深入，很细致，每天工作都在12小时以上，往往听汇报、研究工作到深夜十二点，甚至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为各地干部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清远县，习仲勋用三天的时间调查研究工业经营管理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县城房屋统建和农业经营五定一奖问题。重点调查研究工业经营管理超计划利润提成奖问题，召开清远科局长以上干部大会，对清远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在阳山，习仲勋到新圩公社听取推广种植杂交水稻良种的情况，深入到田间地头，和大、小队干部、社员交谈了解情况，看杂交稻的长势。在县委会议室，听取县委工作汇报和全县推广杂优良种、粮食年年超产的汇报。7月11日上午，习仲勋参加了阳

<sup>①</sup> 《张汉青文集》（上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山县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习仲勋要求阳山充分认识和发挥山区优势，要敢于让“天下之穷处”富起来，赶超南海县。<sup>①</sup>在乳源，听取乳源县委关于乳源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并就如何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作了重要指示。为了鼓励乳源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入地了解乳源的情况，习仲勋在原来没有计划安排的情况下，欣然答应县委的请求，在乳源县住了一个晚上。他对乳源县总结工农业生产所概括的“步子不大年年走，贡献不大年年有”予以赞赏，建议加上横批“稳步前进”；还要求“让瑶山先富起来”。<sup>②</sup>在仁化，习仲勋听取县委书记张帼英等领导的工作汇报，对仁化领导班子的团结给予了表扬。习仲勋还深入到工厂、车间了解情况。习仲勋最后回到地委，听取了地委工作汇报，对地委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韶关地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省委的指示，结合韶关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的韶关地区工作指导方针。指出这个指导方针符合韶关实际情况，符合中央、省委指示精神，应很好地贯彻落实，在落实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

这年7月22日，广东省湛江地区和海南岛遭受将近百年未遇的七号强台风的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广东省政府派出工作组于24日、25日分别前往这两个地区慰问与救灾。习仲勋和灾区人民心连心，他决定亲自视察湛江地区。8月27日至9月2日，在湛江地委书记林若的陪同下，习仲勋一行连续数天到强台风袭击的灾区——湛江市郊区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了解当地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情况，到一些社队看望社员群众，同各级干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今后发展生产、安排群众生活等问题。

8月30日，习仲勋等人视察了湛江市郊区湖光公社。这个公社是七号强台风的重灾区，受淹农田二万多亩，但在党的领导下，社员满怀信心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很快就将10多个海堤大缺口堵复，绝大部分农田已种上作物，社员生活安定。这个公社的临东大队，在台风后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到韶关检查工作时沿途讲话要点》，1980年7月19日，韶地字〔1980〕52号。

<sup>②</sup> 盘万才：《习老关心瑶族地区建设》，见《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97页。



的第二天，出动700多人抢修海堤，五天内便堵复了海堤缺口，然后抽水洗咸，使1200多亩受淹农田及时插上晚稻，充分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当地群众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不坚持集体化的道路，不依靠国家的支援和集体的力量，是不可能抗拒这样大的自然灾害的。习仲勋在临东大队抢修海堤的工地上，同社员亲切交谈，对他们的生产救灾成绩和坚持走集体道路表示赞扬。有一位叫黄祥寿的民工，台风侵袭时他守护海堤，不肯离开岗位，后来海潮决堤，他攀着树枝在水里泡了五个小时，经过顽强搏斗，终于脱了险。习仲勋听了情况介绍，同黄祥寿紧紧握手，表扬他的勇敢精神。

从8月31日到9月2日期间，习仲勋等人先后到了徐闻县和海康县。在徐闻县东海岸的重灾区和安公社，视察了连接金鸡、北莉等五个岛屿的海堤受损情况。这个公社党委书记林茂松汇报说：这次强台风把当地人民连续数年艰辛建成的海堤冲垮了，人们曾一度悲观失望。但经过回忆对比，他们想起解放前一年那次大台风过后，灾民受难，无人过问，新寮岛上尸体遍地，20多户卖儿卖女，2500多人逃荒他乡；而今年风灾一过，省人民政府立即派副省长等负责人前来慰问，又迅速拨来了粮食和救济款、修堤款，没有人流离失所。经过新旧社会的回忆对比，他们提高了战胜灾害的信心，积极行动起来，堵缺复堤，抢种农作物。对他们通过回忆对比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做法，习仲勋表示赞赏。在海康县，习仲勋等人冒雨来到南渡河大堤检查工作，并到附城公社土角大队探望社员。五队女社员王振中的丈夫在这次台风中守护海堤，不幸牺牲。他亲切地同王振中紧紧握手，慰问说：“你丈夫为维护集体利益而牺牲，是很光荣的，人民群众会记住他。希望你把孩子带好。”他还嘱咐社队干部，今后安排工作中要注意照顾她多病的身体及其子女的生活。

在湛江地区和县、社、队干部座谈会上，习仲勋说，这次依靠集体力量取得了抗灾的重大胜利，又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当向社员广为宣传，引导他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把恢复和发展灾区的生产同发挥当地的优势联系起来。沿海地区不要单纯着眼于修复海堤田围垦稻田，更要考虑因地制宜发展蚝、珍珠、海



习仲勋在海康县考察时与群众交谈。

参、鱿鱼、海马、蟹等水产养殖业，以扬长避短，增加收入。灾区特别要注意放宽政策，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搞好生产救灾。<sup>①</sup>

习仲勋在湛江深入基层，先后到湛江、阳江、电白、徐闻、海康、遂溪等地视察。据中共湛江地委原书记王冶回忆，习仲勋“深入基层，探望群众，体现了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温暖”。<sup>②</sup>由于过度劳累，习仲勋在徐闻县招待所不慎跌伤。当时，县委从人民医院抽调两位医护人员为他治疗。习仲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摆架子。在治疗过程中，详细询问了徐闻县医院的情况，还勉励医护人员要加强学习，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医疗技术，要牢记毛主席的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副书记的郭荣昌也回忆说：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视察湛江受灾地区》，《南方日报》，1980年9月7日。

<sup>②</sup> 王冶：《习老给湛江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习仲勋革命生涯》，第601页。

在电白县，当时县委安排他住在县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县委礼堂。习仲勋在休息时，听到下面吵吵闹闹，就问县委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县委工作人员回答说，县里正在县委礼堂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一听，很想参加这样的会议，了解基层的情况。于是县委书记马上安排他参加会议并邀请他在会上讲话。于是，习仲勋就在三级干部大会上作了一通“热情洋溢、很动人的讲话”。当时的基层干部非常感动，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过省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sup>①</sup>

### 三、海南之行

海南岛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面积3.39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热带、亚热带作物、矿产和盐业资源丰富。解放以后30年间，国家共投资40多亿元开发建设海南，海南的各项建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条件落后，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南长期存在场社纠纷的问题，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地纠纷问题，也有工作中的问题。

解放初期，因大规模发展橡胶事业，农垦部门在规划时由于经验不足，缺乏长远和周密的考虑，给个别地少人多的社队留的荒山荒地偏少。农场建立之后，几十年间场社体制几经变更，分分合合，地权场界不清。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扩大了一些土地，工作简单粗糙，有的手续很不完备，遗留问题较多。场社一旦发生矛盾，双方多从本位出发，维护己方既得利益，而处理又不够坚决果断，拖泥带水，对个别带头破坏国家财产的不法分子打击不力，个别地方还有包庇现象，致使偷割抢割橡胶等违法现象不断发生。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场社纠纷发展更为尖锐，严重影响一些地方的生产秩

<sup>①</sup> 访问郭荣昌谈话记录，2004年12月27日。



序和安定团结。<sup>①</sup>

为了了解和解决场社纠纷问题，1980年5月下旬，习仲勋到海南岛检查工作。在海南区党委第一书记罗天、副书记韦泽芳等陪同下，习仲勋到海南许多地方视察，并召集万宁、崖县、保亭、琼中、昌江等县和部分国营农场、人民公社的负责人，就场社的关系问题开了三天座谈会，了解情况，分析研究。

在座谈会上，习仲勋高度赞扬海南各族人民的光荣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的贡献。他说，海南各族人民是很好的。在战争年代，他们在党中央、毛主席和海南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最后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海南岛。解放以来，在海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建立了这么多国营农场，发展了这么多橡胶和经济作物。这是海南各族人民和广大农场职工对国家作出的重要贡献。对那些场社关系处理得好的，应认真总结经验，加以推广。

在座谈会上，当习仲勋听一些同志汇报说，目前场社关系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少数场社矛盾比较多的地方，常常发生纠纷，急需解决时，习仲勋指出，场社矛盾，有的是历史遗留的，由来已久，情况复杂。国营农场与当地社队的体制和土地归属几经变动，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他们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更搞乱了场社关系，造成一些场社发生土地和林权的争议和纠纷。加上无政府主义流毒还未肃清，也给场社关系增加了矛盾。场社矛盾问题，实质上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有的地方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如不迅速制止和纠正，党和群众的关系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既要发展农垦事业，又要发展社队生产，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耐心协商，妥善处理，公平合理地解决。

习仲勋强调指出，解决场社矛盾，第一，必须从解决领导的问题做起，从统一思想认识做起。在解决问题时，双方都要增强党性，

<sup>①</sup> 《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69页。

照顾大局，互相谅解，不要埋怨，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解开疙瘩向前看，巩固安定团结，真正做到同心同德搞四化。对农场职工和社队群众，也要广泛深入地进行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一切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一切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第二，场社关系存在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心平气和，分清是非，充分协商，妥善处理，不能激化矛盾，更不能动拳头，动刀枪。特别是领导干部，头脑一定要清醒，要有正确的态度，并积极地给群众做工作。第三，要广泛开展法制宣传，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制和纪律观念。场社的土地和林权争议，都要在当地党政统一领导下解决。

习仲勋说，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的总目标是一致的。作为海南来说，应当是既要完成橡胶等热带作物生产任务，又要使全岛各族群众的生产不断得到发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群众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有部分社队生产发展不快，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社队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把生产搞好。国营农场要加强支援社队发展橡胶事业，或与社队联营种植一些橡胶，使社队尽快富裕起来。社队要教育社员，维护国营农场的财产和正常生产秩序，搞好工农关系。

针对有的同志反映，目前海南的一些地方发生乱砍滥伐林木，烧山搞副业，毁林开荒，破坏水源林的严重问题，习仲勋反复强调说，制止乱砍滥伐是当务之急。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粮，有水才有各种热带经济作物。乱砍滥伐不制止，海南岛将会变成沙漠岛，美丽的五指山将变成秃山，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各级党政部门要按照《森林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破坏山林。国营林场要有计划地采伐，要大力植树造林。

习仲勋对海南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这几年海南各级党委，包括地方和农垦系统的党委，都做了很多工作，处理场社矛盾，搞好安定团结，为四化建设创造条件。他说，海南岛是祖国的一个宝岛，我们要充分利用海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优势，加速广东经济



的发展，为国家多作贡献。<sup>①</sup>

6月11日上午，习仲勋在广州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王全国、吴南生、龚子荣、王德、罗天、邓逸凡、杨应彬、陈越平，列席会议的有黄静波、范希贤、梁威林、杨康华、曾定石等。会议研究委托刘田夫赴京参加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办理的一些事情和省委当前几项工作安排。常委决定，刘田夫赴京开会期间，要求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解决的问题有11项。其中一项是，“南生、子荣、罗天、定石同志主持研究起草的《关于加快海南经济建设几个问题的提议（草案）》，其中属报请中央、国务院解决的问题，由田夫同志带去汇报”。<sup>②</sup>

刘田夫到北京之后，及时将广东省委关于加快海南建设的问题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国务院对海南岛的问题十分关心和重视，6月30日至7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南问题座谈会。广东省的刘田夫、罗天、薛光军以及海南行署、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省农垦总局



1980年5月，习仲勋在海南岛视察时与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合影。

① 《南方日报》，1980年6月26日。

② 《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广东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1979年6月14日印发。

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家农委、国家民委、农垦部、林业部、水利部、民政部、财政部、交通部、国家水产总局、国务院侨办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有关负责人。7月8日，国务院领导人赵紫阳、万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薄一波听取了刘田夫、罗天和薛光军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这次座谈会，与会者畅所欲言，大家在一些重大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从而为解决海南岛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7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纪要》肯定了海南生产建设的成绩，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出了国营农场和社队两条腿走路，加速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生产，恢复和发展森林资源，建立新的生态平衡，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以及正确地解决场社纠纷问题的原则。这次座谈会及其形成的会议纪要，对解决海南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sup>①</sup>

针对海南岛场社等问题，同年8月12日至18日，习仲勋与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一起，专门主持召开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政府以及海南区党委、自治州委等负责人。会议对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场社纠纷，支援海南岛经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问题作出决定，有力地推动了海南岛的经济建设。

在广东两年多的时间里，习仲勋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总是满面春风，笑逐颜开，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总是和颜悦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sup>①</sup> 参见《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471页。



## 第六章 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 一、书记挂帅，大办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习仲勋到广东之后，通过听取汇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发现广东农业非常落后，存在问题很多。

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认真讨论研究，认为造成广东农业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极左路线的危害：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够正确，对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看得过重，乱抓乱斗，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伤害了很多好人；二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批所谓“三重三轻”（重副、重钱、重个人，轻农、轻粮、轻集体），“分包标”（一种生产责任制），“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等等，没收了自留地、五边地，砍掉了家庭副业，限制了农贸市场；三是片面推行政治工分，取消了定额管理，破坏了按劳分配政策；四是取消了等价交换，搞了“一平二调”，刮了“共产风”；五是搞了“以粮唯一”，限制了多种经营，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六是“瞎指挥”，“一刀切”，侵犯了生产队的自主权。总之，名曰批“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批了社会主义。<sup>①</sup>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此外，管理体制也存在问题。广东农村和全国各地一样，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其主要弊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统得过死，管得过宽，平均主义盛行，存在着集体大排工，出工一窝蜂，劳动无定额，工作无责任，分配一

<sup>①</sup> 参见《南方日报》，1979年3月27日。



拉平，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和干坏一个样的不正常现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没能彻底清理过去“左”的路线错误，广大农民对集体生产积极性不高，因此，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生活水平多年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1978年，广东省农村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77.4元（当年价），其中人均分配50元以下的县仍有11个，“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有98699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33.2%，人均月口粮30斤原粮以下的县有11个，生产队有87493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29.4%。<sup>①</sup>尤其是粤北、粤东、粤西广大山区的贫困农村，农民的日子更加窘迫，长期处于赤贫状态的农民约占15%。这些地方农民迫切要求冲破旧体制，尽快解决温饱问题，走上富裕道路。

习仲勋来到广东后，对于党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经常陪同习仲勋下农村调查研究的张汉青回忆说：“广东的农业在文革时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濒临崩溃，广州四季常青却没有蔬菜吃。加之习老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农业十分关心。”<sup>②</sup>对于农民的疾苦，习仲勋感同身受。他十分重视广东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希望能够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迅速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

建国后，各地党委、政府虽然长期强调以农业为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真正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位置上，对农民和农业取多予少，从农业和农民那里要得太多，而对农业投入太少，加上在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肆破坏，造成广大农民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对于如何落实农村政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习仲勋和省委常委以及各地、市委书记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党政领导

<sup>①</sup> 《广东省农业合作史——伟大·曲折·光明的历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sup>②</sup> 访问张汉青谈话记录，2004年7月22日。



干部，各地、市委书记以及省直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近400人。这次会议是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的基础上，改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是省委常委进行整风。会议上大家最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广东的农业为什么上不去，工作为什么搞不好？省委希望通过整风，改变广东农业落后的状况，实实在在促进广东农业的发展。这也是省委在发展农业上的一项重要举措。6月30日，习仲勋在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表明了省委要下大力气发展广东农业的决心。习仲勋指出：“广东农业之所以落后，最根本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因此，广东农业要翻身，就要从根本抓起，也就是要抓揭批林彪、‘四人帮’这个纲，分清路线、政策是非，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拨乱反正，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极大地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省委准备通过调查研究，集中各地的意见，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有破有立，以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为中心，制订出若干条，把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纠正过来。”<sup>①</sup>



1980年8月底，习仲勋在湛江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习仲勋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农业的领导，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把农业这个基础搞好。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广东的农业没有放在重要位置上。今后省委的主要力量应放在农业方面。大家都说省委抓农业的力度不够，今后我们要加强。我自告奋勇抓农业，同大家一起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特别是地委、县委都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上。”然后，习仲勋提出了党委要抓农业主要要抓几个方面：要抓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落实，搞好经营管理，坚持按劳分配，减轻生产队负担，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反对“一平二调”。要抓“农、轻、重”方针的贯彻执行。从省委起，各级党委、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十分重视农业，都要为打好广东农业的翻身仗作出应有的贡献。要抓调查研究，树立自己的典型，总结自己的先进经验，及时提出需要防止的倾向和问题。主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家多下去跑跑，把先进经验，包括一些教训总结出来，不要光坐在机关开会，听汇报，一定要重视调查研究。要抓农业科研，搞农业的现代化，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sup>①</sup>

同年8月21日至9月4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定要把农业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精神。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用整风的精神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

同年11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中南组作了广东农业要大干快上的发言。他提出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首先，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四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是经济管理体制要迅速作出适应的改变，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他还提出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

在省委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党委加大对农业的重视力度，大力发展农业。1979年1月8日，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的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在1月25日的总结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广东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习仲勋代表省委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几点意见：“要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落实党的政策。特别要抓紧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处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要关心和爱护农村基层干部，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坚决贯彻农林牧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畜牧业、渔业和林业。调整粮食统购任务，认真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要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持工作，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农业现代化试点。”习仲勋再次强调：“省委领导的主要精力要集中到农业上来……省委会后立即调整加强省委领导农业的班子。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解决农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农业委员会由我自己先兼主任，同时加强农口干部的配备，加强农业的领导力量。地、县委第一把手要亲自抓农业，并以主要的力量分管农业。要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各行各业组织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sup>①</sup>

1979年4月21日，省委决定，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亲自抓农业。充分显示了省委对于农业问题的重视以及搞好广东农业的决心。在广东省领导的不断探索实践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广东的农业迅速改观，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 二、恢复和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

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广东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自建国之后，广东从未放弃过探寻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农业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经历过失败，也取得了一定成效。60年代前中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广东不少地方的党政干部和农民群众，冒着极大的风险，曾一度试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60年至1962年，从化、增城、揭阳、澄海等县一些社队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1962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即产量责任制。同年7月，省委以《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为题，批转了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材料。“批语”指出：“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固定地段，包工包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是一个好的管理制度。”<sup>①</sup>省委建议各县都应立即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准备逐步推广。全省有7个县推行了清远洲心公社式的“产量责任制”，一些公社试行“包产到户”。后来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这些行之有效的承包责任制被污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时，广东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仍旧存在着在生产上重复“大跃进”时的高指标、“瞎指挥”、“一刀切”以及不讲究经济效益等错误。1978年5月以后，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开始对“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发起挑战。从这年下半年开始，一些社队为了打破平均主义的不合理制度，更好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始恢复60年代曾经一度实行的“包产到组”的办法，相继实行“三定一奖”（即定工、定产、定成本、超额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

<sup>①</sup> 《介绍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的产量责任制——中共广东省委批准省委工作组的一个调查材料》，1962年7月27日。



不少社队实行定额计分和按时计分的办法。

广东省委在根据农村一些社队实行联产责任制获得增产的经验的基础上，率先在报纸等舆论工具上进行宣传，对于促进全省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省、地、县的领导和各级农村工作部，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中，发现一批生产队的水稻、甘蔗等大田作物实行“联产到作业组”，增产效果明显。10月18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当年的冬种生产中普遍推广“三定一奖”责任制；如果群众不同意，也可以按照政策，采取其他合适的经营管理方法。《南方日报》也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配合省委宣传各地落实“三定一奖”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由于省委的大力提倡和推行，经过1978年晚稻生产和这个年底冬种的实践，全省约有10%的生产队实行了类似“三定一奖”的“联产到组”责任制，大多数生产队的生产和收入都有了较大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珠海县南沙湾生产队，台风把900多棵香蕉刮倒了，四个老农扶起了800棵，劲头很大；如不联系产量，台风吹倒与他关系不大，他只报一报灾情就完了。<sup>①</sup>实实在在的事实引起了干部群众强烈的反响。

11月，广东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农村工作，要求推广“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凡是已建立了“三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地方，一定要按照制度兑现，保证按劳分配政策的贯彻，不能失信于民。由于省委肯定和及时推广，这年冬种，据全省9个地区统计，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的生产队占24.5%，劳动力占14.9%。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加强田间管理，各种作物长势很好，经济收入大都有明显增加，干部群众反映热烈。同时，也出现了生产队分队和包产包户的现象。今年年底，省委提出实行“五定一奖”（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广泛征求地、市、县的意见。

---

<sup>①</sup> 杜瑞芝：《关于建立“三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问题——在全省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12月23日。

习仲勋对于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1月，他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要在加强定额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计酬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按定额记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以评议；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有些生产队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对促进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应当认真试点并由点到面推行。”<sup>①</sup>省委对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肯定促进了它在农村的发展，广东农村的面貌开始发生改变。

1979年2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建立“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要求按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坚持生产资料统一支配，生产计划制订和重大措施统一决定，劳动力调配、财产处理和产品分配由生产队统一进行的大前提下，各地大田生产可以普遍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意见》指出：“实践证明，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当前农村实行的生产责任制中比较好的一种形式，因为它把社员的劳动同产量联系起来，在定额管理的基础上，解决了只顾数量争工分，不顾工作质量这个矛盾，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产量联系到作业组，看得见，摸得着，算得出。联系产量，超产奖励，把劳动成果和个人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产生了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想办法把生产搞好。这种做法，不是后退，而是前进，提高了群众觉悟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是改变原核算单位，削弱了集体经济，而是更加巩固了核算单位，巩固了集体经济。”因此，省委表明对这种生产责任制的态度是“应当总结经验，根据群众的意见稳步推广”。在此基础上，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的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推广开来。这种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主权的做法，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响应。1979年5月20日，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项有力措施——关于广东农村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的调查》长文，对广东实行“五定一奖”责任制给予肯定，认为“五定一奖”责任制走在全国的前列，是中国农业体制改革的最初实验。省委文件和《人民日报》的报道，受到了全省广大农民的拥护。各地普遍执行了这种生产责任制，有力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因此，在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然而事实上，在广东农村的一部分地区，尤其是比较贫困落后的地区，农民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了“包产到户”的实践，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就要到来。

### 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东农村自发地尝试推行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比较早的。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是湛江海康、海南岛文昌县、惠阳地区的紫金县和广州市郊县的部分公社。这些地方的农民，为了解决吃饭和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率先行动起来，冲破禁区，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

1977年冬种时，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首先实行冬种作物联产到户的试验，谁种谁收。从1979年上半年起，在大队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当年农业获得大增产。<sup>①</sup>1978年海南岛大旱，为了让农民度荒，夏种时，文昌县一些公社允许农民使用集体土地种植番薯，实行谁种谁收。冬种时，海南行政区在海南北部部分县区推广文昌县的经验，鼓励农民使用集体土地多种番薯，终于度过饥荒。

惠阳地区的紫金县上义公社是个十分贫穷的地方，年均人收入只有50元，农民下决心靠自己找出一条活路来。1978年冬，该公社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责任到户。这一做法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调

<sup>①</sup> 雷仲予：《广东先行一步见闻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02页。



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了大增产。

山区农民生活贫困，广州市郊区农民日子也十分艰难。1978年，三中全会还没开，杨箕村就搞起了“包产到户”。同年冬，从化县江埔公社有3个生产队也尝试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上述地区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后，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周围农民看到这种情况，纷纷效法。包产到户迅速蔓延开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关于发展农业的文件，对于纠正农村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仍作出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基于这一原因，加上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一些社队实行包产到户，后来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因此，使人谈“包”色变，心有余悸，不易把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这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形式与资本主义道路区别开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以及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对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

虽然农村基层有人在偷偷实施“产量责任制”，但谁也没有公开说。据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回忆，习仲勋来广东后，农村体制改革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天晚上，他去从化回来，找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我（当时我也参加农业这条线）去，谈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我们是否可以推广。我们就把上面说过的‘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态度异常坚决，表现了领导者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sup>①</sup>

湛江、惠阳、海南、梅县等地区的部分生产落后的社队，自发

<sup>①</sup> 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564页。



地实行起包干到户和包产到户后，引起了省委领导的关注。在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在一段时间里上下有不同的看法。广东“一些粮产区怕突破原有体制后不可收拾，滑到单干，公粮收不上来，而贫困地区则很积极”。<sup>①</sup>而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有关农业的文件明确规定了“两个不许”；1979年3月29日，以国家农委名义上报中央批准全国参酌执行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议纪要》，即中央31号文，又提出了“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习仲勋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即使对于中央的决议有不同看法，按照组织原则，他也不能不贯彻执行。

在省委1979年6月上旬召开的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以及12月中旬召开的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对于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都是作为“歪风邪气”和“破坏集体经济，破坏生产力，是历史的倒退”的方向性问题加以批判。但同时强调在工作中要切实帮助这些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1980年3月，省委、省政府组织春耕生产大检查。检查组到了农村深入社队了解情况，农民大都反映实行联产到人、包产到户之后，粮田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如湛江海康县东里公社一直是远近闻名的“三靠社”，每年都有大批人逃荒，1978年冬种公社党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番薯地搞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结果粮食大增产，社员们都吃饱了肚子，也就没有人逃荒了。群众高兴地说：“这种政策好，这样搞吃饭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在上级领导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认识不一致的状况。一段时期内，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使政府和农民形成一种“拉锯”状态。

据1979年10月中旬不完全统计，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惠阳地区分别占总队数的4.3%和4.8%，户数占总户数2.5%和4%；海南区占总队数8.3%和19.9%。湛江地区9月底统计，分田单干的20986户，占总户数1.1%。到了1980年5月中旬统计，全省包产到户的生产队25972个，占总队数6.8%，户数有56万多户，占总户数的

<sup>①</sup> 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64页。

6.1%。<sup>①</sup>实际上，包产到户的社队数还远远不只此数，这些星星之火，已经逐步发展成燎原之势。

习仲勋和省委领导干部在广东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思想解放、逐步深化认识的过程。面对农村出现的经营管理体制的问题，省委于1980年4月25日、28日召开常委会议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在这之前，国家农委于1980年3月印发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纪要》中提出：“极少数集体经济办得不好，群众生活很困难，自发包产到户的，应当热情帮助搞好生产。积极引导他们努力保持，并且逐渐增加统一经营的因素。”因此，省委常委根据《纪要》的精神以及对实际情况的考察，改变了对包产到户采取的一概反对的态度。这次常委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部分“三靠队”社队集体经济的基础很薄弱，生产长期搞不好。在这类社队，目前群众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要求实行或者已经实行“包产到户”。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这些社队的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sup>②</sup>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省委于1980年5月16日至27日在广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13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50余人。

会议期间，省委常委听取了地委负责人和县委书记的详细汇报，并同他们进行了座谈。会议由习仲勋作总结，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德和省委常委薛光军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者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实行包产到户能达到增产的效果，让群众吃饱肚子，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认为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小农经济，

<sup>①</sup> 《广东省农业合作史——伟大·曲折·光明的历程》，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印发〈关于当前农村工作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1980年5月12日。



已经实践了几千年，事实证明不行才实行合作化。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干部又有这么三种原因：有的是在60年代的时候支持过农民搞包产到户，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一提到这个问题就心有余悸；有的是受极左路线影响较深，“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联产责任制抵触情绪很大，因而不能正确看待问题；有的没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联产责任制心中没数，对于工作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

27日，习仲勋针对干部对包产到户认识不一致这个问题，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对这个问题，省委没有及早派人下去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帮助有关的地、县领导解决好这个问题，存在官僚主义，要作自我批评。有些地方，问题发生后，情况相当严重，但没有报告省委，使得问题的研究解决，拖延了时间，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教训，说明我们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还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次有些同志来开会，担心会挨整，心情有点沉重。我要告诉同志们，省委常委开了会，一致认为不应互相埋怨，也不应当整人。前段时间出现的问题，省委有责任。现在最重要的是弄清情况，找出原因，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得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地去解决好这个问题。”<sup>①</sup>习仲勋代表省委说的这番话，首先稳定了干部们的思想，帮助广大干部在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正视农村的形势，树立正确的态度。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再联系各地包产到户所取得的成效，很多干部都开始转变了观念，客观的看待和思考农村的包产到户问题。

接着在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解决方法上，习仲勋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要用压制办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5月27日。

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sup>①</sup>当时，省、市、县领导把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仍属集体所有，实行包产、包工、包费用的包土地到户也笼统地认为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

省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1980年7月3日，省委印发了这次会议形成的文件《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其中明确了省委对于搞好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稳定生产关系，坚决制止分田单干，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对农业的领导等问题的态度和政策。省委指出：要切实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在一些地区的困难队，可以允许采取各地实行的各种“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但是，必须坚持“四统一”、“四不准”（生产资料由生产队统一分配；种植计划由生产队因地制宜统一安排；定产内的产品由队统一分配；农田基本建设等所必须的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同时向群众明确宣布：不准拆散、破坏集体财产；不准破坏森林、果木；不准分掉公积金、公益金；不准在责任田上盖房子。）……实行“包产到户”是特殊困难地区的一种临时措施，权宜之计，如果不坚持“四统一”、“四不准”，就有滑向单干的危险性。对实行这种办法的生产队，要严格控制，由县委或地委审查批准。广州、佛山、肇庆、韶关等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地区不宜采取这种办法；个别困难队，如有要求实行上述办法的，是否允许实行，由地委决定和审批。至于那些不是特殊困难队，已将大田水稻实行上述办法的，县、社要积极引导他们改正过来，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建立责任制。<sup>②</sup>尽管这种政策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冲破了巨大的阻力的。

为了帮助各地农村解决好生产经营管理问题，习仲勋在5月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曾提出：“在会议之后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5月27日。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印发〈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1980年7月3日。



习仲勋在湛江农村视察时与青年交谈。

和当地党委一起，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积极提出建议，认真负责地解决好当前一部分地区的这些问题。”于是，在会议结束后，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230名干部组成调查组，奔赴16个县。这次调查组下乡，做到了深入群众，到户访问，了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原因，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真实状况，细心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省农委领导杜瑞芝在亲赴“分田单干”重灾区紫金县进行调查和工作，并同省赴惠阳、河源、和平县调查组及地县委的领导交换意见后，于1980年6月、7月给省委写了两份报告，反映了农村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情况。其中的一些例子集中反映了基层和农村干部、群众的心声。报告中说到紫金县有个王坑排生产队，13户，住在海拔600公尺的深山，东南西北头尾七华里，三五户居住在山顶和山沟里。跑到一起口都干了，一天做工做不到五小时。在打大捞<sup>①</sup>的年代，群众说：不是做死，而是拖死，户户要靠砍树买高价粮过日子。

<sup>①</sup> 打大捞，其意思干多干少一个样，搞平均主义。

1974年底，他们偷偷分给每人一分番薯地，亩产从700斤增至3000斤。到1976年春节又将全队65亩农田，40亩分到户种，25亩作公田。这一年粮食亩产从500斤增至1000斤，口粮从304斤增到520斤，户户缺粮变余粮，超支的不超支了，还第一次买单车、大板车。口粮解决了，树也砍少了。因此，他们说搞包上交比打大捞好多了。调查组的同志都深深体会到，二十多年来体制多变，在分配上搞打大捞，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群众不相信党的政策。官僚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害死群众，经济管理形式决不能一刀切。根据调查的情况，杜瑞芝向省委提出了如何对待包产到户问题的一系列建议。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在阅读完报告后，感觉写得很好，很能反映问题，于是印发给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切实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sup>①</sup>邓小平这一谈话，更加坚定了省委和习仲勋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决心。

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的具体情况，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它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边远山区、深山老林的单家独户，硬要合在一起大排工，费时误事，对生产不利，由这些农户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对那些已分田单干的地方，也不允许单干户完全脱离生产队集体，他们还要对集体承担一定的责任。”<sup>②</sup>省委领导对包产到户问题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的看法，正在随着实践慢慢转变，决策也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在中央和省委提出允许试验，允许等待的情况下，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sup>①</sup>

1980年9月，习仲勋来到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视察，在徐闻县，习仲勋在县、社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他说：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不要骄傲自满。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sup>②</sup>

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对包产到户问题的逐渐认识的这个过程里，做到了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重视调查研究。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揪，因此没有重犯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压下去的错误。

<sup>①</sup> 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64页。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徐闻县县、社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9月1日。



同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并提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sup>①</sup>

10月6日至14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了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对如何贯彻执行中央75号文件的精神进行了讨论。10月18日，省委发出了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要求抓好加强和完善生产责任制这个中心环节，从实际出发，允许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存在，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完善。中央75文件和省委通知，对广东农村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件精神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化暗为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地搞起来了。

到1980年底，全省有40%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梅县地区包干、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总队数的87.8%，汕头地区占66.1%，惠阳地区包括分田单干占79.7%，海南行政区、自治州和湛江地区包产、包干到户加上单干占40%—60%。农村包干、包产到户，不仅在贫困地区，而且在珠江三角洲等富裕地区也迅速推开了；不仅粮食生产包干、包产到户，而且连林业、畜牧业、渔业和乡镇企业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广东农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在1979年增产21亿斤的基础上，又增产了11亿斤；农村人均收入达274元，比1979年增收51元。农村开始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是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这些喜人的成绩，都凝聚着习仲勋和广东省领导的心血。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27日。



#### 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广东长期以来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多种经营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面对这种情况，广东省先走一步，迈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步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省委积极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东实际，在1979年1月中旬召开的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决定增产措施。省下达的种植面积计划，只作为参考，不得强制执行。制定农业生产计划要走群众路线，做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调整粮食统购任务，认真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结合我省征购粮和超购粮任务偏重的实际情况，省委将提出减少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上报中央。”<sup>①</sup>省委还提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量、国家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合理安排水稻和旱粮比例，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各地、县要建立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特别是要加速珠江三角洲27个县、市农业商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各地根据会议精神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1979年全省减少粮食征购任务基数4亿斤，重点照顾口粮偏低和粮食负担偏重的地区。1979年下半年，习仲勋到宝安视察工作时还特别关心当地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回忆：

（19）79年11月份，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仲勋同志在宝安视察时说过：“什么值钱你们就生产什么，香港什么挣外汇多你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们生产什么。”鲜活商品在香港市场价格高，这就需要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多发展鲜活商品生产，以满足出口香港市场的需要。以前的政策粮食面积的多少是死命令，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造成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的调整。<sup>①</sup>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1979年虽然在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年粮食总产量仍达到340亿斤，比上年增产15亿斤<sup>②</sup>；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都逐渐增加。

1979年12月，省人大五届二次会议肯定了1979年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经验，要求各地进一步自觉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商品生产，增加集体的经济收入。习仲勋在会上提出：“在搞好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逐步合理调整种植面积。全省要建立一批商品粮、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基地……提高畜牧业和渔业在农业中的比重。在积极发展养猪的同时，大力发展牛、羊、兔等食草牲畜；大力发展海水养殖，改造低产塘，提高淡水养殖的单产。林区要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大搞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接着的1980年5月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省委提出充分发挥广东的地缘优势以及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在大力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的同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决定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和用蔗糖等产品同外省交换粮食，为发挥广东省优势，合理调整农业布局创造条件。大办社队企业，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搞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社队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和不改变所有制的前提下，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联营。

<sup>①</sup> 访问方苞谈话记录，2004年7月16日。

<sup>②</sup> 《广东省农业合作史——伟大·曲折·光明的历程》，第129页。



由于1980年全省进一步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因此，这一年粮食播种面积虽然减少了431万亩，但是总产量仍达359.4亿斤，比上年增产13.8亿斤；花生、大豆等多种经济作物大量增产；农村人均收入274亿元，比上年增加51元，口粮人均515斤，比上年增加20斤，交售国家粮食73亿斤，比上年增加2.1亿斤。农村社员储蓄存款余额13.9亿元，比上年增加5亿多元。<sup>①</sup>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农民脸上喜气洋洋，真正感觉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农村的经济改革，从“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逐步走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经济体制。这是农民的创造，是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的一项伟大实践。它冲破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组织模式，开拓了一条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习仲勋主政广东时间虽然很短，可是，这正是广东农村经济的伟大转折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他带领广东人民走在全国前列，恢复和发展“三定一奖”、“五定一奖”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发展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的历史时期。

<sup>①</sup> 《广东省农业合作史——伟大·曲折·光明的历程》，第130页。

## 第七章 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

1978年金秋10月，中共广东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习仲勋对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sup>①</sup>这些要求，尽管只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已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直到11月8日，汇报提纲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最后定稿。11月9日，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分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以及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乘飞机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210多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按地区划分为六个组。由于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所以参加分组的共211人。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被分到各组参加会议。

中南组：共34人，召集人为段君毅（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华（外交部部长）、杨得志（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一组的有邓颖超、廖承志、习仲勋、程子华、邓华、陈漫远、王全国、薛光军等中南五省区以及广州军区、武汉军区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地点在第十四会议室。据王全国回忆，习仲勋、薛光军和他三位都是会议的活跃分子，他们所在的中南组也是

<sup>①</sup> 见《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记录102-105》，1978年10月24日。



会议上比较活跃的一个组。

11月10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开幕会。这是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副主席因出国访问，刘伯承、李德生、耿飏等11人因事因病请假，实际到会人数为200人。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接着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的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关于这个问题，全国计划会议已经进行了讨论，并且为这次会议准备了一个文件，也要发给大家。（三）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在宣布了三项议题之后，接着讲了议题之外的另一项议题。他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希望大家讨论“这么做适当不适当？各级党委的工作如何实行这个转移？随着这个转移，明年要注意抓住什么大事？我们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怎样适应这个转移？”<sup>①</sup>华国锋在讲话中讲到经济问题，讲了国内经济形势，也讲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讲了要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他离开讲稿插话说，西方国家和日本积极要求发展和我们的贸易，想在中国打开市场，国外也积极到我们这儿来投资。他们在广东搞了机械化养鸡厂、手表厂、电厂。国际形势现在也是很好的。正因为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善于利用这个形势吸收外国的技术

<sup>①</sup> 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78、75、76页。

和资金，来大大加快我们的建设速度。<sup>①</sup>华国锋在讲话中讲到广东已开始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对与会的习仲勋等广东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11月11、12两日，各组开始讨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言，表示拥护中央政治局这一决策，认为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国际形势非常有利，中央及时地、果断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是适时的、正确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不少人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畅谈了下一步实施工作重点转移的打算。

11月13日下午开始，会议转入原定的第一项议程，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会前，习仲勋和其他与会者，已于11月10日、11日、12日分别收到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关于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说明报告》（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1978年11月9日讨论稿）。

11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邓小平因出国访问未到会。乌兰夫、刘伯承、李德生、耿飏等17人因事因病请假。实际到会人数194人。

华国锋主持了会议，说：昨天晚上，请各组召集人汇报了会议进展情况，商定从今天下午起，转入讨论农业问题。

随后，习仲勋和与会者听取了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就《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讨论稿作了说明。纪登奎共讲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农业现状；（二）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三）关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四）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

---

<sup>①</sup> 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80页。



主要措施；（五）关于领导问题。

会议最后，华国锋讲话，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性。华国锋提出，从今天开始，用六天的时间，讨论三个文件。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集思广益，对这几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

从11月14日开始，习仲勋参加中南组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习仲勋在发言中回顾从本年6月初起，中共广东省委带头整风的情况。他说，省委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这次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党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林彪、“四人帮”对广东农业的破坏，确实十分严重。粮食每年增长低于全国水平，也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在祖国的南大门，群众却吃不饱肚子，怎能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安定团结呢？林彪、“四人帮”对广东农业的干扰破坏，概括起来；一是破坏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总方针；二是破坏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三是搞乱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破坏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四是破坏了我们党领导农业生产的优良作风。这些破坏，从黄永胜、刘兴元一伙当权开始，搞浮夸作假，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刀切，削减农业投资，大砍经济作物，直到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把农民群众当成专政对象，造成严重的恶果。整风中揭露出来的有关农业的种种问题，都说明了要扭转广东农业落后的被动局面，打好农业翻身仗，关键还是要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特别是要肃清假左真右的流毒。

随后，习仲勋就广东如何大干快上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中心问题是要坚决把农业搞上去。他沉重地说，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

紧接着，他谈了广东省委的一些想法。

第一，要重新认识农业问题。

首先，对“农”字要解放思想，放宽眼界。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吃饭问题还是解决得不好，工作越来越被动，路子越来越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农业理解得很片面，生产布局不



当。这是个极其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按照农、林、牧、副、渔五业同时并举，五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同时并举，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原则，制定好规划，特别要狠抓薄弱环节，把畜牧业、渔业提到重要位置上来，争取尽快作出成效，以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增加国家的出口。

其次，在生产布局上，要大胆发挥广东的特点，广辟生产门路，把经济工作做活做好。广东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可否这样设想：在保证粮食自给的前提下，让广东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社队企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加强同港澳、华侨的各种经济合作。如果中央同意这个设想，我们决心动员全省人民作出成绩，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是要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农业要大干快上，主要的是政策问题。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个大政策，并且写进了新宪法，要坚决照办，不能朝令夕改。关于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也是一个大政策，必须用各种办法，保证实施。当务之急是适当减少生产队负担，中央对此已有专门指示，我们坚决执行。关于实行基本工分加奖励，严格生产责任制，关于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等问题，中央都讲得很清楚，这是有章可循，并且又是有过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之凡是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都必须维护其严肃性，取信于民，长期坚持下去，不要轻易改变。

四是经济管理体制，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另一方面在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解决农具制造所需的钢材，建立强有力的支农工业。



习仲勋接着说：第二，农业大干快上，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恢复元气，巩固提高，挖掘生产潜力，同时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他提出，首要的还是抓粮食，把发展农业的底子填高、培厚、加固，使群众的口粮能够逐年有所提高。主要措施：一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尽快把珠江三角洲27个县（市）、近1200万亩农田建成稳定高产的商品粮基地。二是要切实保证农民所必须的生产资料，首先是要多搞些化肥。三是把科学种田的水平提高一步。习仲勋在发言中，还分别谈到如何发展畜牧业、经济作物、海水养殖业和海洋捕渔业，开发海南岛以及城市副食品供应等问题。<sup>①</sup>

根据华国锋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意见，农业问题只讨论六天，也就是到11月19日结束这项议题。但在讨论中，与会者提出很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汇报，要求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党中央赞同他的意见。图为习仲勋在广东省委工作会议上讲话。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多意见，要求修改和重写两个农业文件。这样，就不可能按时结束讨论了。

按照统一布置，从11月19日开始，各组由召集人牵头，分别组成修改小组，开始修改两个农业文件。各组经过反复修改、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起草了对两个农业文件的书面修改意见。

11月21日下午和晚上，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听取了各组召集人关于讨论两个农业文件的汇报，并作了指示。11月22日，各组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后，又分别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讨论，先后写出书面修改意见，并改写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直到11月25日上午，这一项议程才暂告一段落。

这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也非常注意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以及对外开放的经验。有关部门整理了一些有关资料。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为了开阔与会者的视野，借鉴有益的经验，经邓颖超向李先念建议，李先念同意并报华国锋同意，于11月23日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四份材料。这些材料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sup>①</sup>

《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介绍说：新加坡、南朝鲜和中国的香港、台湾，目前是一种类型的经济发展很快的国家和地区。西方称之为“中进国家”，或所谓“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各自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以加工出口贸易为主导，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二）高积累，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这是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三）吸收外国过剩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四）加强经济管理

---

<sup>①</sup>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60页。



机构，推广企业管理经验。（五）注重教育，大力培养科技人员。<sup>①</sup>

会议印发的这四份材料，无疑给习仲勋等与会者开了眼界，也打开了思路。不少与会者看后提议：要改变过去“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充分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形势，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速度。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面的法律，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

在讨论中，对于对外开放，许多与会者认为闭关自守等于慢性自杀，要下决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资金，进行国内建设。

当大家还在临渊羡鱼的时候，广东已经付诸行动，张网捕鱼了。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中，结合广东具体实际，谈到如何加强对港澳的经济联系和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问题。他介绍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展开。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金额3350万美元。积极开展这项工作，不仅有利于开辟劳动力的出路，而且对提高技术，促进外贸，发展工业，也大有好处。习仲勋建议中央考虑：鉴于广东与港澳来往密切，希望能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

习仲勋指出，调动华侨建设侨乡的积极性，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今年以来，除华侨商人要求搞加工装配外，有些人还提出在广东建高级宾馆，协助开展旅游和华侨回国观光业务；有些人要捐款兴办华侨学校等社会福利事业以及修建快速公路等。习仲勋说，为了适应华侨建设祖国的需要，我们研究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恢复华侨投资公司，资金统一筹措，单独核算，计划安排，合理使用。二是请国

---

<sup>①</sup>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60—261页。

家优先安排，帮助广州的建筑行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三是对一些重点侨乡县，要帮助他们分别作出建设规划，以便利用华侨资金，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工作。<sup>①</sup>

习仲勋发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谈到了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商业并举，发挥广东优势，放手发展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渔业，放手发展外贸出口工业，给地方更大自主权，吸收外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强广东与港澳经济合作，以及调动华侨建设祖国的积极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实际上成为后来广东要求中央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先声。

习仲勋关于广东如何大干快上的发言，切实可行，具有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地方特色，与会代表都赞成他的观点和所提做法。

习仲勋等与会者的意见，使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了，正式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他提出了“两大政策”，其一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生产队，一部分职工、社员先好起来，先富起来。其二是“权力下放”。他说，“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sup>②</sup>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两大政策，使与会的习仲勋和王全国、薛光军“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提高，长期反思探索的问题在认识上取得了大的飞跃”。<sup>③</sup>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讨论工作重点转移时，谭震林等与会者提出了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5—146页。

<sup>③</sup> 王全国：《参与制定广东特殊政策前后》，《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32—533页。



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11月12日，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突破议题，最具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陈云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王鹤寿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党和革命的贡献很大，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批判康生的严重错误，<sup>①</sup>等等。

陈云这一发言一讲完，会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陈云提出，希望大会将他的发言发个简报，得到小组成员的一致同意。当天，会议秘书组就印发了登载陈云发言的简报。

习仲勋看了这一简报，反映十分强烈，表示热烈拥护和赞成。他觉得陈云不愧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站得高，望得远，代表了大多数与会者愿望，说出了自己想说而没有说出的心里话。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涉及到“文化大革命”和建国后的“左”倾错误以及对毛泽东的评价等重大问题，其中两个问题，即彭德怀平反问题以及康生的罪行问题，都与习仲勋密切相关。彭德怀功勋卓著，举世公认，把他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实属一大冤案。而习仲勋随后被打成“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头目之一，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提起康生，习仲勋就怒火冲天，不禁想起陈云说过的“康生是鬼不是人”这一名言。就是这个靠整人起家的奸佞家伙，一手造成“西北反党集团”，致使自己和一大批西北地区出身的领导干部惨遭残酷迫害。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康生罪行，终于把他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陈云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的关注和深思，会议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决定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让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总结经验教训，分清大是大非。与会代表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同志。

<sup>①</sup> 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234页。

中南组尖锐地批评了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安排纪登奎回中南组作检查。

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时认真讨论和研究与会代表提出的意见，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二月逆流”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平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康生、谢富治罪行应当揭发和批判；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加以处理，有错必纠。习仲勋和与会代表看见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接受大家提出的意见，感到比较满意。

在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对一些重大事件表明态度，也就是说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之后，围绕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再度展开了交锋。颇具意味的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和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这次会议上。

11月27日，一位与会代表发言，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担心这样讨论下去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他不赞成有些文章提出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他明确表示说，“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这篇发言在会议简报刊登后，立即遭到许多与会者的批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为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

在分组讨论中，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表示肯定和支持。中南组的代表对真理标准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邓颖超在发言中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习仲勋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他认为，习仲勋“反党集团”一案，就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定案的。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说不通为这一冤案平反问题。因此，当全国开始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他就密切注视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在全国地方“诸侯”中，他是第三个明确地亮



出自己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观点的。这次在会上，习仲勋对“两个凡是”的观点再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根据与会代表的要求，中央主要领导人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打破僵化，解放思想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第三次全体会议后，许多与会者感到今后的工作需要中央有一个更好的领导班子，他们在发言中提出了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在内的人事问题。12月1日，邓小平、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南组、东北组召集人谈话，就安定团结、稳定大局，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央的人事安排只加人、不减人的问题作了指示。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央对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提议增加三个政治局委员：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指邓颖超），胡耀邦。认为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接着，邓小平提议补选习仲勋、王任重、周惠、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为中央委员。<sup>①</sup>

邓小平提出增补的中央委员人选，其中习仲勋、宋任穷、韩光、胡乔木，早在1956年，就是中共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任重则是1958年八届二中全会补选的候补中央委员。他们之中，大都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严重迫害。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以后的讨论中，各组议论加人的人选也比较集中起来。大家普遍提议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提议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提议增选习仲勋、王任重、周惠、韩光、宋任穷、胡乔木、陈再道、黄克诚、黄火青为中央委员。

会上，习仲勋与大家热烈讨论了中央人事安排问题，他完全同意中央对政治局几位犯错误的同志可揭发批判，但政治局成员只增不减的办法，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有利于稳定大局，比较好。他完全同意邓小平有关人事安排的意见。习仲勋和中南组全体代表，一致推荐胡

<sup>①</sup>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第270页。



耀邦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习仲勋在中共八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次被提名增补为中央委员，说明党对他的信任。他感到党是实事求是的，能客观地评估他过去的功过是非。12月11日，各组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人事安排意见。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闭幕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首先由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肯定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他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然后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重大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讲话后，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叶剑英讲话后，华国锋讲了话。他首先对会议进行了评价；第二专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和理论务虚会问题；第三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问题；第四讲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问题；第五讲少宣传个人，强调集体领导的问题。华国锋的讲话，主要是谈了提出“两个凡是”的情况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并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和其他与会者认为邓小平等人的讲话非常重要，于是提出要求延长两天来进行学习和讨论。按照华国锋的布置，会议的最后两天，12月14日至15日，各组讨论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以及汪东兴的书面发言。习仲勋和中南组的其他代表踊跃发言，表示拥护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的民主风气和所解决的问题，对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少的建议。中南组根据大家发言整理了一份综合简报。

15日，为期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系列决策，掀开了序幕。



## 二、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

习仲勋兴高采烈地列席了这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分为六个大组讨论，召集人没有变化，只是人员略有变动，中南组为56人，会场在京西宾馆第14会议室。广东方面，焦林义、李坚真等六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来到北京出席三中全会。而王全国和薛光军两人则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赶回广东，先给省委常委通气，准备传达贯彻。

12月18日晚上8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开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等出席了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就全会的任务和开法讲了话。华国锋提出，我们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2月19日，各组集中时间阅读了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草案。从12月20日至22日下午，各组讨论了文件及会议公报。习仲勋和中南组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央委员，以发言等形式向未参加工作会议的人介绍情况。所有与会者都对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人事安排表态，并对工作重点转移、“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

12月22日晚7时30分，习仲勋出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会议。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全会一致原则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有关人事安排，基本按中央工作会议决定进行增选和补选。习仲勋和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增补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增补手续予以追认。

选举结束后，陈云、华国锋先后发表了讲话，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这次全会虽然只开了5天，但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指导思想明确，因此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成果。这次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习仲勋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后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

会议闭幕后，习仲勋到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调来广东工作的杨尚昆。习仲勋和杨尚昆在延安时期就相识。建国后，他们分别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

杨尚昆在60年代前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应该说是深受信任的。可是从1965年10月底开始，他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等人陆续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指责。



1965年10月29日，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三人奉命约杨尚昆谈话，宣布撤销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另行安排他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调令。同一天，毛泽东应杨尚昆的要求，约他进行了历时一个半小时的谈话。12月10日，杨尚昆黯然离开北京，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

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罗、陆、杨四人遭到了更进一步的严厉批判。林彪在他的“五一八”讲话中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并决定成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当时，彭真被诬蔑为搞“政变”的头目，罗瑞卿为阴谋篡夺军权，陆定一被诬蔑迫害林彪一家的“后台”，杨尚昆被指控为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搞“特务活动”。实际上，他们受诬陷的根本原因，是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了“左”倾错误，或对林彪、江青等作了一定的斗争，被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障碍，所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早一批遭难的中共中央领导干部。5月22日，杨尚昆又被正式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下放到肇庆任地委副书记。杨尚昆以气候潮湿，身体不适，向中央申请转去西北、华北、东北的任何基层。5月下旬，中央批准他转任临汾地委副书记。但他在山西还没有来得及工作，就失去人身自由，被隔离审查。

杨尚昆和习仲勋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受尽折磨。他们两人同为“左”倾错误的受害者，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寒暄之后，习仲勋向杨尚昆介绍了广东的情况，以及研究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等问题。杨尚昆不久后于1979年1月19日抵达广东。此后，他们俩人同心协力，携手合作，筚路蓝缕，在广东并肩拼搏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12月，习仲勋列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图为习仲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 第八章 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认真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这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是建国以来中共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的历史篇章。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急急赶回广东，很快就在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中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研究如何贯彻问题。习仲勋等决定以省委名义向全省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通知》强调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对三中全会公报的学习、宣传，使人们的思想和工作迅速跟上当前的形势，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的新的长征中，作出应有的贡献。<sup>①</sup>

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各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通知》，1978年12月24日。

地、市委和省直属部、委、办、局，以及省军区、军分区的负责人，共250多人。会议主要是由习仲勋向大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月9日，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指出，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传达贯彻1978年11月、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研究如何把广东省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动员全省的党组织、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他首先谈了会议的情况和感受，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很好、很成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我们党进行新的长征的道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上的一个重大是非问题，就是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对于端正我们的思想路线，澄清党内的混乱思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会议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等，中央对这些问题给予彻底平反，习仲勋认为，这些“为我们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遗留问题做出了榜样”。他希望广东“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地抓紧把一些遗留问题处理好”。<sup>①</sup>

在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后，习仲勋指出，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和解决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他要求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变，“认识要统一，要有共同语言，思想要跟上去。”为了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应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如何善始善终地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如何尽快地整顿好领导班子，如何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如何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特别是如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1979年1月9日。



何尽快把广东省的农业搞上去。

习仲勋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领会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实质，认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解决遗留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鼓干劲，分秒必争，采取有效的措施，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坚持和发扬了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好会风，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打破了一些过去不敢碰的“禁区”，民主空气活跃。大家联系实际，学习和领会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的精神，围绕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解决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会上揭露了干部思想、作风以及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许多矛盾，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指名道姓地开展了批评，敢讲话，讲真话，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这种精神状态的转变，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展现了可喜的前景。

会议分析了全省工作情况，对前段广东省工作做了估计，认为广东具备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条件。广东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这是全省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为此，省委在会上宣布了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今后国家下达农业生产计划，只下达生产队必须保证完成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任务，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决定增产措施，省下达的种植面积计划，只作为参考，不得强制执行；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要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计酬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各地实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对促进生产有积极作用，可以普遍推行。只要不是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管理办法和计酬形式，都应允许试行。要调整粮食统购任务，坚决不购过头粮，让农民喘一口气，休养生息；同时根据广东的“特长”，对经济作物的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调整；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大养其猪，放手发展养牛、养羊、养兔、养蜂及家禽，允许社员养牛。生猪收购上，实行“购五留五”、“购一留一”和“每头猪购定量边肉”的办法，可以继续试行，待总结经验后，再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大



力发展渔业生产，认真解决渔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林区要以林为纲，迅速改变林区过量采伐的严重局面；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农业现代化的试点，珠江三角洲要走农、工、商相结合的道路，国营农场要尽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调整和加强农业的领导班子，省委成立农业委员会，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由第一把手亲自抓农业。各行各业要加强对农业的支援等。会议还要求广东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引进先进技术，吸收外资，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发展旅游事业。对这些事情，要解放思想，敢于实践，要大胆地搞，放手地搞，努力增加外汇收入，用以加速广东的现代化建设。

会议在研究如何学习、宣传、贯彻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强调指出，不要搞教条式的、本本式的传达，要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使传达贯彻成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大动员，使会议精神成为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使全省上下迅速出现一个新气象。会后，各地要把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部署好春耕生产，使广东的工作能够迅速赶上全国的形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主持会议，习仲勋代表省委作了总结发言。习仲勋认为，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是初步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会议。他根据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根据会上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联系广东实际，阐述了中央两个会议的重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着重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广东一定要同全国一道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习仲勋指出，为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广东联系实际，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逐步分清了路线是非，初步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揭批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干部思想状况来看，还存在思想不够解放的问题，广东应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冲破旧的条条框框。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纲，要以



发展生产为中心。

二是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必须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习仲勋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农业问题。为此，习仲勋要求：

（一）要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落实党的政策；（二）切实尊重和保护生产队的使用权和自主权；（三）要坚决贯彻农林牧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发展畜牧业、渔业和林业；（四）调整粮食统购任务，认真贯彻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五）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六）要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工作；（七）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搞好农业现代化试点；（八）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领导。

三是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精简机构，改进作风，从组织上保证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第一，必须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抓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使各级党委真正成为能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坚强战斗指挥部；第二，要精简机构，改变目前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党政要分工，要裁减机构，减少层次，经济管理体制及其机构设置也要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反对官僚主义的原则，精简上层，充实下层，精简党政机关，充实经济、科研、文教部门；第三，各级领导要认真改进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

四是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要十分珍惜粉碎“四人帮”以来赢得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遵照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正确地处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消除不安定因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习仲勋特别强调，广东一定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集中力量在农业上来一个大的突破，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要紧紧跟上。要充分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冲破旧的条条框

框，提出新倡议，采取新措施，尽快使广东出现一个新面貌。<sup>①</sup>

这次会议，是一次对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还专门决定，为了尽快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集中精力把全省农业生产迅速搞上去。从省委到地、市、县委，都要来一个作风大转变，克服“五多”，精简会议，压缩文件，并要求各级领导在一年中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脚踏实地，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认真调查研究，切实解决问题。

2月15日，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精神，联系实际，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精神的精神实质，认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历史意义，联系实际，总结近年来农业上不去的经验教训，肃清“左”的流毒，认真解决阻碍工作重点转移的一些突出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加强经营管理工作，搞好生产责任制。

## 二、帮助基层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后，省委常委除留少数人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余常委在2月份统统下去。习仲勋、杨尚昆、郭荣昌、王全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9年1月25日。



国、吴南生、孟宪德、薛光军、杨应彬、陈越平和广州市委，省军区，省直各部、委、办、局的负责人，带领80多个工作组，共300多人，陆续分赴肇庆、佛山、韶关、汕头等8个地区和韶关市，以及高要、花县等70多个县、市，参加这些地、县召开的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地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各地组织春耕生产。并研究和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快一些。

2月5日晚上，习仲勋在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省农委副主任杜瑞芝等人陪同下，带领工作组抵达肇庆。在肇庆，习仲勋听取了肇庆地委的工作汇报，与地委和各县、市委书记进行座谈，对肇庆经济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殷切期望肇庆各级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2月7日，习仲勋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问题，是解决了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中心思想，就是从今年开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



1979年2月，习仲勋在肇庆农村视察时了解农民自制沼气的情况。

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我们应该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把我

们的工作做好。我们要把工作做好，把许多问题真正搞落实，过去的冤假错案平反了并不等于问题落实了，还要把他们妥善安置好，把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一点都不能粗心大意。要拨乱反正，要把全党、全国人民的风气扭转过来，把好党风重新恢复过来。习仲勋鼓励地方干部要大胆的干。他说：“只要对工作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对集体经济有利，为什么不可以办！现在不管你是谁讲，不管你来自哪方面，只要不对都给他顶回去。我们说，只要对人民有利，对国家有利，我们就干，胆子大一点。”<sup>①</sup>

习仲勋对农业非常重视，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对广东来说，首先要将农业搞上去。中央的“决定”和新“六十条”这两个文件，还有对地富摘帽的文件，都是对农业有很大影响的。我们首先要将“决定”和摘帽这两个文件最迅速、最全面、最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不要停留在面上。这两个文件要一直发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群众见面，结合当地实际，向群众宣讲。

习仲勋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角度，讲了许多话。他着重指出，要把揭批查搞好；要恢复党内斗争的好传统；要把民主和法制搞好；要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恢复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

2月9日至17日，习仲勋在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陪同下，先后到四会、广



1979年2月12日，习仲勋在怀集县林场视察。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2月7日。



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调查。

习仲勋在怀集调查时，发现怀集森林乱砍乱伐很严重，残林幼林多，过去一个立方米只要三四棵树，现在一个立方要十几棵，甚至二十多棵树，这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他十分担心广东的林业出现危机，再次讲了“广东木材资源到了枯竭边缘”的话。后来，他一再讲到绿化和环境保护问题，号召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关心植树问题，搞好全省的绿化。

在怀集，习仲勋原计划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当天晚上怀集演地方戏，邀请习仲勋去观看。习仲勋看完戏回来已经11点了，他看到桌子上摆了两封信，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死难者家属写的控告信，里面讲怀集杀了1700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有982人。杀人之惨，刑罚之多，触目惊心。习仲勋看到这些，当即决定推迟走，哪怕抽半天时间帮助他们解决一下也好。第二天，习仲勋接见了写信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开会时到了二三十人，座谈了一个上午。到会的人情绪激动，有人提出杀人一定要偿命。习仲勋耐心地对他们说：“虽然你们那么多亲人被杀，但不能都以杀人来抵命呀！”有一个女同志便说：“巧人动口，笨人动手”，杀她丈夫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真正坏人是幕后指挥者！她的意思是对幕后指挥杀她丈夫的人一定要处理。习仲勋认为她讲得有道理，对那些指挥策划杀人的，不管他今天在哪里工作，只要调查清楚确实是指挥杀了人的，一定要给予法律制裁。经过耐心解释引导，大家的情绪也就逐渐平静下来，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处理好这些事情。<sup>①</sup>

习仲勋一行15日抵达郁南，16日抵达罗定，17日抵达云浮，他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以及部分大队支部书记进行座谈。在听了基层领导干部的发言后，习仲勋分别作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谦虚地说：“同志们的发言很好，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你们是我的先生。”接着，习仲勋根据座谈会的情况和

<sup>①</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习仲勋革命生涯》2002年版，第555页。

一路的调查指出：“这次各县的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归功于中央工作会议与三中全会。如果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武装，不仅是县的，就是省委和地委的会也不会开得好。这次会议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发扬了民主，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说，没有人压制、打击你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恢复，党内生活的正常化，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有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作风，要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来个大转变，这就是最大的拨乱反正。”“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必须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武器，再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习仲勋在讲话中回顾了沿路视察的情况。他一路走了肇庆地区的大部分县，看到一些地方虽然上一年晚造水稻减产，但群众情绪很



1979年2月，习仲勋在云浮县石材厂观看工人生产的石料。



稳定，冬种和春耕备耕的情况都不错，杂粮收成好，木薯大丰收，多种经营和农民家庭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感到农村形势很好。他指出，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后农村不搞政治运动了，政策放宽了，各级领导关心基层干部了，农民负担减轻了，这些都是大快人心的事。

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他说：“今年起，我们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抓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农业，要集中力量打好农业翻身仗，把农业搞上去。当前首先要抓好春耕，为夺取早造和全年的丰收打下基础。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要使人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转变。要扫除各种障碍。当前农村工作最大的障碍就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极左思潮，宁左勿右。这条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在干部群众思想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肃清极左的流毒，有些同志暴露出来的‘恐右病’、‘恐富病’，就是极左的流毒造成的。”“大家要根据三中全会公报精神，把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生产队，以至自己个人，好好回顾、总结一下。总结要同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结合起来，领会就会更深刻。要分清哪些是过去极左的东西，有什么经验教训；识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

习仲勋还根据在罗定了解到罗定历次政治运动处理不当，“文化大革命”中乱打、乱杀、乱开除、乱批斗，牵连许多人，以及封开地富摘帽问题中存在的地富已是第二代、第三代，地富及其子女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几的情况，着重指出：“要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搞好农业生产，还要把政策搞对头。首先是干部政策、人的政策的落实，经济政策也要认真落实。政策不落实，就不可能安定团结，人的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地富摘帽问题应该加以解决，这不仅是当前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也是促使台湾回归祖国的需要。”针对郁南有的同志提出给地富摘帽，是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习仲勋耐心解释：“我们给地富摘帽，这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而是党的对地富分子改造的政策胜利，是斗争的结果。他们已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摘掉他们的帽子。”习



仲勋还谈了处理农村经济问题时，如何正确解决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以及政策变不变的问题、对基层干部的爱护问题等等。<sup>①</sup>

2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向全省各级党委发出粤字〔1979〕15号文件。文件指出：“现将习仲勋同志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全省农村也是存在的。仲勋同志的讲话，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望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研究贯彻。今后各级党委领导同志，都要注意倾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农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使农村工作迅速转到建设现代化农业上来，花大力气把我省农业搞上去。”<sup>②</sup>

新华社对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这次下基层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报道说：“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粤西北山区，走了怀集、广宁等8个县，除了同地、县干部接触外，还同130多个公社书记以及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座谈，同他们讨论政策方针问题，干部思想问题以及山区以林为纲、全面发展的建设问题。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到佛山地区，着重调查、研究如何加快珠江三角洲这个重要的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的建设问题。其他书记、常委根据所去地区的特点，有的着重调查研究了干部领导作风问题，有的着重研究了农村对外贸易问题，有的着重研究了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问题。”“工作组回到广州后，均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总结工作。”<sup>③</sup>

### 三、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在省委召开的听取各个工作组调查汇报的会议上，大家认真进行综合分析，集思广益，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习仲勋和省委常委认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肇庆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2月23日印发。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粤字〔1979〕15号，1979年2月23日。

<sup>③</sup> 《南方日报》，1979年3月27日。



为，广东农村形势很好。总的来说是：稳定，高兴，充满希望。农业生产正在出现一个新的高潮。三中全会公报的发表，更进一步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说，党中央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是伟大的战略决策。今后再不搞过去那些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和脱离生产建设的政治运动了，要集中全党力量搞生产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样必将使我国很快强盛起来，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使社会主义更加巩固。大家一致表示，要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尽一切努力，实现这个转移。

习仲勋和省委常委分析了许多县的三级干部会和他们亲眼看到的大量情况，一致认为，林彪、“四人帮”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的流毒，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障碍，要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必须继续批判极左路线。从思想上弄清是非，拨乱反正。思想转不好，工作重点也转不好。很多地方根据三中全会文件精神，联系本地区的实际，摆了极左的表现，算了极左的危害，追了极左的社会、历史根源，定出了肃清极左路线流毒的办法。他们还通过学习文件，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剖析了广东农村历次政治运动。大家认为，这些年来，广东农村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左”，越来越“左”，可是上面还觉得“左”得不够，老是批右。把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搞得混乱不堪。在一些干部中形成了“左”比右好，“左”保险、右危险的风气和观念。有的人明知不对，但由于怕被整怕被斗，怕戴右的帽子，还是顺着搞。极左路线搞得人民不团结，社会不安宁，局势不稳定；搞得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真是损了国家，伤了干部，苦了群众。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习仲勋和省委常委认为，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从农业转起。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保护、调动社、队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当前，要集中力量，抓紧时间，落实基层干部的政策。对于各级领导班子，要很快进行调整和整顿，使其真正成为领导农村建设的战斗指挥部。<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南方日报》，1979年3月27日。

同年3月，省委在省委党校举办1979年第一期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12日，在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大会上，习仲勋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脚踏实地，深入基层，锐意改革。他着重指出，我们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是看我们领导作风、领导思想能不能转移。领导干部就是要到下面去，有意图、有目的地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向群众学习，向实际学习，同干部、群众一起，征求他们的意见，商量讨论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把问题解决好。习仲勋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听到的各种汇报情况，指出了农村存在的两个“稳定”（农村稳定、城镇稳定）、三个“活跃”（思想上活跃、政治上活跃、经济上活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得到贯彻的结果，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历史遗留问题、政策问题、群众工作问题等，习仲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各项工作搞好。<sup>①</sup>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和省委常委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充分根据广东的特点和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sup>②</sup>

此后，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经过艰苦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广东得到认真的贯彻，广东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开始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逐步实现了工作着重点向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转移，在经济指导思想上，也逐步发生转变，广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一切，为广东大胆创新、锐意改革，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奠定了基础。

到1979年年底，广东已基本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党校读书班开学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3月12日。

<sup>②</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8页。



一、学习和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分清是非，拨乱反正，不断解放思想和端正思想路线。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生产为中心；从空谈政治转到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相结合，把政治落实到生产、业务中去；从用行政办法管理生产，逐步学习用经济办法管理生产。

二、明确了广东今后建设的方针，着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解决了人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三、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抓紧了对“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问题的处理；对反地方主义的案件正在复查处理。党的干部政策、华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和宗教政策等逐步得到落实。

四、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初步调整，加强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开始整顿了党风。

经过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一年来的共同努力，广东已经实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要求，完成了政治路线上的重大转折，社会发展开始走上正确的轨道。

## 第九章 平反冤假错案 落实各项政策

### 一、拨乱反正，加快落实政策步伐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经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由于仍受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步履维艰。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伊始，就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sup>①</sup>

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干部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于大批干部头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诸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两次“反地方主义”问题、“反右派”问题等；另一部分是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主要有“黑五类”扫地出门问题、“可教育子女”被赶下乡问题、“战备疏散”人员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镇吃闲饭”，让大量城镇居民下农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面广、人多，反映强烈。习仲勋到

<sup>①</sup> 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4月6日。



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清除“左”的影响，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作为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政治局势的一项重大举措，摆到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对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寄予厚望。因为习仲勋、杨尚昆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屡遭迫害和冤枉，最能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而且，“他们来广东之前，叶剑英有过交代。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尤其在处理‘地方主义问题’时，习仲勋、杨尚昆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sup>①</sup>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曾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面对每天无数的人民来信，他不满足于经过省委信访办公室严格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要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在接待室直接倾听来访者的呼声。他还经常派贾延岩外出抄写大字报。当时广州市中山三、四路和整条北京路，万头攒动，群情激昂，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贾延岩根据习仲勋的要求，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和抄写大字报。有一天，在北京路口，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从远处赶来的老少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大字报内容是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鉴于兹事体大，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了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接待室去直接申诉，并指点门路。想不到他这样做，受到同事的批评，认为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这影响多不好！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sup>②</sup>

<sup>①</sup>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内部出版，第281页。

<sup>②</sup> 参见贾延岩：《往事历历——习仲勋不朽》，《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68页。

习仲勋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案卷，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对广东一宗宗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逐步有了感性认识。

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首先必须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组织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一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1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坚持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不能平反的不平反的原则。二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3月21日到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精神，并按照胡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开展工作。三是学习1978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习仲勋领导广东排除了“左”的干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创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则大揪“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林彪、江青一伙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罪恶目的。

6月3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对广东“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犯下了严重罪行”。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检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李坚真强调要掌握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指出凡属冤假错案，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复查结论可留可不留尾巴的坚决不留；凡定案准确、处理



恰当的，维持原来正确决定。会后，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在此之前，5月29日，习仲勋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指示他们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随后，在7月11日下午，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委统战部部长张泊泉关于统战工作的汇报。听汇报的有焦林义、薛光军、杨应彬、李嘉人、杨康华，还有尹林平和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局、计委、侨务办、财政局以及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

习仲勋原则上同意《统战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8〕90号文件，把政协工作活跃起来的意见》。他在听取张泊泉汇报中和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问题。习仲勋说：汇报提纲中有称资本家的，还是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好，因为人家的财产已被公私合营20多年了，又对他们教育改造了20多年。当汇报到“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受到冲击比较大时，习仲勋说：这些人受冲击不是比较大，而是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当汇报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查抄财物、挤占私人房屋时，习仲勋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不然对国内国外影响不好。对挤占他们的房屋问题，要找有关部门来研究解决。当汇报到有些人以极其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资时，习仲勋说：这是变相勒索。要由卖者给他钱，把物件退还原主。

习仲勋指示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当张泊泉汇报到有些县认为摘掉外逃右派分子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时，习仲勋说：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

民族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张泊泉汇报到民族地区山林土地纠纷突出，严重影响民族团结时，习仲勋强调：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队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要认真解决。当汇报到这一年国家拨了2000万元给广东建设边防少数民族地区，但省只分配390万元给少数民族地区时，习仲勋明确指出，要把



中央拨款搞清楚，要专款专用。把2000万元全给少数民族地区，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当汇报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习仲勋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很重要，要按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物色对象，进行教育培养，逐步解决，但不要一下就提得很多，提得很高，来赶任务、搞形式。培养民族干部，组织部、统战部要共同研究，提出一个规划出来，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需要有一批好的汉族干部在那里工作。

习仲勋很关心政协工作。他提醒说：省参事室、省文史馆的老人是活材料，很有用处，要弄些人把他们知道的历史材料写出来，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要做这个工作。当汇报到省政协、文史馆、参事室的干部年老体弱的多，要求从当年大学毕业生中分配十多个给他们时，习仲勋答应说：可以，分配一些人给他们。当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康华谈到王作尧、莫雄可以安排为省政协副主席时，习仲勋说，有什么人物要在政协安排工作的，你们老同志知道情况，可以向统战部提出来。王作尧（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可以安排嘛，但要在省政协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决定。廖似光同志可以到政协去工作，参加政协党组。不要老说她有什么缺点。这些人是老人了，要给他们一些荣誉职务。对人要三七开，就是倒三七，也要看到他的三分成绩。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政策，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习仲勋十分重视党外老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他明确指出，不要提“从旧社会过来的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提“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50岁的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然从政治态度来说，他们是有左、中、右之分。习仲勋说：要把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开展一些什么工作，写个报告。

关于宗教工作问题。习仲勋说，全部恢复教堂不好，要谨慎一点。要按照新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关于宗教工作机构问题，习仲勋说：恢复宗教事务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对外是宗教事务处，对内是省委统战部



宗教工作处。

关于侨务工作，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侨务政策。

习仲勋最后说，统战工作很重要，这次我们听了统战工作汇报，以后还要抓，每年要讨论几次。<sup>①</sup>

7月13日，根据习仲勋5月29日和7月11日对统战工作的指示，省委统战部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当前我省统战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一）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三）搞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四）抓紧做好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安置工作；（五）把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活跃起来；（六）认真做好党外老知识分子的工作；（七）做好起义人员的工作；（八）进一步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8月12日，省委办公厅批转了这一报告，指示各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到了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他考察了上述地区工农业生产和落实政策等方面的情况。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陆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反（周）总理、反叶（剑英）帅，阴谋篡党夺权，直接插手海丰，他们大反彭湃烈士，迫害彭湃烈士的母亲，搞掉红宫、红场，杀害彭湃烈士的亲属，残酷镇压群众”，<sup>②</sup>其罪行令人发指。习仲勋听罢大为震惊。据习仲勋在翌年春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反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当时我同县委谈这个问题，叫不叫他们来？有的同志怕他们来听了会自杀，我说让他们来，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对他们讲清楚，过去是过去的事，主要看今天认识罪行没有，对你们的评价，是看你们现在。我和他们谈话以后，没有出事，没有一个人自杀。事情弄清楚了，民愤很大，平不了民愤的，我再把

① 《习仲勋同志听了统战工作汇报后的指示（记录稿）》，1978年7月11日。

② 《习仲勋同志对汕头地委常委同志的谈话（记录稿）》，1978年7月31日。

你关起来。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sup>①</sup>习仲勋指示汕头地委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



习仲勋在惠阳地委常委会上讲话。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日。



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焦林义、李坚真、王全国、吴南生、寇庆延、邓逸凡、孟宪德、梁湘、薛光军、杨应彬、陈越平，列席的有刘维明、梁威林、李嘉人、杨康华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4人。习仲勋首先通报了他考察东三区的情况，并请杨应彬读了他在汕头地委和惠阳地委的讲话。然后，习仲勋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他说：“对海丰问题严重的人，我都找他们谈话，把政策交给他们，说不管过去问题多大，看现在的态度如何。要相信干部群众，把政策交给他们。对‘文革’中拥护彭湃的至今仍有400多人政策不落实。林彪对海丰的批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很明显，打倒彭湃，就是打倒叶帅、徐帅、总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惠阳，一搞就是13个反党集团，那搞多少人？”<sup>①</sup>他指示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两天之后，8月15日，省委在广州举行全省落实干部政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各地、市、县委组织部门和省直部、委、办、局的有关负责人等，共280人。省委书记李坚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联系广东省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罪行。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省委和习仲勋推动全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

10月30日，由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的平反昭雪。”<sup>②</sup>

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

<sup>①</sup>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8月13日上午。

<sup>②</sup> 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1978年10月31日。

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sup>①</sup>

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急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

<sup>①</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1月9日，习仲勋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提出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议期间，与会者在讨论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认为必须解决好一批重大的遗留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大批熟悉广东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摆脱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桎梏，发扬民主，敢讲真话，畅所欲言，大胆提出了广东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在发言中提出广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强烈要求为广东“反地方主义”等冤、假、错案平反。习仲勋非常重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与常委一起反复交换意见和看法，取得了共识。1月25日，习仲勋代表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谈到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时，他说：“我们要遵照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正确地处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sup>①</sup>

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就以下11个问题讲了一些看法：

第一个是关于“一·二二”夺权问题。习仲勋指出：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了篡党夺权，从上海打开缺口，制造了所谓“一月革命”。中央已经批准上海市委的报告，正式宣布：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在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的影响下，广东也搞了个“一·二二”夺权。1月22日，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下，广东几个所谓“造反派”头头煽动一些人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夺了广东省委的权。他们分别在《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发布所谓《夺权通告》，同时发布《通令》接管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日报》。1月23日又夺了中南局的权。现在看得很清楚，所谓一月夺权，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夺权。这场反革命夺权的罪责在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当时参加的群众是不明真相，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

第二个是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习仲勋说，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根本不存在所谓“右倾翻案风”。1976年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已决定撤销所发的有关的十二个文件，承担了责任。广东省贯彻中央这十二个文件时，在1976年1至9月份也发了十二份涉及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文件。现在省委宣布：1976年粤字4、5、7、12号这四份文件，应予撤销。由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1976年省委、省革委发出的其他文件中，凡有这方面的错误内容的，均一律宣布废除。执行这些文件的组织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

1976年，省委还批准《南方日报》2月16日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影射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梁效”黑文；在2月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兴宁会议上批邓小平同志的“昔阳讲话”；理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宣扬了“四人帮”炮制的“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谬论，并让杨荣国在会上讲话，影射周总理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下，省委还错误地做了“三点检讨”，并布置安排一些派头头；部署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省委领导同志在大会上带头作批判发言；文艺方面布置写作和演出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剧目等。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应由省委承担责任。

第三个是关于所谓“陶赵死党”问题。习仲勋指出：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陶铸同志主持的原中南局的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到林彪、“四人帮”诬陷后，同陶铸、赵紫阳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大批干部被诬陷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原中南局的工



作和解放后17年广东的工作被说成漆黑一团。现在陶铸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因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问题受到迫害和株连的，都应该彻底平反昭雪。

第四个是关于所谓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秉承叛徒江青一伙的黑旨意，在广东搞了一个“审理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揪什么“南方叛徒网”等等，其阴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周总理。他们成立专门机构，非法审理这类专案就有十几个。现在宣布，因为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这个大阴谋，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广东的人民武装叫“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

第五个是关于“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习仲勋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紧接着，林彪死党黄永胜一伙在广东对归侨、侨眷大下毒手。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1970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搞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并在顺德、台山等地搞了试点，以后还在全省整党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全面推行。黑六条的影响所及，闹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他们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都要平反昭雪。



第六个是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正式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此外，在反右派斗争中，还划了一些“中右分子”，应当全部否定。

第七个是关于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习仲勋指出，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第二次是1957年。1957年那一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对于过去反地方主义搞错了的，处分偏重的，或因地方主义划为右派的，都应当加以纠正。有的同志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同志的问题，省委接受这个意见，决定进行复查。省委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第八个是关于“四清”中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在“四清”运动中，对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上升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仍应按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第九个是关于反彭湃烈士事件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正交给专政机关依法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孙敬业正在进行审查，将依法严肃处理。

第十个是关于处理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在



过去农村一些政治运动中，对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处理面偏宽，处分偏重，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些问题都应该抓紧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

第十一个是各地、市、县一些重大事件问题。习仲勋宣布，省委决定，这类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省委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省委批准。这些问题，如果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坏人乘机捣乱，重新引起派性斗争。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共救国军”案件，纯属假案，应予否定，遭受迫害的，应予平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存在的遗留问题，都要一一加以解决。还有1970年的所谓“五号船事件”和1974年省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的所谓“复辟回潮”典型，其定性和处理都是错误的，也应予以平反。1974年省委就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问题发的20号文件，应予撤销。乐昌灯泡厂的问题，责任主要由当时省委有关同志负责。<sup>①</sup>

习仲勋所谈的11个问题，都是广东“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反响，博得了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认为，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广东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习仲勋在总结发言中还强调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他指出：“关于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我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对照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全省还有270多宗集团假案未平反，受牵连的9000多人，其中干部有2000多人。有些集团假案虽已平反，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妥善解决。全省定敌我矛盾的干部还有1400多人未复查，受处分的干部还有8600多人未复查，干部结论也有37000人未复查。干部审查材料多数没有认真清理。即使是已复查过的，不符合要求的比例也不小，特别是有一些老干部还可以继续工作，要妥善安排，充分发挥他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们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以及定敌我矛盾和三大处分的案件，力争在今年3月底前复查完毕。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动手晚一些，也要在今年春季做出显著成绩，上半年基本搞完。要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落实干部政策的力量。案件复审工作，一般不要由原来的办案人员主持，以利于顺利开展这项工作。”<sup>①</sup>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会后，1月27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省委决定：“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会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sup>②</sup>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 二、复查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广东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之一。黄永胜等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sup>③</sup>

1979年1月20日，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仪式，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通知》，1978年2月8日。

<sup>③</sup> 习仲勋：《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稿）》，1978年11月8日。



悼念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的革命战士陶铸。出席仪式的有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以及广州军区黄荣海等。习仲勋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陶铸的一生，号召大家学习他的高贵品质和高风亮节。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说明，在陶铸的领导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各项工作中，是始终占主导地位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委是红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诬蔑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等，这完全是恶毒的诬蔑和陷害，是为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的。今天，我在这里郑重宣布：凡是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sup>①</sup>

广东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省一级的领导人平反昭雪，举行隆重追悼会，对他们革命的一生给予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2月11日，省委、省革委会决定：严肃处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犯有严重罪行的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已被捕；残杀彭湃烈士亲属及群众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等交司法机关严惩（后作内部处理）。<sup>②</sup>

在此前后，习仲勋领导广东对在广东地区影响很大的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予以审查。1979年4月27日，省委正式作出《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搞了一个“审查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1967年5月，戚本禹等人煽动一些群众组织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年10月，林彪死党黄永胜及其一伙，秉承江青关于“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的黑旨意，成立专门机构审理所谓广东地下党的十起重大历史事件，即：林锵云等六人向国民党第七战区呈送公文要

<sup>①</sup> 《在陶铸同志悼念仪式上习仲勋同志的讲话》，《南方日报》，1979年1月21日。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改革开放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求“改编”问题；国民党张发奎部队内中共特别支部的政治嫌疑问题；1940年我东江游击队两个中队被敌围捕缴械事件；广东地下党、游击队某些领导人与美国战略服务处（O.S.S）的关系问题；东纵某些领导人与港英关系几个问题；南方临时工委时期几个问题；中共粤北省委被敌人破坏事件；博罗事件；国民党挺进二纵队里的中共地下党内某些政治嫌疑问题；“三何一李”问题<sup>①</sup>；此外，还有所谓“南路党”问题、“潮汕地（下党）叛（徒）集团”问题等等。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冤、假、错案。“九一三”事件后，省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接管了上述十起重大历史事件的审理材料，推翻了黄永胜一伙强加给广东地下党及其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诬蔑不实之词。1978年6月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前后，又对这些案件的调查报告进行了清理，改正了其中一些不准确的提法和不当之词。湛江地委、汕头地委也已分别对所谓“南路党”问题、“汕头地叛集团”问题进行了平反。省委认为，广东党组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至于全国解放前在广东地下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队伍，为全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为此决定：过去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于广东地下党及其领导的武装队伍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对因“审理广东地下党”问题无辜受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们的结论如有不符事实的应作相应修改；其家属亲友受株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sup>②</sup>

1979年3月20日，省委批转了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批示强调：当前，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迫切要求我们抓紧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

<sup>①</sup> “三何一李”问题是指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检举何竺、何鼎华、何启明、李健行解放前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些“问题”。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为所谓广东地下党问题彻底平反的决定》，1979年4月27日。



强领导，真正把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紧抓好，力争在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这项任务，国庆前圆满结束这项工作。省委组织部的《意见》强调，复查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要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凡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不足、无限上纲的定性、处理，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定的，什么人批的，什么时候处理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要干脆利落地解决，不拖泥带水，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复查工作不符合要求的，一定要改正过来，保证质量，不留尾巴。<sup>①</sup>

5月至10月，省委从省、地、县机关抽调2400多名干部组成联合验收工作组，分赴各地，共抽查审阅了2.5万多宗案件，召开了347次各种座谈会，接待和处理了大批群众来访来信，进一步推动了落实政策工作。1980年5月，省委组织部召开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之后，各地进一步加快了工作步伐。

习仲勋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全部作出处理：1.没有作出结论的做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2.没有分配工作的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妥善安排；3.已经去世的，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做好善后工作；4.受株连家属、子女问题妥善解决好。

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叛徒集团”等集团性假案669宗，牵涉干部9432人；干部个人冤假错案12427人。对这些冤假错案平反纠正工作于1980年六七月间基本结束。<sup>②</sup>

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2万多人，其中已作结论的干部72504人。经全面复查，其中属冤假错案重新作结论的5673人，撤销原结论的15071人，原结论用词不当予以修改的22010人，这三项合计42754人，占总数的59%。复查前定为敌我矛盾的2553人，复查后改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2410人，占94.6%；

①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1979年2月20日。

② 省委纪委、省委组织部：《广东省落实政策工作情况的报告》1981年7月13日。



1980年，习仲勋和叶剑英（左二）、聂荣臻（左三）在广州珠江宾馆。梁伯权摄

复查前受三大处分（开除党籍、撤职、留党察看）的10838人，复查后减轻处分或免于处分的7625人，占70.4%。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干部被扣发的工资也予补发。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全省副厅长、副专员以上干部706人，副县长以上干部2461人，除病故者外，基本分配了工作或作了安置。<sup>①</sup>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迫“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被遣送回乡的干部29238人，全部复查完毕。其中恢复工作的28245人，占96.6%。不宜收回的、本人已从事其他职业而不愿复职或已病故的993人。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省委还为原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德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迫害革命干部，而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王德是其中成员之一。王德因此长期被批斗、关押。广东“省委于1973年5月18日上报中央的‘审查报告’，经中央1977年10月18日批复，定为叛徒。”致使王德的“身心遭受迫害，亲属子女受到

<sup>①</sup> 省委组织部：《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1979年2月20日。



株连。”1980年5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作出《关于王德同志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发〔1978〕75号文件对‘六十一人案件’已明确指出是一起重大错案。因之，省委1973年5月18日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示定王德同志为叛徒是错误的，应予撤销，推倒强加给王德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sup>①</sup>在此之前，王德已恢复省委书记职务。

全省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乱打乱杀、乱揪乱斗而造成非正常死亡的42237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实事求是地重新作了结论，并基本上完成了善后工作，对受害者的家属按照政策给予抚恤或救济，照顾安排了部分子女的工作。

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杀人的案件，大部分作了处理。全省共立案调查涉嫌行凶杀人的人员3264人，处理了1494人，其中依法判刑的58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908人。

全省公安、司法系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全部政治案件、刑事案件和“文化大革命”前有申诉的部分政治、刑事案件进行了复查，共复查50956人，其中全部平反和部分纠正平反，合计28307人，占复查总数的55.5%。全省“文化大革命”中判处死刑以及各种徒刑合计38160人。已经复查了36512人，占95.7%。复查后改判纠正的18063人，占已复查总数的49.4%。

全省“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回乡30857人，收回城镇复工复户22837人，占总数74%。因战备疏散人员共10.7万人，除了10%左右的人已经死亡或判刑、外逃、赴港、出国外，仍有90559人。至1979年2月底，已收回复工复户的73670人，占当时疏散人员的80.2%。<sup>②</sup>

习仲勋对广州市庄辛辛冤案平反相当重视，曾开会研究为其平反。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事件的真相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广州。广州人民以各种方式表示拥护邓小平、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4月7日，广州半导体材料厂

<sup>①</sup> 参见《王德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24页。

<sup>②</sup> 参见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广东省监察厅编《广东纪检监察志（1950—1995）》，第333—335页。



青年工人庄辛辛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写信，表达了广州人民的共同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们的心中！”“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不要阉割的马克思主义！”“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sup>①</sup>为此，他遭到被捕、批斗，并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78年7月14日，习仲勋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特别提到庄辛辛事件。他说：“‘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习仲勋接着说：“过去，我们对那些跟着林彪、‘四人帮’搞打、砸、抢的人，对于一些资产阶级帮派头头，往往心慈手软，处理得太宽，而对于反对‘四人帮’的真正反潮流的人，往往求全责备，处理过严，这是很不正常的，人们之所以对这种现象不满是有道理的。像庄辛辛被判了15年，刑满后剥夺5年政治权利；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在我们的监狱里关了一年多，世上哪有这样的法律呀！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我一看庄辛辛的材料，就感到很有问题”。<sup>②</sup>就在同一天，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平反大会，省委书记李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了大会，宣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三、“李一哲”案件平反始末

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sup>①</sup> 见《广州日报》，1978年7月13日。

<sup>②</sup> 《习仲勋同志在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7月14日。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sup>①</sup>，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它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期望”：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

<sup>①</sup> 所谓“李一哲”，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年轻人的名字各取一字而成笔名，曾任广东省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的郭鸿志参与写作，但没有署名。大字报初稿于1973年9月13日，1974年11月7日修改出第三稿，删去原来前言，加上1.3万字的序言。

件”。当年，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因此，会场气氛激烈。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按理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来广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sup>①</sup>经省委决定，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12月30、31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sup>②</sup>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青年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王宁以及宫策、雷力行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放出来，完全自由，到今天第25天了。现在春节快到了。原想春节前把你们的问题结束，现在看太仓促（李正天：是仓促）。比如说，开个会，总要表个态，讲个话，总要准备准备。你们想过没

<sup>①</sup> 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sup>②</sup> 引自《习仲勋同志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1月24日下午。



有？（答：想过。）现在看只有到春节后才行。春节，你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住在东湖这里，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李正天等人详细描述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之后，习仲勋要求他们配合省委把平反的事情处理好。除了他们今天提的方案，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方案更合适，一切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提醒他们切记注意要冷静。极少数的人会利用他们，会钻空子的。对坏人、对反动的观点，要顶回去。习仲勋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sup>①</sup>李正天等人还提出，因他们的事而受牵连的有二三十人，虽没有关进监狱，但也办班审查，气很大。在开平反大会前，希望省委安抚他们一下，听听他们意见。习仲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有必要和李正天等人再谈一次话。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以及梁冀、宫策、雷力行的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正天等人谈了过春节的感受。习仲勋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吴南生说：对你们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有一个什么错误呢？有个形而上学。开始，你们年青人，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北京来电就叫毛泽东思想，不知道有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在那里搞鬼。你们在文革初期搞了一些东西，后来你们变化了。办具体事情的人，没有把前边的事和后边的思想转变加以分析，混在一起，没有分开来，所以形而上学。你们后来变化是思想决定的，思想变化较大，对林彪、江青认识较深。另外，你们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没有当官思想，不像刘继发、梁锦棠、孙亦武（三人为群众组织头头——引者注）他们当官思想严重。你们写大字报，敢写江青那些东西，他们就不敢写。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1月24日下午。

在李正天等人谈了写大字报过程之后，习仲勋对他们说：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要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向他们指出，在平反大会上，你们对林彪、“四人帮”要控诉，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最后，习仲勋说：第一，这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感觉是不是交心的？（答：是交心的。）第二，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三，我们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后，在三中全会的精神下，对你们的事情解决处理，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其次是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如没有林彪、“四人帮”这段特殊历史，就没有你们这个事。从1966年到现在十几年，要控诉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这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潮，对人随便揪，随便斗。你们发言第三部分讲讲你们本身的事情，联系起来讲。你们受这么多罪，一是我们做得不对，我也反对，但把你们抓起来，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你们没戴吧？还绑了很多绳子。这样做，对我们青年是很大的锻炼，对以后成长有好处，还可以教育广大青年。发言的第四部分讲过去没有民主，现在有了民主了。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力。还要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要搞那些资产阶级民主。<sup>①</sup>

习仲勋、吴南生还与他们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当天下午，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批复的精神，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问题。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第二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1日。



但习仲勋没有料到的是，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三人在第二天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习仲勋于2月3日晚上开完省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在11时23分至2月4日2时20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紧急通令。”

习仲勋指出，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响。你们强调开会的地点，叫我们很难办事。你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点？我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搞民主集中制，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第二，要我参加这个会，我能和你们这样谈这么多次，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我的时间问题。习仲勋说明他要赶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接着说：对你们的问题，省委已经够重视了，委托吴南生同志处理你们的问题，平反大会吴南生书记讲话，一个省委常委主持会议并宣布省委的决定，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总想顺顺当当的处理。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在听了习仲勋为“李一哲”案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之后，郭鸿志感动地说：今天未见面之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你这是做委曲求全的安排。习仲勋说：不是委曲求全，合理的就办，不合理的就不办，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sup>①</sup>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

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成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等30人。习仲勋在李正天的介绍下，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之后，习仲勋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12月30日才放出来。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有个过程。冤、假、错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时间，如不把情况搞清楚就平反，又来个反复，那不好。刘和明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广东人多，5500万人口，现在1000万人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工人、农民、干部不吃粮食不行。我明晚要到肇庆去，省委有分工。你们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做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多钟头。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他们的案子，和他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

但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由张嘉琪念了《对“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问题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勋反复做工作，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sup>①</sup>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第三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2月4日。



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sup>①</sup>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反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现实，指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又如，大字报中表现出来的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不满，对江青他们歪曲历史，别有用心地评价法家人物，以及对所谓评法批儒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提出的批判，都是对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吴南生在讲话中还谈了省委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会场上气氛活跃，充满了团结胜利的气氛。<sup>②</sup>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

①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事件的决定》，1979年1月5日。

② 《省委召开“李一哲”案件平反大会》，《南方日报》，1979年2月7日。



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sup>①</sup>《南方日报》通讯员和记者所写的《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sup>②</sup>

习仲勋2月5日抵达肇庆，参加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和文章。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对“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1979年2月20日。

<sup>②</sup> 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无往而不胜。<sup>①</sup>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珠海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李正天。

习仲勋谈了对《中国青年报》刊载中央美术学院杜×文章的看法。这篇文章有一段写道：“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叫嚷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窃据中央权力的‘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习仲勋认为这篇文章

“把王洪文和当时的省委挂在一起，给我们省委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肇庆时“就向中央反映，让家里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说省委已向中央反映，如何处理，让他们请示中央考虑”。习仲勋对李正天说，“省委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中央和各方面都是同意省委的处理意见的”。“从现在的省委、我，都是要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的。不是因为你们几个人怎么样，广东的冤案、假案、错案还多得很，比你们的案子大的也很多。”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

“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你不是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入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

<sup>①</sup> 陈仲旋：《怀念习老——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第175页。

袱。”李正天说：“我永远不忘记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党的领导。……党把我这样11岁的孩子，送到美术学院少年班，培养12年，是党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养大，又教会了我本领，我是要报答的。……我不要求当官，我不要求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sup>①</sup>

可是，20天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并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据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省委珠海宾馆五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革命中搞的那一套。你们的来信，要求调动工作，我专门召开会议，一件件地处理、落实，对你们的事情，我是很负责任的。我是去年来的，不是办你们的案子的。你们想一想，哪一件事，我对你们玩过权术？有欺骗你们、不诚意地对你们的事情吗？你们这样搞，叫我们没法办事。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你们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如果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李正天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接见李正天时的谈话要点》，1979年2月25日。



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sup>①</sup>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务求他们同意按所提第一方案办理。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来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按他们所提第一方案办理。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了《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这《再启事》贴出之后，有位自称“李一哲支持者”在翌日上午便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认为取消开会明智之举。

但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青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第五次接见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3月17日。

青年工人刘××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几处热闹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同时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团省委领导“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省委报告。习仲勋等人耐心地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询问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告诉团省委领导，省委经过分析，认为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知青问题、复退军人问题、待业青年的安排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弄不好会被坏人利用，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教育要求集会的青年，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要十分珍惜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习仲勋指示“这任务难度很大，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改变一个公开声称‘风雨不改’的集会，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要去做好，保证做好。”<sup>①</sup>团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派出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干部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六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帖，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这样搞，为什么国家不能干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王希哲那样搞，不批评教育还行吗？！现在人民群众都

<sup>①</sup> 李海东、江东海、邓惠强：《高瞻远瞩 关心青年》，《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90—591页。



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你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有存心搅乱的。如果他们还要那样搞，就要看把他们编到哪个队伍里了。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接着，习仲勋念了王希哲等人4月1日的讲话要点：一、对形势的看法，二、对党的看法，三、对国家经济体制的看法，四、对毛主席的看法。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找王希哲、刘××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表态说：我看李正天同志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sup>①</sup>

<sup>①</sup> 《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李正天的谈话记录》，1979年4月2日晚上。

4月3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刘××以及李正天等17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10时30分至12时25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你们一搞，北京、上海、宁夏又会搞起来了。宁夏已有人与你们联系来了。我的消息比你们灵通，不然，我不来广东当第一书记。我讲的你们搞集会会控制不了，指的是这个造成的影响，是你们所不能控制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做法。

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插话进行交谈。他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这些青年人取消这次公开集会。临走时，习仲勋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使命啊！”经团省委与“学会”进一步协商，“学会”撤销了4月5日集会的“公告”。“一场很可能导致动乱的集会”，就这样在习仲勋的领导下，“春风化雨般静悄悄地平息了”。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



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sup>①</sup>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4月25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领导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sup>②</sup>

习仲勋、杨尚昆之所以如此重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一是此案在广东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港澳台地区与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人关注此事，处理不好，将会借此大做文章；二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人借“解放思想”之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任由“李一哲”等人进行集会，可能会波及北京、上海、宁夏等地，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不利于工作重点转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李正天等人的思想工作，以利于稳定广东安定团结的大局。

除“李一哲”案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习仲勋的直接关心下处理和昭雪的。<sup>③</sup>

<sup>①</sup> 《习仲勋、杨尚昆同志接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及李正天等人的谈话记录》，1979年4月3日晚；李海东、江东海、邓惠强：《高瞻远瞩 关心青年》，《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91—592页。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致胡耀邦同志并报党中央的报告》，1979年4月25日。

<sup>③</sup> 参见贾延岩：《往事历历——习仲勋不朽》，《怀念习仲勋》，第268页。



#### 四、复查平反“反地方主义”等案件

建国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由于受到“左”的影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不少干部受到打击。习仲勋和省委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广东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反右派斗争以及华侨房屋等问题，也一一作出正确的处理。

习仲勋主要依靠省纪委对影响很大的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平反。

广东在20世纪50年代因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曾先后发生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广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并认为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人分别作了检讨。方方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改为第五书记。翌年，方方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职务。七千多名地方干部受到处分和牵连。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在1957年底，是年12月，省委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冯白驹撤销省委书记和常委职务的处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第二年，又以古大存对其错误处分不作任何检讨，对处分不服为由，报经中央批准，给予古大存撤销省委常委、副省长职务的处分。因此案而受到批评的有省委书记尹林平，受处分的还有省委常委云广英，省委委员、候补委员钟明、吴有恒、周楠、饶彰风、冯燊、王维等人，全省受处分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受批判的省委委员有17人，77位省直部、厅级和地市级的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受到撤职或降级的处分，广州、海南



等一些地方还定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是持肯定态度的。1958年3月中旬，他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上听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汇报工作时插话说：“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马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以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sup>①</sup>

因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展开或交叉进行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许多地方干部被划为右派分子，致使这批久经考验的地方干部蒙冤20多年，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也造成不良的影响。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原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领导以及一些受害者曾经在不同场合向他反映过“反地方主义”问题。在广东，“反地方主义”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这是因为不仅两次“反地方主义”是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而且一些当年参加过“反地方主义”的当事人还健在，有些调到北京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而在当时的省委常委中，除了习仲勋、杨尚昆同“反地方主义”没有关联外，大部分常委都参加过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些人一直认为广东确实存在地方主义，古大存、冯白驹当时确实有错误。

习仲勋等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决定对这两次“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但是，遭到省委中某些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遇到很大阻力。其理由：一、反地方主义的

<sup>①</sup> 转引自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196页。

案件是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不能平反；二、如果说，反地方主义有某些不妥之处，那只能说是扩大化，不存在冤案错案的问题；三、反地方主义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意思是说，“反地方主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中央提出拨乱反正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有人以种种借口对为古大存、冯白驹“反党联盟”冤案平反进行抵制和反对。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还是坚持要复查这一历史冤案。他们一致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反地方主义”是错误的。既然是错误的东西，不管是来自谁都要彻底平反。并反驳了某些人提出的反地方主义仅仅是扩大化的论调。<sup>①</sup>有一次，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见到习仲勋时，问他：“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搞成。”<sup>②</sup>

尽管习仲勋等人为广东“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平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们对持反对意见的人反复做思想工作，可是，在省委召开的几次常委会议上，对这一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有一天清晨，习仲勋在珠江河畔散步时碰到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将军。庄田询问习仲勋为“地方主义”案件平反问题进展情况如何？习仲勋感慨万分地说，阻力很大。他向庄田提出，希望他开展“游击战”，配合省委工作。<sup>③</sup>言外之意，就是请庄田组织人马撰写有关冯白驹革命事迹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为平反做舆论工作。庄田按照习仲勋的要求，组织人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海南、广东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

① 念人：《胡耀邦、习仲勋重视“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平反》，张江明选编《广东历史问题研究——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研究资料》，学术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379—380页。

②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内部出版，第281页。

③ 念人：《胡耀邦、习仲勋重视“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平反》，张江明选编《广东历史问题研究——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研究资料》，学术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第380页。



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对平反“冯古反党联盟”一案起到了促进作用。

习仲勋和杨尚昆把通过各种渠道向他们提出的申诉转给省委纪检委，要求省委纪检委对“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据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黄静波回忆，在解决“冯白驹、古大存反党集团”案时，习仲勋为统一省委班子的思想，为使案件顺利解决，进行了多方努力，经过艰苦工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sup>①</sup>

1979年1月，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在小组会议上听到一位曾在古大存身边工作过的省政府厅局级干部发言，称冯白驹、古大存一向不和，在省府的党组会议上，经常发生争吵，根本不存在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这回事。习仲勋听得很认真，还问：“是这样的吗？”这位干部的发言印了简报，引起与会者很大的反响。有许多地方干部认为这个发言好，讲了他们长期以来不敢讲的话。<sup>②</sup>在这次会议上或会后，刘田夫、吴南生、尹林平、罗天、杨康华以及其他一些长期在广东从事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人，都主张为地方主义平反。习仲勋还征求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庄田将军的意见，因为他是琼崖纵队仍健在的代表人物，庄田也十分赞成为冯白驹以及海南“地方主义”案件平反。因此，习仲勋在1月25日的总结发言中郑重提出对广东“地方主义”要进行复查。

3月，省委纪检会按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根据中央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对“反地方主义”问题进行认真复查。省委纪检会召开座谈会，讨论了有关文件，并对复查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和部署。

3月16日，杨尚昆在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纪律检查工作指出：要吃透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会议的精神，建立健全机构，武装头脑，再执行任务。当前，必须抓紧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的案件，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同时，要为历史上遗留的错误批判“地方主义”问题平反。他说：尽管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的同志

<sup>①</sup> 黄静波：《习仲勋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功不可没》，《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sup>②</sup>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第280页。

可能有什么缺点错误，但为他们平反是应该的，要改变那种只看他同那些人来往、来往多少次就扣地方主义帽子的不正常现象。<sup>①</sup>

习仲勋也知道此案的复杂性。过去中共中央根据广东省委上报的不同意见，中央已经批复同意不复查。而当年某些参与反地方主义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坚持认为，反地方主义是必要的，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而从全国形势、三中全会精神和叶剑英的意见来看，是应当予以复查的。习仲勋觉得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决定以省委名义向中央请示，提出准备复查此案，由中央审定。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文称：“根据三中全会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今年初，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最近，省委对此事又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拟向全省发出《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因反地方主义问题是广东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牵涉的面也比较广，现特将《通知》稿报送审查，我们拟待中央批复后再行下达。请指示。”



1979年，叶剑英（左七）与广东省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左九）、杨尚昆（左五）、焦林义（左三）、刘田夫（右三）、王全国（左一）等在机场合影留念。

<sup>①</sup>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



随此报告还附上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习仲勋把一份准备向下发的通知稿，先送中央审查，这在当代广东历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他是相当慎重行事的。

由于在当时省委内部有强大的压力，所以这份通知稿首先肯定古大存、冯白驹等是有错误的：“过去广东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受到批判的主要同志，是确有错误的，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对他们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评也是必要的。”接着，又说：

“但是，过去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特别是第二次，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展开或交错进行的，存在着简单化、扩大化的缺点错误，现在看来，当时批评的地方主义，大量的的是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有的只是在对待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上，在处理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有过一些错误言论或行为；有的是在党内对党的工作或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或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况；有的是干部之间的正常来往而被当作地方主义活动。”《通知》委婉地指出当年反地方主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所以要进行复查。

《通知》指出：“在这次复查时，对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的案件，凡是搞错了的，或者定性不准、处分不当，甚至错定为反党分子、错划为右派的，都要按照‘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不错不改’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通知》接着明确指出：“1957年至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至于个人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搞错了或处分偏重的应当分别纠正；有其他错误应予指出；至于一般工作、思想、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属于帮助同志，提高思想问题，不复查，不写入结论。”

《通知》还指出，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的县（科）级（不含）以下干部，一律撤销原处分。并分别说明由那个单位复查、恢复工资待遇以及改正家属子女受牵连问题。同时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有步

骤地抓紧抓好复查工作，“力争在今冬明春完成”。

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复广东省委，同意上述请示和复查通知。批示指出：“中央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广东的全体干部，在党的路线的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为把祖国南大门建设好贡献一切力量。”

习仲勋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喜出望外。由于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大大减轻了压力，也增强了对此案复查的信心。10月27日，省委向各地发出通知，指出：“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和《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业经中央批准，现连同中央的批复一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全省的共产党员、全体干部，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党的路线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为建设好祖国的南大门共同奋斗。”<sup>①</sup>

1980年1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视察广东。1月24日，胡耀邦和习仲勋前往广州军区探望原副司令员庄田将军。胡耀邦与庄田是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他们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庄田任该校第五大队长，胡耀邦任第五大队政委。习仲勋和庄田一起向胡耀邦汇报了为“古大存、冯白驹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平反问题。胡耀邦态度很鲜明，认为应该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并要习仲勋写一个复查报告，送到他那里。

广东省纪委经过半年多的复查，于1980年6月17日，向省委递交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报告对原决议中关于冯白驹、古大存“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结成“反党联盟”的所有依据，一一否定。报告指出，冯白驹某些言论和行为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影响党的团结。古大存讲过一些错话。“当时对他们的错误批判是必要的。但他们的错误仍属于认识问题和思想作风问题，原决议认定‘冯白驹、古大存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以冯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粤字〔1979〕99号，1979年10月27日。



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结论和给予他们的撤职处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经省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建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原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同意省纪委的复议报告，并于1980年10月29日，以粤发〔1980〕102号文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纪委，提出了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案予以平反。省委的这个报告，指出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性质搞错了，当然应该平反。同时，又指出：“冯白驹、古大存是有错误的，当时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是必要的。”然后又说：“认定冯白驹、古大存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的结论和给予他们撤职的处分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这个报告虽然撤销了“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帽子，但还保留冯白驹“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情绪”，古大存有“片面性和右倾情绪”，“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是必要的”等提法的尾巴。这一结论虽然还不够彻底，但习仲勋已经是做了大量工作，冲破不少阻力，才争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通过这一结论的。

广东地方干部对报告提出批评冯白驹、古大存错误“是必要的”这个留尾巴的“平反”结论并不满意。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及其家属认为不能接受，继续向省委、中央纪委和中共中央提出申诉。

习仲勋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仍关心过问这一案件的彻底平反工作。1982年4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但由于有人想为复查结论“留尾巴”，结果节外生枝。习仲勋为赴京上访的曾史文做疏通工作。经陈云、黄克诚、习仲勋等人的关心过问，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9日发出了《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sup>①</sup>

经复查后，一大批因古大存、冯白驹错案而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先后恢复名誉，全省撤销了原处分的有1222人，其中属于中央、省委管理干部126人。同时，复查纠正了所谓“以冯白驹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陈恩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蓬荆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等集团性质的案件。<sup>②</sup>后来，方方“地方主义”一案经过复查，中共中央也撤销了对方方的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这宗历时40多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在为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一冤案的平反工作中，习仲勋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吴南生对此评价说：“习仲勋来到广东以后，依靠省委作了大量工作，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韦国清也很想为‘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平反，但是还是有些顾虑。没有习仲勋，我们当时很多话都不好说，也就没法把平反‘地方主义’工作做好。”“习仲勋在处理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时，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复查，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干部政策。没有他，广东平反‘反地方主义’冤假错案就不会这样有成就。实践证明，习仲勋的做法是正确的，维护和调动了干部的积极性，促进了广东局势的稳定和团结。”<sup>③</sup>

此外，习仲勋还领导复查其他历史遗留问题。

一是复查改正错划右派案件。

按照中共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等有关文件精神，广东制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就安置、若干政策、改正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1979年3月1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省管干部的右派改正，委托李坚真、龚子荣、王宁负责审批。<sup>④</sup>至1980年习仲勋离任广东时，全省原划为右派分子36808人，经复查改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恢复名誉的通知》，1983年2月19日。

<sup>②</sup> 省委纪委：《关于复查历史遗留案件情况的汇报》，1981年6月20日。

<sup>③</sup> 访问吴南生谈话记录，2004年7月7日。

<sup>④</sup>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通知》，1979年3月21日。



正36550人，占99.3%；除已有工作、死亡和出港出国等以外，全省需要安置的16132人，已安置16042人，占99.4%；未安置的90人。<sup>①</sup>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前干部案件的复查。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广东历次政治运动错伤了不少干部。到习仲勋调离广东不久，全省对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倾、“四清”等运动中的党员干部案件进行了复查，其中包括对全省影响较大的“松仔岭事件”、“江门事件”、“临高事件”等集团性历史遗留案件，涉及党员干部18134人（含“地方主义”案件1222人）。经复查对错案作出了平反纠正，使受牵连的有关干部得到昭雪。其中，撤销原处分的8741人，减轻处分的2833人，合计11574人，占复查总数的63.82%。<sup>②</sup>与此同时，还复查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的非党员干部和群众共1.5万人，其中撤销和减轻处分的共9000多人。至1979年底，全省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82684个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复查，其中减轻或免于处分的14985人，恢复党籍的14264人，重新安排工作的26732人，改正错划成分的2500多人，给予经济补偿的53312人。

三是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区别政策。

1980年习仲勋离任广东时，全省区别工作结束，列入“区别”范围的原工商业者共67599人，有52458个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中区别出来，占77.6%，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sup>③</sup>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四是落实侨务政策。

广东是全国主要侨乡。建国后，在土改、私营企业改造、特别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广东省监察厅编：《广东省纪检监察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sup>②</sup> 原《广东省纪检监察志》第337页，撤销原处分、减轻处分合计11624人，占复查总数的64.1%，计算有误，合计应为11574人，占复查总数应为63.82%。

<sup>③</sup> 省委区别工作领导小组：《广东省对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进行区别工作的总结报告》，1980年12月1日。

是“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广东大批有“海外关系”的人受到无情打击与迫害，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的积极性，在海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1979年3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有爱国的传统，1970年推行的《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是错误的，应予以彻底批判。凡因这个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sup>①</sup>

据统计，全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因“海外关系”而造成的冤假错案5481宗、14271人；落实了侨改户政策，发出了47752份证明书以确认提前改变华侨地富成分；调整安置上山下乡归侨知识青年回城工作1803人（含子女），调整安置归难侨及其子女到城镇工作落户8533人（含子女）。落实原被精简归侨职工的政策，共收回归侨职工5300人。

广东省委、省政府为了解决土改遗留的、城镇私营企业改造遗留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挤占的华侨房屋这一老大难问题，先后发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采取措施，加快落实侨房政策的进度。

五是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

据统计，全省共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10083人，应落实政策的2111人，到习仲勋离任广东时，已落实的2005人，占94.9%；应安置的765人，已安置的725人，占94.8%。<sup>②</sup>

广东省还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去帽子和给100多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及他们的子女重新划定了成分。<sup>③</sup>另外，还全面贯彻落实知识分子、党外人士以及宗教政策，等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共解决了大约20万人的问题。通过平反昭雪，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sup>①</sup> 《南方日报》，1979年3月9日。

<sup>②</sup> 省委摘帽办公室：《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工作情况汇报》，1981年5月30日。

<sup>③</sup> 《南方日报》，1979年10月22日。



齐心协力进行四化建设，创造了重要条件。

习仲勋和杨尚昆由于他们自己有过多年被监禁的经历，当全国还笼罩着“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时，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原则，在解放广东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干部群众对此一直铭记不忘，给予高度的评价。

## 第十章 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 一、筹建深圳、珠海出口基地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扭转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局面，探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途径，吸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考虑如何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逐步进入国际市场的问题。中央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国考察，研究外国发展经济的经验；同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共商振兴中国经济的国策。中央和邓小平把目光投向沿海，投向南方，他们对广东寄予厚望，把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广东。

习仲勋到广东上任后，面对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他考虑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带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

197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选派三个代表团（组），分别出国和到港澳考察经济，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其中一路为国家计委、外经贸部派出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4月10日至5月6日，该考察组抵达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组的目的很明确：探索弹丸之地的香港、澳门经济飞速发展的奥秘，吸取有益的经验。考察组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介绍他们在港澳地区实地考察经济的情况，引起广东领导人的很大震动。在交换意见时，考察组对开拓宝安、珠海的建设规划提出不少好的意见。他们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地的农业，从“以粮食为主”



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要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等等。习仲勋、刘田夫等广东领导人打开了思路，解放思想，向考察组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建议。接着，积极收集对外开放可供借鉴的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

考察组回京后，写出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上报中央。报告强调：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对港澳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力争经过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设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

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口头汇报，同意其建议，并作了指示：“总的同意”，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这时已经开始萌芽。

另一路就是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考察团。再一路为赴西欧五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考察团。他们回国后都向中央写了书面汇报。

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规格最高，也最引人注目。其主要成员包括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敏和办公厅主任李灏，北京市副市长叶林，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等，共30余人。5月初，谷牧带领这个中国对外经济代表团，出访西欧五国。该代表团对西欧五国近20年来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启迪。

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谷牧的详细汇报。出席听汇报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乌兰夫、纪登奎、苏振华、吴德、陈锡联、聂荣臻、陈慕华等政治局委员和王震、康世恩副总理。谷牧着重讲三个问题：（一）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二）它们的

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的关系；（三）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听了谷牧的汇报之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讲话中表示，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根据现实的国际斗争格局，要积极利用西欧的技术、资金。结合本国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随后，邓小平单独听了谷牧汇报出访的情况，他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明确指出：（一）引进这件事要做；（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三）要尽快争取时间。<sup>①</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郑重地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决心冲破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吸取国外先进经验，推动经济建设，逐步进入国际市场。中央决定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明确要求广东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坚决执行、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和部署。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王全国出访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省委领导和其他干部听了传达，反映强烈。“有的同志说，只要改革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利用广东沿海的有利条件，广东的现代化建设一定可以高速度前进。”<sup>②</sup>

6月20日晚上，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常委学习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同志听取赴日本经济代表团、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汇报时的指示。省

<sup>①</sup> 谷牧：《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半月谈》1998年第15期。

<sup>②</sup> 王全国：《参与制定广东特殊政策前后》，《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32页。



委常委会认为，党中央对广东十分关心，给予很大支持。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抓紧落实，切实搞好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决不辜负党中央的殷切希望。常委会研究了省财办主任胡广恩等人关于宝安、珠海两县的体制等问题。常委会认为，宝安、珠海两县建设问题，目前可组织一个班子，在省委、地委统一领导下，与地、县一起研究制定规划。

省委还听取了省外贸局杨光辉汇报了外贸部召开的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座谈会精神，迅速开展全省对外装配业务，发展南海渔业生产，修建广州至澳门的铁路等问题。常委会决定由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建安主持召开省有关单位开会研究，提出方案，经省革委会批准后落实。重大问题由省委讨论决定。<sup>①</sup>

这次常委会议是研究贯彻落实中央领导人指示精神的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东首次研究宝安、珠海建设，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以及发展旅游业问题。

李建安雷厉风行，第二天下午，即召集省直有关委、办、局的负责人，研究如何抓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工作的落实问题。大家认为，中央如此重视又这样支持广东，我们应该切实抓好，一件一件抓落实，决不能“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上来”。大家群策群力，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6月23日，李建安和刚从外地调来广东不久的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联名向省委上报了《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报告提出了组织领导、机构设置、建农副产品出口基地、进出口物资、工业交通建设、来料加工、引进生产线、搞好城镇建设和发展旅游业等，已初步勾画出深圳、珠海的未来雏形。<sup>②</sup>习仲勋和省委其他成员基本上同意采纳这一实施方案，广东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地打开了。

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视察。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强

<sup>①</sup>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8年6月20日。

<sup>②</sup> 李建安、黄静波：《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1978年6月23日。



烈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他指示宝安县委下决心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两地差距。要建立供应香港的外贸商品生产基地。要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资金办厂，也可以搞厂外加工。

接着，习仲勋派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兴的边防城市（简称“三个建成”）。省委、省革委会听取工作组汇报后，对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的意见。10月，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三五年内宝安、珠海的建设目标以及政策和措施。

省委、省革委会根据本省的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成功经验，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省委、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还到深圳、珠海察看地形、地貌，和有关人员研究出口商品基地和市政规划的初步蓝图。

为尽快建立宝安、珠海外贸基地，习仲勋和省委有关领导交换意见后，确定由省计委副主任张勋甫和省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吴健民分别担任宝安、珠海的主要负责人。在此之前，这年9月，习仲勋首先派省委常委、省农业办公室主任薛光军去征求吴健民的意见。因为薛光军和吴健民认识多年，彼此间比较了解。谈到去珠海的事，吴健民对薛光军说：“像我们这样的老党员，受命到新的地方去开荒，按党性来说，我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这是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薛光军表示，省委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吴健民抱着一种探索和开荒的态度，表示愿意去珠海工作。

同年10月初，习仲勋分别找张勋甫、吴健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前段时间，中央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经济考察。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建成两个出口基地。因此要求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这个建议。现着手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在张勋甫、吴健民分别表示愿意赴任时，习仲勋向他们表



示，省委一定会全力支持他们。

吴健民对习仲勋这次亲自找他谈话，印象十分深刻：

习仲勋对我说：“现在我省在改革开放这方面要进一步采取深入实践的形式。国务院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进行了考察，并在靠近港澳的地方进行了调查。考察组写出了报告，要求把珠海、宝安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样需要变更珠海、宝安的行政职能，把它们改为省辖市。省委同意了建议，现在正在筹组这两市的领导班子。省委初步决定由你担任珠海市委书记，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搞外贸基地的经验，怕不能完成任务。”习仲勋就说：“大家都没有经验，你去完不成，别人也完成不了。”接着，我们谈到了农村商品经济基地建设的问题。我曾在中南局当农林计划局局长，当时很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对搞好农村有一个新观点，就是要从商品经济方面着手改变农村的计划经济体制。习仲勋很感兴趣，一个劲叫我说下去。听完我的看法后，他说：“你认识了农村商品经济的重要性，又做过调查，我看你担任这个职位没有问题。”<sup>①</sup>

1979年1月23日，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健民任市委书记。

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同年2月，国务院还批复广东省革委会，原则上同意上报的《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宝安、珠海毗邻港澳，地处边防，工农业生产基础薄弱，斗争十分复杂。抓紧时机把两县建设好，对于充分利用港澳，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国际交往和开展旅游服务事业，加速边防地区的建设，无论政治

<sup>①</sup> 访问吴健民谈话纪录，2004年7月20日。

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国务院要求必须从各方面充分利用两县的优越条件，“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把它办成、办好。”“国务院深信，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实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把宝安、珠海两个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建设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是完全可能的。”4月5日，省革委会将《国务院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批复》印发全省各地，要求认真贯彻执行。

## 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酝酿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无疑增强了他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随后，习仲勋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习仲勋回到广东，向省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地、市、县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会议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月25日，习仲勋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明确提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sup>①</sup>王全国在扩大会议上谈了体会后，结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1月25日。



合广东实际，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初步构想：“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当前大好国际国内形势下，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之前，要求在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权力。”<sup>①</sup>习仲勋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提出报告。

同月，叶剑英先到海南岛视察，随后抵达广州。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近年常回广东，他看见故乡贫穷落后，异常焦虑，心情也很着急。他在接见广东省领导人时谆谆嘱托：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这不仅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嘱托和期望，也是国内老百姓和海外爱国同胞包括港澳同胞的呼声与愿望。这时，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不久，邓小平作了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sup>②</sup>



向叶剑英汇报广东改革开放情况，左起：习仲勋、谷牧、叶剑英、刘田夫、杨尚昆。

<sup>①</sup> 王全国：《参与制定广东特殊政策前后》，《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32页。

<sup>②</sup> 《王全国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10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叶剑英的殷切希望和邓小平的批示，对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广东干部看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于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酝酿广东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的构想。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后，从2月3日起，习仲勋、杨尚昆等省委领导带领工作组陆续分赴各地，参加地、县、市召开的干部大会，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就地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迅速组织春耕生产。

省委书记吴南生按照省委的分工，率领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汕头曾经是中国南部一个对外开放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同香港的差距并不大。30年过去了，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一片繁华。而眼前的汕头市，却如此贫穷落后，满目凄凉。重返故园，吴南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2月21日晚上，吴南生向习仲勋、杨尚昆并广东省委发了一份电报。报告在指出汕头存在的突出问题后写道：“后来，我还同地区有关部门的同志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达400万吨，海上的客运达35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了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sup>①</sup>他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习仲勋到他家中，两人高兴地交谈了很久，从平反谈到发展经济。3月3日，习仲勋

---

<sup>①</sup> 《吴南生同志给省委的报告》，1979年2月21日，《经济特区的由来》，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185页。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吴南生在汇报工作时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国家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我是喜欢下象棋的人，懂得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动权。”先走一步那个“子”怎么走呢？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就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外面很有影响的人物，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sup>①</sup>

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认真思考如何充分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优势，使广东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经过认真讨论，省委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基础，加上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手脚捆得紧紧的，使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这一问题必须很好加以解决。<sup>②</sup>

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4月1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刘田夫、王全国、吴南

<sup>①</sup> 访问吴南生谈话记录，2000年5月30日、6月3日。

<sup>②</sup>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481页。

生、龚子荣、薛光军、杨应彬，列席会议的有黄静波、范希贤等省革委会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材料》一是介绍广东的主要情况；二是提出省委的想法，打算用三年时间，执行以调整为主的“调整、恢复、充实、发展”方针。在调整中，首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也要抓好。要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力发展外贸，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要加快建设深圳市、珠海市、开发海南岛和发展旅游事业的步伐。要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要求中央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要求中央对调整整个国民经济早日作出统一部署。第二，请求中央减轻广东粮食任务，在现行45亿斤征购任务的基础上，减少3亿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42亿斤的水平。第三，为了充分发挥广东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外贸方面的有利条件，要求中央给广东必要的权力，凡属地方性的这类问题，授权广东处理；外汇方面给予较多的机动，外汇提成希望从现在的6%增至10%；侨汇物资供应请中央大力支持。第四，要求中央大力帮助广东解决电力、燃料、交通运输问题。<sup>①</sup>习仲勋等人就《汇报材料》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4月2日下午，在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龚子荣、薛光军、杨应彬，列席会议的有黄静波、范希贤、汤国良、张汉青、王焕等24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材料。根据省委常委会的决定，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研究了关于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准备于最近赴京向中央作专题汇报。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向常委会汇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和意见。汇报材料提议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请中央大力支持和帮助；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

<sup>①</sup> 广东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1979年4月2日。



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当前，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礮石、达蠓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sup>①</sup>

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1. 广东的位置。国家如何在物资、技术、旅游方面为广东创造条件。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本身引进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看，最有利是广东。2. 从广东说压力很大。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都搞成那样。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sup>②</sup>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常委会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在赴京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sup>③</sup>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会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向中央作口头汇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杨应彬等人根据上次常委会意见，修改形成了《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情况、想

<sup>①</sup> 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充分利用广东省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1979年4月1日。

<sup>②</sup>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1979年4月2日下午，《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87页。

<sup>③</sup> 广东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1979年4月4日。



法和要求》，当天发给到会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会决定不再讨论，由杨应彬按习仲勋所提意见进行修改，送习仲勋审定；其他常委和副主任如有修改意见，可迳告杨应彬。<sup>①</sup>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所以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sup>②</sup>

4月1、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省委作出的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不仅为广东而且为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会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前往看望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非常高兴，表示支持，说：“你们要快些向邓小平同志汇报。”<sup>③</sup>

① 参见广东省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1979年4月4日。

②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页。

③ 访问吴南生谈话记录，2000年5月30日、6月3日。



### 三、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提出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委书记与主管经济工作的书记，国务院主管局负责人等共190人。习仲勋和王全国代表广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习仲勋被指定为中南组的召集人之一。中南组共29人，有韦国清、邓颖超、方毅、王首道、廖承志、黄克诚、王平、刘澜波、卢绪章以及中南五省的领导人陈丕显、赵辛初、习仲勋、王全国、段君毅、毛致用、周光春等。4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

4月7日上午，习仲勋主持中南组开会。王全国、周光春、廖承志先后发言。王全国在发言中除了汇报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思想情况外，着重谈了当前主要是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提出改革现行管理体制问题。王全国说：“我们地方迫切要求进行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能够进行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习仲勋插话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sup>①</sup>

4月8日下午，中南组继续讨论李先念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赵

---

<sup>①</sup> 《王全国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7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辛初主持会议。全组到会20人。习仲勋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会议上发言。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插话。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搞什么样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和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学外国，只是借鉴人家的经验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前段有一阵风，好像外国什么都好，他们什么都愿意帮我们的忙。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还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基础出发，不能买一个现代化，也不能照搬一个现代化。”习仲勋认为，“中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使我们的计划工作，方针、政策、措施，更加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在谈了如何搞好调整之后，习仲勋说：“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的，很受拥护的。这次先念同志的讲话，没有这样明确指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没有讲这个‘严重缺点’，而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且强调要集中统一。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但当前的主要倾向是什么，应明确。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看来，在计划、财政、外贸、外汇、物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方面，都有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



的。”<sup>①</sup>习仲勋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sup>②</sup>习仲勋这次发言，因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在场参加讨论，因此，广东省委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去。

4月10日，王全国在中南组会议上，就如何利用广东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的问题，作了发言。他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面向东南亚，在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外贸和旅游业方面，具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求国家在这方面能给广东一些必要的自主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多干一点。广东完全有条件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外汇，并通过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针对国家审批补偿贸易项目缓慢的情况，王全国在发言中提出，“请求中央考虑广东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特殊情况，对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更多地予以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给予支持，使广东能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省的有利条件，把外汇做得更活一些，更大一些，为国家多作贡献。”<sup>③</sup>

福建省委领导人听说广东提出在对外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他们认为福建华侨不少，也向中央提出实行特殊政策的要求。

4月17日，习仲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向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习仲勋在汇报时，郑重其事地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习仲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sup>④</sup>他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8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sup>②</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9页。

<sup>③</sup> 《王全国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的发言》，1979年4月10日，见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一。

<sup>④</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9页。

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sup>①</sup>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sup>②</sup>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sup>③</sup>邓小平还说，（广东）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sup>④</sup>

华国锋就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问题说：“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华国锋还说：“小平提的问题今后谷牧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深圳沙子，现华润（有限公司）包了，不让搞。要搞起来。仲勋同志说，广东要是一个国家，早搞上去了。……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sup>⑤</sup>

在会议期间，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做法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深思熟虑地说：“还是叫特区

① 吴南生：《经济特区的创立》，《广东党史》1998年第6期。

②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④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49—550页。

⑤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节选）》，1979年5月3日，《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92页。



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sup>①</sup>

习仲勋对此事印象十分深刻，1999年，当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他时，他激动地说：

1979年我们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时，就包括了办特区的内容，这也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当时不叫“特区”，是小平同志定了“特区”这个名，他说过去陕甘宁就叫特区。我当时说过：“如果广东是个‘独立国’，可能几年就上去了。”我当时说“独立国”，是借用的话，我的意思是，广东有许多有利条件，就是缺少政策和体制的支持。小平同志很同意我的思路。当时有人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小平同志回答得很明确，很中肯，他说我们赚的钱是不会落在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的，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不会变资本主义。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一千至二千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小平同志说，“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邓小平同志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让广东省委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给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办特区这样一个大政策出台的思路[方面]，小平同志与广东的干部群众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一方面，广东有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大的思路也在这个方面想，并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sup>②</sup>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10页。谷牧：《中国对外开放的风风雨雨》，《半月谈》1998年第15期。

<sup>②</sup>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电视台：大型电视理论宣传片《春风绿南粤——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习仲勋接受采访的提纲原稿，1999年。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提议，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sup>①</sup>《规定》在“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中指出：为了调动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在出口特区，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出口特区的生产企业，要按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向国家缴纳税收，产品专门供应出口。

《规定》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有利条件”一节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还在北京时，习仲勋获悉中央明确决定之后，就要随从到北京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共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派主管外经贸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和两省党政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共同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谷牧“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剑英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sup>②</sup>

习仲勋回到广东之后，于5月3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

<sup>①</sup>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8月3日。

<sup>②</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50页。



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问题。习仲勋在传达会议精神后说：“搞什么式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会议期间，我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问题，都登了简报。在政治局的汇报时，我又说了，突出问题：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海南岛问题，搞外贸出口基地，以外贸养农业。在汇报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广东和湖南比较，情况是差不多的。但广东农田没有湖南多，所以产量不如湖南。（赵）紫阳说，过去种过油棕……除非要有新品种。”

关于体制改革问题。习仲勋说：“中央对体制问题，特别是广东的体制改革非常关心。谷牧来，我们要作好汇报。到底咋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20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sup>①</sup>

5月14日至5月26日，广东省委召开了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从5月26日开始，又扩大为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一共开了28天。

5月26日，习仲勋代表省委向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作重要讲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指出：中央工作会议，“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要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克服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打好基础。这使大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继续胜利前进的方向。可以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继续和发展，是我们党在新长征道路上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习仲勋归纳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有三点：第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正确估计了形势，统一了对形势的看法，维护和坚持贯彻了三中全会的精神；第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深入讨论了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明确了今后三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决心走出一条中国

<sup>①</sup> 《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节选）》，1979年5月3日，《经济特区的由来》，第192页。



式的现代化道路来；第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明确了在新时期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这是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保证四个现代化实现的重大问题。

此外，习仲勋还讲了这次会议对广东省关系很密切的一个问题。在介绍他和王全国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过程之后，他高兴地告诉大家：党中央对我们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还要向党中央汇报，我们省委也要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习仲勋惊喜交集地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在体制改革上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很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sup>①</sup>他后来还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sup>②</sup>

对于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赞成和支持。6月1日下午5时，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广州接见了正在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王全国、吴南生、王德、邓逸凡陪同接见。当叶剑英和许世友来到接见厅时，全场热烈鼓掌。习仲勋首先表示，“今天，敬爱的叶副主席不顾天气炎热，不顾80多岁的高龄，前来接见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sup>①</sup> 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5月26日。

<sup>②</sup> 王全国、杨应彬、张汉青：《缅怀习仲勋同志》，《怀念习仲勋》，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和极大的鼓舞。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把广东的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迅速搞上去，以答谢叶副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叶剑英高兴地说：“同志们反映，广东省委的负责人是可以信赖的，地委书记也是可以信赖的。关键在于领导。领导班子不好，工作就搞不好。县委书记是广东人的，请举手。（举手后）好，占多数。仲勋同志、尚昆同志来广东后，很注意培养地方干部。本地干部占多数，是可喜的现象。这不是地方主义。外省的同志来广东，在广东做了许多工作，是有很大贡献的。广东人民会称赞你们，不会忘记你们。”叶剑英同省、地、市、县委书记一起照相后，又同省、地委书记进行座谈。他在座谈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地方的同志要求经济体制要改变一下，下放一些权力。究竟下放多少，改变多大，没有把握。中央决定广东、福建先走一步，把广东作为试点。你们知道没有？”地委书记回答：“知道了”。叶剑英问：“兴趣大不大？”地委书记回答：“我们兴趣很大。”叶剑英说：“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所以很重要，同志们要努力。毛主席生前开会时，常说一句话：前面乌龟爬烂路，后面乌龟照样爬。爬在前面的很重要。你们要带好头。”<sup>①</sup>叶剑英根据中央关于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精神，语重心长地勉励广东各级主要负责人努力工作，年年有新的成绩，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搞好试验。勉励广东领导干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而作出贡献。习仲勋等人一致拥护叶剑英的讲话。他们表示，一定要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从广东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好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要尽快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为完成中央交给广东的任务，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王德分别就调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86年—1987年）》（下），第446页。

整国民经济，加速农业发展速度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了发言。6月10日，习仲勋受省委的委托，在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

这次会议讨论了调整全省国民经济的设想，并根据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研究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上先走一步以及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党风等问题。会议肯定了近两年来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成绩，也揭露了“洋冒进”造成重大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广东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使农、轻、重的比例和各部门、各行业的比例关系大体协调，使积累和消费趋于合理，使各项经济活动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会议还就广东如何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使大家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

#### 四、改革开放先走一步

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习仲勋带领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5日第一稿打印出来后，分送给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修改，至13日，专门班子根据大家意见三易其稿，省委和省革委会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人多次亲自修改。1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集体讨论。

根据中央指示，从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10多位负责干部，赴粤、闽两省进行考察。

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后，住在珠岛宾馆。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向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省委书记王全国、



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定石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广东的基本情况，包括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华侨港澳同胞、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情况。

二、广东国民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农业发展缓慢；(二)燃料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三)市场供应长期紧张，压力越来越大；(四)现行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五)装配加工、补偿贸易等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安排，无法落实和保证供应，一些必要的改建、扩建生产设施跟不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三、建议和要求。拟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创外汇：首先，多生产、多出口换汇率高，收汇多的农副产品、鲜活商品(包括水产)，发展轻工业和轻型加工工业，向高级精密产品的方向发展。这是发展出口商品的重点。其次，是地方建筑材料(砖、瓦、沙、石、水泥等)的出口，某些有色金属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三是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建立出口特区，允许华侨、外商投资建厂。与此同时，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改善侨汇物资供应，积极争取外汇，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四、初步设想：(一)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习仲勋等人的汇报之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了指示，使广东更进一步明确了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谷牧说：“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广东要一条条写体制要解决的问题。广东“要杀出一

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要改革体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计划经济和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你们和港澳打交道，基本上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我们搞特区，还是在中央、省委的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sup>①</sup>按照谷牧的这些指示，省委、省革委会委托王全国、曾定石与中央工作组甘子玉、李灏一道研究起草文件。代表广东参与文件起草的是杨立，还有秦文俊、赵君泽等。

5月14日，在刘田夫的陪同下，谷牧前往深圳市视察。在深圳考察时，谷牧强调指出，我们搞特区，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开放这两点是稳妥的，一定要把深圳、珠海这两个开放点搞好。5月16日，谷牧一行前往珠海市考察。晚上，听了刘田夫和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的汇报。谷牧感慨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谷牧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谷牧强调：“现在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比各省市更开放一点，使广东发展更快一点，广东面临港澳，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现在要求广东搞快一点，也是为全国体制摸索经验。”<sup>②</sup>

5月20日，谷牧在珠海宾馆再次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曾定石等人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

---

<sup>①</sup> 谷牧：《关于起草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之几点意见》，见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9、10页。

<sup>②</sup> 谷牧：《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见《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4—19页。



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第一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第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提出何时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

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

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起草文件小组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习仲勋等人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会讨论，5月25日，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曾定石以及杨立等人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初步规划设想；三、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试办出口特区；五、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sup>①</sup>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报告。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6月6日。

#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9〕50号

##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 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中共广东、福建省委，省革委，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局：

中央、国务院原则同意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参照执行。

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

中发〔1979〕50号文件影印件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经中央批准的广东省委报告提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报告明确规定，特区的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sup>①</sup>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年7月15日，见《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9、27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现在世界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中国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才能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新时代。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sup>①</sup>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增加创汇，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为中央和邓小平所重视。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四个经济特区的决策，而且



习仲勋和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右一）在中山温泉宾馆建筑工地视察。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

创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实行改革的一项重要实验，也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破口。中国试办经济特区，后来新华社在对外报道中，把它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

中央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南粤大地带来了一派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中央50号文发出之前，习仲勋曾到珠海市考察。6月29日，他在珠海市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珠海由县改市，不是单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将珠海建成一个特区。这种特区，不是引进澳门的制度。我们坚持的，仍是社会主义制度。”<sup>①</sup>

中央决定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之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刘田夫、王全国和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落实50号文件精神。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人。

8月27日下午，刘田夫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立即研究和制定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措施，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条例等。吴南生负责对外经济活动，目前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订、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

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9月18日，刘田夫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刘田夫代表省委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今天看来，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摸着

<sup>①</sup> 吴健民：《创办珠海特区五年的回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9月20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乘专机由广西桂林抵达广东。当天，习仲勋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

翌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他说：

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中央为什么同意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那是因为我们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全国除广东、福建这种形式的试点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试验，目的都是为了摸索改革经济体制的规律。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问题，习仲勋斩钉截铁地说：

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

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多商量，多动脑筋，不要毛毛草草。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要抢时间，时间就是速度。但目前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官僚主义严重，非下决心改变不可。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sup>①</sup>

22日，谷牧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负责人谈话。谷牧在回答习仲勋等提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时说：“仲勋同志提到的，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方针问题。我看不能有第二个方针，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非得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很快搞上去之外，还负有创造经验、闯路子的任务。”关于特区怎样搞法问题，谷牧指出，一个是要立法，要组织力量突击搞出来，北京派专家来帮助；二是要有实际行动，搞几个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地充实。要拿样板来说话。谷牧还要求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请示问题，三五天要解决。他还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的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那样大闹天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宫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sup>①</sup>习仲勋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表示同意。于是，省委决定由吴南生负责广东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谷牧这次谈话，使习仲勋等人更进一步明确了广东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实施办法，并鼓励广东领导人要学孙悟空，打破条条框框的桎梏，大胆地去闯出一条新路。

9月25日，刘田夫在广州珠海宾馆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办公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领导吴南生、范希贤、曾定石，深圳市、珠海市以及省直有关经济部门的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深圳市和珠海市的经济建设问题，决定：（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有权审批100万美元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三）省有关部门应结合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办法，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需要。<sup>②</sup>

9月25日至28日，习仲勋和杨尚昆等人赴京参加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有三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二是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三是增补中央委员和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后，习仲勋参加由中共中央于10月3日至10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主要是座谈1979年冬1980年春工作安排问题，中心仍然是怎样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0月3日，习仲勋向中央汇报了广东的工作。中央领导人都支持广东按50号文件规定放手搞，有些帐算的不大准，中央同意协商解决。会议期间，有一天，习仲勋和杨尚昆一起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工作。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传达说，邓小平“要我们放手搞，不要小手小脚，只要不丧权辱国，能

<sup>①</sup>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编：《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47页。

<sup>②</sup> 《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0—452页。

够把经济快点搞上去，就放手搞。他还说深圳、珠海划两块地方，就叫特区好。”<sup>①</sup>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无名指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指示，给广东增添了新的巨大力量。习仲勋和省委一班人又进一步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认真、具体的规划，加快了特区建设的步伐。<sup>②</sup>

9月28日，吴南生等到深圳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听取了市委和海关等部门的汇报，约请了港澳工委叶锋、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等进行商谈。

当时深圳经济非常困难，农民分配收入很低，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年外逃的共有六七万人，耕地丢荒9万亩。根据建设需要和发展趋势，吴南生和市委负责人大体确定了深圳经济区划。吴南生回到广州之后，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旅游业、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区、蛇口地租价格、建立沙头角试验区等12个问题。

10月31日，吴南生主持召开有深圳、珠海、汕头三市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参加的“出口特区”工作座谈会，讨论研究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随后，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

11月6日至12月18日，叶剑英下榻于广州南湖宾馆。习仲勋、李坚真等省委领导前往宾馆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叶剑英在接见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我们将要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央将给广东省特殊政策，进行改革开放。中央将在广东建立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以进行新的经济体制实验。叶剑英还与他们谈到港澳的前途问题。

1979年12月1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广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关于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的传达》，1979年10月24日，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

<sup>②</sup> 俞惠煜、谭振南：《小平对仲勋说：杀出一条血路来》，《怀念习仲勋》，第189页。



东、福建两省会议。到会的有广东的王全国、吴南生、范希贤，福建的郭超，还有中央各部、委、办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吴南生在汇报中提出，将“出口特区”改用“经济特区”的名称较好，含义更确切。他解释特区不仅办出口工业，而且还搞房地产、旅游和其它经济事业。

谷牧在讲话中强调：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对两个省经济工作的全面要求。两省不仅是搞特区，而且要利用外资，使两个省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经济活起来，比其他省更繁荣。两省不仅是对外经济活动要先行一步，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等方面都要比各省市先行一步。要充分利用外资、侨资；特区规划要有远见，要搞小城市。谷牧特别提到：

“习仲勋同志讲过，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保险发展快。现在基本上半独立了，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sup>①</sup>

谷牧所说的翻筋斗，就是要广东领导人像齐天大圣孙悟空那样将筋斗翻起来。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党政负责人马兴元、郭超等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会上，习仲勋和刘田夫向谷牧详细汇报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增长32%。与外商就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达6.56亿美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20.5亿美元，增长32%。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一批开拓者已开赴两地工作，已组织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对深圳、珠海

<sup>①</sup> 《谷牧同志听取广东、福建两省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讲话》，1979年12月17日，《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53页。

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初步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起草拟订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条块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没有这样的实践，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国门一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

会议肯定了两省省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贯彻对外开放方针、试办经济特区等工作中所取得的初步成果，研究提出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会议强调：试办出口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根据目前两省财力物力的可能，广东应首先集中力量把深圳特区办好，其次是珠海。深圳特区的建设应根据广东省所划定的范围，作好总体规划，分片、分期进行。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作好准备，逐步实施。会议明确指出：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sup>①</sup>

3月30日，在广泛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

《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1979〕50

<sup>①</sup> 《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1980年3月30日。



号文件少2亿元。另外，这次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正式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即中发〔1980〕41号文件）。中央批示首先肯定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同时客观地指出两省进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广东、福建两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因此，广东、福建两省必须加强领导，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加快经济的发展，为四化建设作出贡献。中央有关各部门，要把搞好两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强对两省工作的指导，采取积极的帮助的态度，而不能撒手不管。希望中央各有关部门和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sup>①</sup>

《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引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两省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但有利于加快两省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sup>②</sup>

6月19日，省委在广州举行省、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报告会，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继续解放思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1980年5月16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1980年5月16日。



想，肃清极左路线流毒，充分发挥广东省的优势，积极稳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把经济搞活，创造性地闯出一条加快四化建设的路子来，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此之前，5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6月12日，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了增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改革开放意识，这年初夏，习仲勋和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和副省长黄静波带领一批地委书记前往香港参观考察，成员有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书记郭荣昌、佛山地委书记杨德元等。在出发前，习仲勋曾找杨应彬谈话，交代有关参观考察事项。这些领导干部有的在建国前曾到过香港，建国后由于闭关锁国，粤港两地隔绝来往，不知道香港这二三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到香港一看，大吃一惊，只见香港高楼大厦林立，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经济发展很快，已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而市场上的农产品多是台湾、菲律宾、泰国的。据杨应彬回忆，“有两件事使大家非常震动：一件是，我们的猪是肥肉型的，在香港当食品卖不出去，只能用来炼油当工业用油；另一件是，过去我们的新会橙和美国的新奇士橙齐名，价格也差不多，可是现在一元港币只买到一个新奇士橙，而可以买十多个新会橙，我们还是挑选最好的出口的呢。……我们一直省吃俭用，拿最好的出口，但拿到国际市场一比真是不堪一击。”这些领导干部通过参观，感到国内明显落后了。“大家认为收获很大，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sup>①</sup>随后，广东还陆续派一些领导干部到香港和发达国家考察，使他们对现代化建设有了感性认识，深深感到中国只有实行改革开放，奋起直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

<sup>①</sup> 杨应彬、郑黎亚：《金华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68页。



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步伐。8月8日，习仲勋作了会议总结。王德、刘田夫、龚子荣、王宁也讲了话。

关于如何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广东省经济搞活问题，习仲勋指出：“中央批准我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了我们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有利条件。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年来，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实践，大胆革新，领导机关落后于基层，领导落后于群众。这就是说，我们仍然面临着解放思想的严重任务。……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敢大胆创新，不抓紧时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就肯定要落在先进省、市、区的后面，‘先走一步’也将成为空话。”“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我们讲的是积极试验，而不是一哄而上，这就没有危险；即使试点不成功，也可以取得经验教训，利于进一步试验。”<sup>①</sup>

## 五、创办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我国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产物。它要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必须有一套适应其发展而经国家审批的法规，以便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早在1979年8月，国务院就委托广东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79年12月27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这一条例。以后，国务院又责成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组织研究论证。1980年8月21日，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受国务院的委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就经济特区设置的相关问题作了几点说明。这几点说明，为会议审议提供了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重要依据。同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召开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条例》集中地反映了特区在经济上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发展经济的特殊办法，它一方面赋予经济特区更大的自主权，特区经济体制要“跳出现行的体制之外”；另一方面对到特区投资的外商，给予优惠的政策。主要为：一、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前提下，鼓励外商在特区投资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依法保护投资者的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二、在外商用地、进口生产设备和其他生产资料、税收、合法利润、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特殊的优惠，并简化手续，方便外商出入境；三、在注册经营、劳动管理、组织管理等方面，实行一套有别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而适应特区的性质和要求的管理体制。<sup>①</sup>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还制定了海关法、投资法、土地管理法、治安保护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规。经济特区对投资外商在经营管理、税收、土地使用、产品销售、外汇管理等方面给予优惠的待遇。并成立经济法庭、法律顾问处和经济仲裁办事处。这些都使特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进一步完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划定特区范围，制定特区发展规划，是筹办经济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广东省特区筹备组于1979年请国内100多名专家学者，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实地调查和分析比较，提出了三个特区范围面积的设想。深圳市规划确定深圳特区的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分东、中、西三大片，共18个功能区，拟综合发展工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商业和其他各项事业。<sup>②</sup>珠海经济特区面积为6.81平方公里，分东、中、西三个部分6个小功能区。其发展方向是：以工业为重点，带动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80—93页。

<sup>②</sup> 梁湘：《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前进中的深圳》，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1979年12月，习仲勋等在珠海拱北海关视察时与同行者合影。

商业、旅游、住宅，适当发展一些鲜花、高档蔬菜、畜牧业、奶牛等农业项目，逐步建成一个经济综合发展的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面积为1.6平方公里，仅是一个出口加工区的规模。

习仲勋高度重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设，经常听取三个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据珠海市委第一任书记吴健民回忆：

因为珠海市建设方针这一件事，我和习仲勋有了多次接触。我也向他重复说了自己对建市方针的个人体会。首先，习仲勋同志提醒我们注意抓紧农、渔业是正确的。因为珠海靠在海边，“靠海吃海”，而且港澳有许多流动渔民也经常停靠在珠海。如果我们对渔业放松，会导致动荡。农业也是我们基础，不是不注重农业，而是如何把这个方针摆正。我们并不是抓工业就放松农业，而是通过抓工业来促进农业发展。一次，在向习仲勋的综合工作汇报中，我以农渔村办工业，并与引进加工业结合为例，讲述了以进养出，以工促农、促渔的关系。珠海在发展小额贸易后，引进了许多工业项目，农村、渔村都办工业，农、渔民除了参加生产劳动外，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工业

劳动。这样，除了农业收入外，群众还能拿到工贴。农村的经济结构因此得到了调整，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也提高了。在我讲述的过程中，习仲勋在旁边静静地听，一直没有插话，不时会点点头。听完汇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你来珠海是对的，你们市委领导班子真的做到了认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说这是集体的体会，把工业和农业对立起来是不对的，但是现在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如果贸然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工业为主导，这样的提法也不正确。我们珠海市还是要花大力气协调处理好工业、农业、渔业三者的关系，经过一个过渡期，还要采取许多步骤，才能确定以工业为主的建设方针。说到这，仲勋同志表示同意，说：“是，我们当时在提出方针时，仅仅是从农业方面出发，表述不完整，确实是不对。”在这次的接触中，我认为他作为一把手，仔细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综合考虑多方的建议、见解，这种风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sup>①</sup>

1980年9月下旬，习仲勋带领广东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还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中央十分关心广东贯彻1979年50号文件和试办经济特区的情况，通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到中央汇报工作，住进中南海。9月24、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书记处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24日上午，广东省委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了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提出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以及外汇管理、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当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与会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

<sup>①</sup> 访问吴健民谈话记录，2004年7月24日。



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这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不赞成，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sup>①</sup>胡耀邦在会上讲了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黑虎钢锤，鼓励广东大胆实践；谷牧再次讲了广东应学孙悟空翻几个筋斗；赵紫阳提醒广东，要研究在开放的情况下如何增强我们队伍的抵抗腐蚀的能力。<sup>②</sup>

中央书记处听了习仲勋等人汇报之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这就要求省委的思想更加解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计算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组织专门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看准之后，要快刀斩乱麻，大胆

<sup>①</sup> 参见《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页。

<sup>②</sup> 参见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53页。

去干。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交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三，广东七），暂定五年不变。“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纪要》还指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必须有一批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精明强干、勇于创新的干部队伍。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增强我们的队伍抵抗腐蚀的能力。<sup>①</sup>

中央这个纪要，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广东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广东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

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与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结合进行的。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年11月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时止，一年多来，习仲勋带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大致做了六项工作：一是进行思想发动工作，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统一党内外思想，使大家不断克服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人才，增强自力更生能力，才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行列，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进一步开展了对外贸易和加工装配、补偿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和一些初步经验。三是组织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点。四是成立特区筹备处，负责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并且开始上了一些项目。五是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管理广东对外经济活动，派出驻港澳机构，筹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对外经济活动机构在逐步健全，人员在逐步充实，工作在逐步开展。六是结合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研究提出了到198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sup>①</sup>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1980年9月28日，《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汇编（1979年—1982年）》，第109—111页。



习  
仲  
勋

主  
政  
广  
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有深远意义的可喜的第一步。



## 第十一章 初步开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 一、扩大企业自主权

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起步较早，这与习仲勋大胆实践，积极探索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前，广东与全国一样，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我国在建国初期，照搬苏联那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来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建设规模不大等条件下，它较好地做到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加快建设步伐，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随着社会化生产程度的提高，这种体制的缺陷日益显露出来，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形式方面追求“一大二公”，过于整齐单一；政府经济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过分强调计划指令性；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计划与实际脱节，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等。<sup>①</sup>对落后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广东改革的重要方面。

1979年1月9日，习仲勋在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应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决心进行改革，以适应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适应加快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对企业的管理，要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扩大企业权力，运用经济手段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要贯彻按劳分配，要有奖惩制度。25日，习仲勋在会议总结讲话上又指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是要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我们全部工作

---

<sup>①</sup> 张振宇、黄学荣、杜重年著：《社会主义本质与广东所有制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99页。



的纲，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跟上，要转变，要改革，特别是上层建筑存在问题很多，例如经济管理体制如何改革，机构如何设置等。他特别强调，经济管理体制及其机构要改革。要改变目前权力过于集中和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状况。上下级之间，计委、经委等综合部门和各专业部门之间，要适当分权，行政机关要尊重企业经营管理上的自主权，同一个地方管理机构重叠和机构设置不合理的，看准了的要马上改，还未看准的，今年各有关部门都要进行试点，以便摸索经验。

1979年4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在会上发言时，围绕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着重指出，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应当根据20多年来的实践，来加以检验，并借鉴外国的经验，大胆地走一条中国式的道路。这个问题反映到我们的机构设置和规章制度上，也必须下决心改革。有的确实是官僚机构，权力过分集中，不了解下情，办事效率极低，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通盘规划，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但也不宜久拖下去，看准了的、可以先改的，就要早些动手。

1979年5月14日至6月10日，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主要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研究如何把广东的国民经济调整好，把农业搞上去，使广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同时在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保证这个任务的实现。26日，在县委书记也参加的三级会议上，习仲勋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又谈到了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习仲勋指出，广东的经济，有它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加工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基础是好的，潜力也很大。但是，我们的比例失调比全国更严重。我们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问题十分突出。我们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加上又毗邻港澳，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要好。但是，由于比例失调，特别是农业落后，加上过去的经济体制把我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我们不能发挥“优势”，困难很多。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农业应当怎样迅速改变被动

落后局面？工业应当怎么样为农业的翻身助一臂之力？怎样才能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我们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都必须认真讨论，很好解决。

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和省委的要求，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其中一项内容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这为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力支撑。

1979年8月11日至23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习仲勋、刘田夫和省委常委李建安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8月11日，习仲勋在讲话中对广东如何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作了阐述。他指出，在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7月15日发出今年第50号文件，批准广东、福建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从明年起实行新体制。中央这个决定，是对全省各级党组织、全体干部和5600万人民群众的高度信任、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我们要鼓足干劲，埋头苦干，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工作上来。各级领导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实践，带头学习，一切从实际出发，掌握经济规律，学会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改变那种单靠行政组织、行政命令的领导经济工作方式。

习仲勋强调：要“解放思想，努力把工业生产搞活，把经济工作做活。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问题。我省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要更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全省可以搞100个企业；另外，把企业基金、福利基金和奖金从工资总额中提取改为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小改试点，全省可以搞300个企业。”“把工业生产搞活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把产供销搞活。经济工作是一个整体，工交生产和商业、外贸、财政、银行、物资等各个部门息息相关，互相依存。……因此各部门、各方面要大力协作，密切配合，把生产搞活。特别是要认真解决好工商关系问题，努力搞好产销衔接，把产供销的渠道打通。一定要把生产和需要紧



密结合起来，要做到按需要生产，搞好产销见面，以销促产。要研究和试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sup>①</sup>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9月14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进一步协调工贸关系促进工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强调要加强工商、工贸协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



习仲勋在工厂调查研究。

调节结合；搞好物资供应；实行产销合同制；大力发展新产品；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加强物价管理。允许工业部门销售商业、外贸部门不收购的产品。

同年9月25日至28日，习仲勋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后，习仲勋留下来，参加中央于10月3日至10日召开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都讲了话或作了发言和插话。10月3日，习仲勋在座谈会上作了工作汇报。会上大家对体制问题议论较多。地方的领导人感到中央统得太多，太死。10月4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对体制问题发表看法，“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多一点，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11日。

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邓小平还说，“肯定以后企业的自主权、活动余地要大一点，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sup>①</sup>

习仲勋回广东后，10月24日至31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会议进一步讨论了贯彻执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问题，对改进财政体制、外汇分成和地方外汇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根据中央关于放权搞活的精神，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省委、省革委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文件。11月2日，省革委会批转省商业局《关于开展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报告》。《报告》指出：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搞好商业体制改革，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关系很大。《报告》对开展试点的指导思想、扩大企业权力、企业的义务等作了明确规定，并强调要发扬民主，搞好民主管理。11月22日，省革委会批转省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中有关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改革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措施。并就关于外汇分成和对外经济活动、关于择优录用招工和任免企业中层干部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12月11日，省革委会批转省财贸办公室《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指出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业务，是在国家计划调节为主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经济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和购销形式。12月13日，省革委会批转省供销社《关于开展扩大基层供销社自主权试点的报告》。《报告》指出，扩大基层供销社的自主权试点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生产服务，为人民服务；树立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并就计划管理权、财务管理权、物价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和基层供销社的义务作了明确的规定。

---

<sup>①</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关于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的传达》，1979年10月24日。



12月17日，习仲勋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广东省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极而有步骤地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习仲勋强调：“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坚决而又稳妥地实行改革，是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打好四个现代化第一个战役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加强领导，组织力量，搞好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有步骤地组织实施。当前应当围绕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着重搞好扩大工交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扩大商业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帮助基层单位解除束缚生产发展的绳索。同时，在全省统筹安排下，适当扩大市、县的经济权限，充分调动各级的积极性。”<sup>①</sup>

习仲勋提出要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好坏紧密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紧密联系起来。要加强企业的经济责任，使企业能够有权按照社会需要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经济办法组织企业的经济活动，切实搞好经济核算，保证完成生产计划，做到国家、企业、个人都增加收入。前一段广东省已在100个省属、市属国营工交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些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省国营工交企业利润的60%以上；另有507个县属国营工业企业(占全省县属国营工业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推行清远县企业超计划利润提成的试点。搞好这些试点，对完成全省工业生产计划和财政收入，关系重大。这两种类型的试点，都已在不多的时间里，取得了明显效果，产量、利润和劳动生产率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成本、物耗下降。实践表明，保证企业有必

<sup>①</sup> 习仲勋：《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要的自主权，有利于改进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改善职工集体福利；有利于改变产供销脱节，产品不对路状况。已经铺开的这些试点，要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和省主管部门核定的利润留成比例等部署要求，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并认真总结经验，做好巩固提高工作。同时，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进行的商业、供销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国营农场逐步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村人民公社逐步实现(农)林工商综合经营等农业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都要积极稳妥地进行。扩大工农商企业自主权，这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把整个国民经济搞活的基础，是充分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性的重大决策，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闯出一条路子来。上述经过批准进行的各种类型试点，都必将突破一些现行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只要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不改变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利于发展生产，提高质量，保证完成国家计划和财政收入，就应当大力支持，并不断总结、提高。

习仲勋强调要改变单纯行政管理的办法，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力求经济活动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按照产销结合、工贸结合、内外贸结合的原则，试办若干专业公司，把生产和内外销业务统一管起来。专业化经济组织有处理一定范围内产供销、人财物的权力，有执行国家政策法令的义务。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是检查对党和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协调各方。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对违反国家政策法令的经济组织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不要代替企业包揽经济业务。

习仲勋指出，要把加强全省对外经济活动同对内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结合起来，适当扩大市、县的经济权限，使市、县能够在全省统一计划允许的范围内，因地制宜地安排当地计划、基建、外贸等工作，及时解决发展农业、轻工业、对外贸易方面的问题，主动办好旅游事业和保证侨汇物资供应等。财政体制，明年对市、县将普遍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结余留用、两年不变”的办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增收分成比例；对海南区和广州市根据具体情况，另作适当规定。外贸体制的改革，在全省统一计划和统



一外贸方针政策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市、县和省属单位以及有关企业经营外贸的权限，改革现行出口商品供货体制和进出口贸易管理制度，实行出口商品的分级管理和用汇与收汇挂钩的原则，执行外贸计划考核制度，对创汇单位采取增收分成的办法，充分调动各级的积极性，合理调整外贸机构，适当增加口岸和起运点的设置。其他如计划、基建、物资、商业等体制，也都要由主管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改革方案，逐步实施。

习仲勋说：“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场革命，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勇于探索和实践，从实际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要满腔热情地加以扶持，不要以偏概全，诸多责难。同时，在改革中要强调经过试点，并要严格请示报告制度。”<sup>①</sup>

习仲勋提出的这一系列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经省人大代表讨论通过，有效地推动了全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这次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习仲勋被选举为广东省省长，杨尚昆、刘田夫等12人被选举为副省长。

1980年7月29日至8月8日，省委在广州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充分运用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发挥优势，扬长避短，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习仲勋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各地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调查分析清楚各地的特点，历史和现状，长处和短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因地制宜发挥优势。

以后，在一些会议上，习仲勋都讲到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要求广东放大胆子，放开脚步，加快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

在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全省展开，除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外，广东还在企业管理、价

---

<sup>①</sup> 习仲勋：《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格、计划、商品流通等方面进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 二、价格与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

价格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流通的关键。建国后，我国照搬原苏联那一套模式，长期实行产品经济，价格上统得过死，管得过死，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由国家统一定价。这样的价格管理体制，使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脱离市场，价格与价值背离，特别是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很不合理。它使价值规律失去了杠杆的作用，严重影响了工人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到广东不久，曾深入市场进行调查研究，对广东副食品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深有体会。当时，广东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市场商品奇缺，向城镇居民发40多种限量供应的票证。据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朱森林回忆：“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它价格的改革。”<sup>①</sup>习仲勋深深感到，这种价格管理体制，非改革不可。习仲勋和省委经过研究，决定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以价格改革和搞活城乡流通为突破口。

为尽快改变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以习仲勋为主要领导的省委、省革委会从1978年秋开始，根据商品经济的特点，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按照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逐步把价格放开。省委、省革委会主要是通过放宽计划外产品的价格管理，扩大实行浮动价的范围和幅度，实行计划价、

---

<sup>①</sup> 陈俊凤等：《广东改革开放若干问题的回顾——朱森林同志访谈录》，2004年6月10—11日，《广州党史》杂志，2006年第1期，第9页。



浮动价、自由价、质量差价、地方差价、季节差价相结合的价格政策，刺激生产，以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同时，在产品流通经营方面，实行国家、集体、联合体、私人多家经营，让农民参与流通，以便建立一支庞大的流通队伍，为不断增加的各类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

广东率先在全国进行农副产品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首先是有步骤、分品种放开农产品价格，通过价格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刺激生产，以满足市场需要。

1978年8月，广州对蔬菜流通体制率先进行改革，实行部分大宗品种幅度议价成交，小品种自由议价的购销形式。为改变“鱼米之乡食无鱼”的状况，广东改革水产品流通管理体制，运用价值规律，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对国家收购计划外的水产品实行产销见面，随行就市，议价成交，以搞活流通促进生产，吸引鱼货进城。1978年12月25日，广州市率先在全国同行中办起第一间行栏货栈——广州市河鲜货栈。这一大胆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由政府统一制定农副产品价格的局面，迈开了农副产品放开价格的第一步。

从1978年底开始，广东大胆地将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由国营商业、供销社独家经营和低价收购的体制，改变为除任务内粮食实行合同定购，由粮食部门经营外，任务外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价格和购销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

1979年，广东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等24种农副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同时恢复了部分产品的议购议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放开了部分小商品的价格。11月1日，根据中央的决定，为平衡财政收支和搞活流通，又提高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并同时职工实行副食品价格补贴。12月11日，省革委会批转省财贸办公室《关于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指出开展农副产品议价购销业务，是在国家计划调节为主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经济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和购销形式。同意对部分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以搞活市场。

1980年，省政府对农副产品统派购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1月10日，省政府颁布《关于农副产品采购若干问题的决定》，重新划定农副产品分类管理范围，把原来实行统派购的118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减少为47种，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可自行处理，三类产品生产单位和个人有权自行处理。9月30日，省政府印发《关工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几项措施》，将现行的47种一、二类农副产品又调整为25种。10月18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农副产品议购议销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农副产品在政策及经营管理上作出若干明确的规定。

广东在全国首先进行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运用价值杠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解决了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农民增加了收入，而消费者也普遍得到实惠，他们的菜篮子大大丰富起来了。

广东对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是从1979年起，把过去单一的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在国家规定中准价的基础上实行上下浮动价，以及工商企业协商定价三种形式，逐步放开小百货、小文具、小五金等小商品价格。对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主要是从过去单一计划调拨价转变为调拨价、浮动价和议价三种价格形式。如从1979年开始，先后提高了煤炭、钢材、焦炭、水泥等生产资料价格。还提高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和计划外超产自销产品的价格等。此外，还对交通运输、水电、医疗、学费等收费标准，也作了适当调整。

习仲勋领导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以放为主，放调结合”的方针，在逐步放开物价的同时，强调要加强管理，不重蹈“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历史覆辙。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广东调查，认为广东已走出一条价格改革的新路子。

在流通体制方面，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的其他领导人经过调查研究，感到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购销渠道单一，由国营商业部门垄断控制，农业生产长期处于无利可图的状态，许多农副产品存在着有价无市的状况。这种高度集权的农产品购销体制，大大挫



伤农民的积极性。习仲勋等人认为原有的体制不改不行，因此，率先对农产品的流通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

1979年，为搞活商品流通，广东省按照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和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三多一少”原则，冲破了过去按行政命令层层调拨的封闭式、多层次的商业批发体系，取消不准长途贩运、不准私人经营农副产品批发的禁令，打开城门，实行国营、集体、个体商业一齐上，多渠道搞活商品流通的政策，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允许竞争，保护竞争。大搞各种形式的农贸市场，对个体商业采取优惠政策等。

同年12月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习仲勋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允许社队在完成国家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和计划收购任务后，自行加工销售和举办饮食等服务行业。加速发展农村社队企业，逐步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要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发展社队企业的有关规定，逐步把一些适合社队经营的工业，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农具修理工业交给社队办。”<sup>①</sup>这个决定改变了过去不但不准社员参与甚至是社队集体也不能参与流通经营的状况。这实际上突破了社队集体只能自产产品加工、销售的框框，社队和农民开始进入流通领域，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1980年7月29日，在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谈到，要进一步利用中央给广东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加快改革购销体制，搞活流通渠道。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经济工作只注重生产，忽视流通。流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只有一条流通渠道，关卡林立，划地为牢，搞得很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三中全会以来，试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计划指导下，开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流通渠道多起来了，生意开始做活了一些。但是，流通领域活得还不够，改革还只是开始。在经营

<sup>①</sup> 习仲勋：《政府工作报告》，1979年12月17日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项目和范围上，生产资料的计划分配和生活资料的统购包销还过多、过死。省准备把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项目和范围缩小，放宽三类商品的范围，增加议购议销的商品，一、二类商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允许自行处理。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存在。要允许竞争，保护竞争。集体商业、服务行业还可以有计划地扩大；个体商业、服务业，包括夫妻店，还可以有计划地多搞一些。要允许农村社队有领导地进城设点推销自己生产的产品。”<sup>①</sup>

在习仲勋讲话后不久，同年9月，省政府就批准了省财贸办公室制订的《关于疏通商品流通渠道，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市场的十二项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流通体制的改革。一是进一步缩小农副产品定购、派购和计划收购范围，扩大三类产品范围；二是调整日用工业品购销政策；三是积极开展农工商联合经营；四是积极办好集体商业和服务业；五是发挥个体小商贩的补充作用；六是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七是坚决精简流通环节；八是积极开展省内外协作，逐步与协作省、区建立固定的供销关系；九是积极开展议购议销、办好信托贸易和货栈；十是进一步办好大中城市、县城农副产品市场；十一是积极解决城市和工矿区商业、服务业和储蓄网点不足的严重问题；十二是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这12项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流通体制的改革。

10月，省政府又制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搞活流通的具体政策和办法，主要有：第一，打破三级批发和按行政区域纵向调拨产品的旧体制，与专业公司合并；允许批发和零售企业批零兼营；允许生产企业自购自销、代购代销，以减少流通环节。第二，坚持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扩大商品流通渠道。第三，打破内外封锁、城乡分割、划地为牢的局面，实行城乡通开、内外通开、敞开城门，放手让各地的商户进城经商。第四，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步放开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省政府在短短的9个月时间内，将117种统派购的农副产品降为25种，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在全国尚无先例，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略。市场刚刚放开的时候，确实是要经历一个波动的过程。例如1979年水产品市场放开后，草鱼每市斤从0.8元骤升到3.8元，市民意见很大。1980年只好恢复供应，每人每月定量0.28元。这样一来，市场又变成有价无鱼的状态，市民说还是放开市场的好。接着水产品市场继续放开，不到一年，价格也逐步下降了。从此，价格受市场规律的调节，逐步稳定。以前水产品收购价过低，派购任务重，许多生产队入不敷出。改革统派购体制后，国家调减派购任务，提高收购价格，减轻生产队的负担，提高了生产队的积极性，鱼塘亩产量年年增加，解决了长期以来全省大中城市吃鱼难的问题。省委、省政府经历住了改革初期的“阵痛”，才没有导致改革半途而废。不仅是水产品市场，粮食、油料、蔬菜、干鲜果等市场都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市民从中切切实实获得了利益，以事实证明了开放市场的正确性。

此外，农产品的购销经营体制得到改革后，农村社队集体和社员进入流通领域的越来越多，把长期以来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独家经营，逐步改变为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体的多成分多渠道的经营。农民不但种田，办工业，还办商业，搞运输，出现了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新格局。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农村集市贸易也发展很快。1978年全省城乡集市1936个（全部是农村，城市还没有），集市贸易成交额达16.04亿元，成交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7.83%。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是搞活流通的一支生力军，在开拓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城乡都出现购销两旺的景象，物资供应充足，农民的收入也逐渐增加。

### 三、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推广“清远经验”

习仲勋和省委、省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冲破困境，探索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的路子。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市场的主体。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尽管适应了一定阶段经济发展的需求，但也存在着许多弊端。由于企业生产上实行统一计划，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在商业上统购包销，外贸上实行统进统出，对劳动力实行统包统配。在这种体制下，企业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人们思想上的僵化，妨碍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为此，习仲勋积极寻找突破口，以便搞活经济。

清远县委、县革委会为了扭转工业被动的局面，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思想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从1978年第4季度起，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这一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见效很快，生产大幅度增长，利润成倍增加。翌年4月，该县进一步改革工业管理体制，撤销局一级工业机构，充实各专业公司，县经委对人、财、物、产、供、销实行统一管理，并相应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限。县经委统一对县财政实行上缴利润承包，企业则对经委承包，开创国营企业承包之先河。1979年，全县工业产值增长12.2%，利润增长2.5倍，上交利润增长1.8倍，是全省产值利润增长最高的一个县。这一年实现的利润总额，上交财政占61.7%，企业分成占20%，职工奖金占18.3%，符合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和国家得大头的原则。

省经委主任王焕认为清远经验值得推广，亲自带领一班人马下去调查，帮助清远总结经验。他还专门向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人作汇报，得到支持。习仲勋等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此，对这一经验加以肯定。

但是，大家对清远搞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看法并不一致。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8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以及极左指导思想的影响，发放奖金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奖金挂帅”，遭到大批特批，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全国都取



消了奖金。因此，当习仲勋等人肯定和推广清远经验的时候，在全省各地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五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试点的通知》，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在少数国营工业、交通企业组织试点。中央对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规定，为广东省推广清远经验提供了政策依据。习仲勋于是把搞活企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带领省委、省革委会从扩大企业经营权起步，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文件，下放给企业数十项权力，赋予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有较多的自主权。

同年8月11日至23日，省委、省革委会在广州越秀宾馆召开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会上，与会者围绕肯定还是否定“清远经验”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由于清远经验触动了沿用多年的计划、财政、商业、外贸、物资供应等体制，因此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习仲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清远经验”。他指出，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大大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习仲勋还特别强调，把企业搞活，要突出解决好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广东从明年开始实行新的体制，我们更要积极地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步子要快一些，做到阔步前进。我们就是要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克服盈利亏本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吃大锅饭”现象，加快生产发展，提高经济效益。<sup>①</sup>刘田夫在讲话中也强调要解放思想，大胆改革经济体制，积极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把企业搞活。

这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之后，与会者统一了认识。会议肯定了清远经验，决定在全省工业交通企业中，选择100家企业作为第一批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选择300家企业试行利润留成，并要求

<sup>①</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8月11日。





习仲勋在工厂了解生产情况。

各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会后，习仲勋带着省委办公厅和省工交、财政部门的负责人到了清远县，调查该县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经验。据陪同前往调查的张汉青回忆：

当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耐心作了分析，认为清远的经验给人很多的启发，那就是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精简了机构，促进了生产，企业也搞活了，上交财政也没有减少，兼顾了国家、集体、职工三者的利益，应当允许继续试验。中央给了我们权，我们给县也要分权。不要以为上面的什么文件，就神圣不可侵犯，不敢越雷池半步。他还说，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有生命力，就是框框少。<sup>①</sup>

不久，在省委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又以清远为例，主张要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他说：“清远县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就是他们不是坐等上级给他一个现成的

<sup>①</sup> 张汉青：《习仲勋在广东改革开放中》，《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58—559页。



好办法，而是勇于实践，去试验，去闯，上面有些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们也冷静分析，继续认真搞试点。我认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可惜这种精神现在太少。”<sup>①</sup>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按照清远经验，先在广州、佛山等地选择广州绢麻纺织厂等10家企业，后又选择100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的内容主要是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企业财权，改变过去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允许经营有盈利的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允许企业对留成建立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改变过去“统收统支、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状况，使企业的经营效果与企业、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挂钩；在增加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对企业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为了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有关新产品的费用可以规定一定的比例，从企业实现的利润中留用。此外，还允许试点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条件制定补充计划，产品可以自行销售，并给予来料加工、产品出口、外汇分成、劳动力管理、机构设置、任免中层干部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企业扩大自主权后，内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是企业由被动变为主动，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二是企业开始有了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职工集体福利的经济条件；三是企业广大职工能更好地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些企业都取得了明显效果。在此基础上，省革委会扩大试点范围，确定在全省168家国营工交企业和韶关市、江门市等商业系统以及广州市百货行业试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产品销售权及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分配权。

1980年1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召开干部大会。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处以上干部和正在广州参加全省计划、财政、工交、进出口、组织工作等会议的同志，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省委书记、副省长王全国，分别主持了上午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79年9月21日。

和下午的大会。习仲勋在大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并讲了话，刘田夫为计划、工交、进出口会议作了总结。习仲勋在讲话中首先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报告，对于我们在80年代如何开步走，我们的奋斗目标，努力方向，指导思想，重大措施，工作方法，等等，都作了深刻的、明确的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并坚决贯彻执行。这次会议强调要认真搞好工业调整，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正确的要坚持，不完善的要改进。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和推广清远经验的企业奖金提取的办法可以不变。<sup>①</sup>

习仲勋、刘田夫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反复做下面干部职工的工作，大力推广清远经验。到1980年3月为止，全省有46个县（市）已在全部企业中推广，有50个县（市）在部分企业推广。在全省2010户地方国营企业中，已经有将近1000户企业推广了清远经验，都取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然而，由于长期受旧框框的束缚，有些人的思想仍处于僵化和半僵化状态，所以，直至1980年6月10日至21日，在省政府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对推广清远经验仍然争论不休，反映十分强烈。有些部门的领导还墨守陈规，怀疑这个经验，不积极支持，提出这不能改，那不能办。

会议期间，习仲勋和刘田夫一起，用了两天半时间，同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座谈，详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次会议，与会者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开得很活跃。6月21日，会议举行闭幕式。省委第二书记、副省长杨尚昆主持大会，刘田夫作会议总结，习仲勋讲了话。习仲勋在谈了全省大好形势之后，强调指出，当前，一定要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经济搞活。经过一年来的摸索，广东省在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经济工作还搞得不够活，其基本原因还是思

<sup>①</sup> 参见《南方日报》，1980年2月1日。



想不够解放。关于推广清远经验问题，他指出：“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论。这次会议上反映还很强烈。去年8月省工交会议肯定了清远的经验，并提出省的其他县办工业也可以结合实际进行推广。到今年3月份止，全省将近1000个企业推行了清远经验，都取得了增产增收的良好效果。实践证明，清远经验的方向是对的，把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使企业和职工从企业经营成果上来关心生产，注意节约，因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省委肯定了清远经验，没有怀疑、动摇过。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容易。不要老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家里也香。……我在这里重申，要认真推广清远经验，并帮助他们总结提高，规定出几条来，使之日益完善。”“各地的经验，只要能增产增收，真正做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个人多得，就可以推广。用群众的话说，叫‘国家发大财，企业发中财，职工发小财’。”<sup>①</sup>

省委、省政府认为，清远经验对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管理，挖掘潜力，促进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上层建筑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的精神，决定从7月1日起，再在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和省直属企业中选择广州自行车工业公司、佛山陶瓷工业公司、凡口铅锌矿等79个企业作为第二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省委、省政府要求这些试点企业一定要为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闯出一条路子来。

7月5日，习仲勋再次前往清远，住了3天，深入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研究。陪同前往的有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应彬，以及中共韶关地委、省经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轻工业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他们先后同清远县委、县经委、县财政局以及县农机、化肥、水泥等7家工厂的领导干部进行座谈，并探望职工，观看了生产过程，还和工人、技术人员进行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总结清远经验。他在深入工厂企业调查过程中，看到了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以后，各个工厂企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高兴，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6月21日。

热情赞扬了清远的同志勇于实践，大胆创新的精神。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他对大家说，这次到清远来，使他对“清远经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证明省委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这个决心下得是对的，回头看，这个决心不是下早了，而是下迟了。假如早下半年，工业的形势就会更好。<sup>①</sup>他强调指出，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今后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使这一经验不断完善提高，各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支持这个新生事物，以促进本身的工作。

陪同习仲勋前往清远调查的杨应彬，耳闻目睹习仲勋大力支持企业改革，感动之余，在座谈会上赋诗一首：

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  
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sup>②</sup>

7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第5期领导干部轮训班举行结业大会。刚从粤北检查工作回来的习仲勋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除分析了广东省的形势外，还着重谈了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推广清远经验的问题。他说，工作重点转移，经济要搞活，必然遇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中央批准给予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权力，是希望广东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加快四化步伐，同时在体制改革方面先走一步。广东省的“清远经验”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也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经济体制方面旧框框的冲击。它方向正确，方法对头，是广东省土生土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一种形式。清远的经验，在省内省外都引起了重视。从全省来看，凡是推广清远经验的企业，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道路并不平坦。一些同志对清远经验这个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到韶关检查工作时沿途讲话要点》，1980年7月19日。韶地字〔1980〕52号。

<sup>②</sup> 杨应彬：《习仲勋在广东二三事》，《习仲勋革命生涯》，第565页。



足，在领导推广清远经验的工作中不够坚决有力，致使这个好经验未能在全省范围内普遍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习仲勋强调，清远经验涉及到许多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各级党委和各部门，都要为推广和发展清远经验创造条件，主动研究涉及各部门的问题，改进自己的工作。清远经验是个新生事物，既有强大的生命力，又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局限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各地对于清远的某些具体做法，不要生搬硬套，照抄照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找出妥善的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sup>①</sup>由于参加这期轮训班的都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因此，习仲勋的讲话，对推动全省推广清远经验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7月29日，省委、省政府正式发文批转清远县委《清远县国营工业企业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和改革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报告》。指出清远经验“是一种大胆的、可贵的尝试”，“实质上是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它冲击着束缚工业发展的许多旧框框”，决定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清远经验，要求各地学习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学习他们在改革工业经营管理中的认真细致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创造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进一步搞活的经验。这个文件实际上是对原来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大胆尝试，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清远经验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它对冲破旧框框的桎梏，以及对国营工交企业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起到了良好的带头作用。《人民日报》在8月1日、《南方日报》在8月2日，详细报道了清远率先试行企业承包制的经验，在全国、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全国各地工业部门和经济理论界对此深为关注，省内外来参观考察的将近两万人次。就连世界银行组织和美国的专家也前往该县考察。

这年8月8日，在省委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习仲勋作总结讲话。他说，“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现在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勇于实践，积极地通过实践、通过试验，去探索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经济

<sup>①</sup> 参见《南方日报》，1980年7月27日。

管理体制的路子，使我们的经济真正活起来，加快前进的步伐。……省委批转清远改革企业管理制度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提倡清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以及他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同志，要大力支持下面的创新精神，要尊重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经验，凡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改革，就要积极支持，对下面的好经验要及时帮助总结、推广。”<sup>①</sup>

据1981年底统计，全省100个县和县级市，有63个县市仿效清远办法，改革了工业管理体制，48个县市经委对财政实行包干，22个县市经委在银行独立开户。全国有363个县和17个小城市学习清远体制改革的经验，广西决定在全区各县推广清远经验。

清远经验不仅受到全国各地的关注，而且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国家经委对这个经验加以肯定。1982年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广东省清远县试行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了很好效果。看来，实行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精简机构，减少层次，提高效率，而且对促进城乡结合，条块结合，推动企业组织机构和生产布局的合理化，都大有好处……”<sup>②</sup>

清远经验是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迈出的第一步，对广东乃至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曾起过积极和促进的作用。习仲勋等人为推广清远经验，深入调查，反复探讨，亲力亲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那种大胆探索、勇于改革的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今天回顾历史，“清远经验”虽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依然是计划经济模式范围内的改革。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它的某些弊端和缺陷逐渐显露出来，需要作更深层次的改革，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sup>②</sup> 参见《人民日报》，1982年12月13日。



## 四、计划和对外贸易管理体制的改革

### （一）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使得广东在计划、价格、流通、对外贸易等体制方面存在许多弊端。如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是单纯依靠行政组织、运用行政手段，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给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的生产计划由主管部门批准，资金和物资由国家调拨，产品由商业部门统购包销，价格由政府物价部门核定，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成了政府的附属物，致使企业在产、供、销，人、财、物等方面没有经营管理自主权。产权不清、政企不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价格体制方面，由于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脱离市场需求，价格与价值背离，严重违背了价值规律，工农产品在价格上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市场流通渠道单一，国营商业、供销社等独家垄断经营，造成价格统得很死，这些严重影响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束缚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等等。对计划、价格、流通、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改革，成为广东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方面。

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根据广东的实际和中央赋予的权力，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大胆进行改革，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按照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相应进行改革。一是在工业部门逐步扩大指导性计划。工业生产计划实行以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相结合，以指导性计划为主的办法。为了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和对内外开放的需要，省下达的工业产品计划，除少数生产建设、人民生活必需的重要产品按指令性计划管理外，其余大多数产品逐步实行指



导性计划管理。二是在农业方面，从1980年开始，对农业生产全部实行指导性计划，取消指令性计划。主要商品收购和分配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如农副产品统、派购只保留十几种，其余全部改为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农业计划的改革，改变了传统的“以粮唯一”的格局，促进了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上升，农村产业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三是在物资管理方面，也实行了指导性计划为主的管理体制，改变了过去单纯由政府部门分配物资的独家经营的办法。

## （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与发展旅游业

1979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对外贸易包干体制，扩大地方对外贸易的权限，允许广东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方面先走一步之后，习仲勋等人便不顾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反对，决心打破独家经营的局面，在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方面进行改革，调动各地区、各部门搞外贸的积极性，适当扩大各地、市、县经营外贸的权限。主要是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方面大胆放权。广东外贸体制初步改革之后，由于经验不足，组织领导和管理水平跟不上，在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外贸易活动中有点乱。因此，1980年8月，习仲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分散经营和统一对外的问题。他说：要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各地、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既要统一，又要照顾各方。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对外经济活动要在政策、法令和计划指导上统一对外，要在价格、客户、市场等问题上协同行动。我们要守纪律，不能搞分散主义，搞无政府主义，让资本家钻我们的空子。但是统一对外，不是统一经营，一家独办，不去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要在“活”的基础上统一，而不能统死。要进一步贯彻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和继续推进外贸体制改革。要从商品经营分工上给地方一定的经营权限，要从外汇分成上给地方、企业合理的实际利益，要根据需要适当增设进出口岸和起运点。<sup>①</sup>

<sup>①</sup> 参见《习仲勋同志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80年8月8日。



习仲勋号召在对外活动中搞联合经营，经营的项目有的以地方为主，外贸部门参加；有的以外贸部门为主，投资和扶植地方、企业。在工贸、农贸关系上，要认真做到“四联合、两公开”（联合办公，联合安排生产，联合对外洽谈，联合派小组出国考察；外贸出口商品对工业部门公开，工业生产成本对外贸部门公开），密切双方关系，共同对外。

在这次会议上，省政府提出了《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大家对这个方案意见比较多。习仲勋决定再作些调查研究，搞出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这个方案后来经过修改，正式下达。“广东改革外贸体制后，取得显著效果，外贸出口3年翻了番。”<sup>①</sup>

习仲勋十分重视广东旅游事业的发展。1979年2月，习仲勋到肇庆检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就对肇庆地区的旅游资源十分关注。他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门讲到肇庆的旅游业问题。他指出，肇庆旅游的条件是很好的，可以大搞，增加收入。你们肇庆多好，七星岩多好，把那些岩洞、山山水水搞好，请他们来旅游。将来七星岩搞一个旅游公司，好好搞起来，要搞得更好些，更美一些，让港澳同胞、华侨、外国人来，我们可以赚钱，搞好了了一年可收入几千万元，以旅游业赚的钱用来搞旅游区的建设。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旅游事业要大发展。除继续加强开放点的建设外，还要新辟一批名胜古迹和风景区，实行以旅游养旅游的办法，边开放边建设。要教育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发展旅游事业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自己的光荣责任，充分挖掘潜力，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使旅游者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改革开放前，广东旅游事业十分落后，宾馆档次低，管理水平差。宾馆远远满足不了海外游客的需求。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等很关心广东旅游事业的发展，广州的三大宾馆——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都是经过他们做工作，引进外资兴建的。1979年初，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出于对广东家乡的热爱，想无偿捐资在

<sup>①</sup> 《刘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6页。

沙面兴建宾馆。为了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习仲勋和刘田夫不赞成这样做，认为采取合资兴建的形式，将会更好地起到带头作用。霍英东先生也赞成这意见，经刘田夫和杨尚昆多次主持开会研究，于1980年6月20日在广州签订建造合同，由广州珠江外资建设公司承担建造。1983年2月6日，作为中国首家中外合作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还为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的兴建，倾注了很多心血。广东积极引进外资兴建宾馆，使广东旅游宾馆不仅走在全国前列，而且还赶上世界先进水平。1987年，全世界有五星级酒店共69座，中国占有4座，这就是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东方宾馆。这些宾馆对提高我国宾馆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sup>①</sup>

在以习仲勋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广东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开展，改革涉及面也越来越广，除上述几个方面的改革外，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许多经验后来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sup>①</sup> 梁威林：《回首当年忆田夫》，参见《回忆刘田夫》，香港荣誉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3—24页。



## 第十二章 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 一、访问澳大利亚

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正值广东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习仲勋带领广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禁锢，迈步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这时的广东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希望了解广东。习仲勋在这个时期对毗邻广东的香港、澳门进行了访问，密切了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使广东能够更好地运用改革开放的地缘优势，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习仲勋甚至把这种“友好、和平、开放、发展”的信息带到了大洋的彼岸，带到了“地球另一端”的澳大利亚。让世界了解了广东，也促使广东的经济走出国门，扩大对外经济贸易。

1979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经澳大利亚华侨首领雷奕祥先生的穿针引线，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习仲勋为团长、副主任曾定石为副团长的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对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进行了友好访问。

广东省友好代表团是广东省第一个访问新州的政府代表团。1979年6月，新州财政部长伦肖和夫人作为新州总理兰恩的代表访问中国，在广州和习仲勋见了面。他代表兰恩邀请习仲勋率代表团访问新州。新州总理兰恩是澳大利亚工党首领，工党成员多在新州。兰恩当州总理已达10年之久，在新州很有威望。1979年10月，为准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新州，兰恩又派了新州外贸部顾问艾米先生等5人来到广东省进行了参观访问。在澳大利亚朋友的盛情邀请下，1979年11月22日，习仲勋率领广东省友好代表团，抱着增进了解，加强友谊，发展合作，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搞好广东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目的，前往澳大利亚访问。

1979年11月22日，广东友好代表团一行从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当代表团抵港时，香港礼宾司顾礼代表署理总督姬达前往火车站迎接，并邀请习仲勋及曾定石等6人于当天下午5时到总督府共进茶点。茶会上双方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谈。姬达还邀请习仲勋在12月上旬从澳大利亚经港返穗时，在港参观一些习仲勋认为有兴趣的工程和项目，看看新界地区的发展。习仲勋对此表示感谢，并希望港方通过新华社先作具体安排。茶会历时45分钟，气氛友好。随后姬达亲自陪同习仲勋乘坐港督座车前往机场。当晚6时半，习仲勋等人乘坐澳航班机飞往悉尼，对新南威尔士州进行正式访问。<sup>①</sup>

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代表团抵达澳大利亚的新州首府悉尼。兰恩总理、伦肖部长早已等候在机场迎接代表团的到来。一下飞机，兰恩和伦肖就迎上来与习仲勋等人握手，互致问候。在随后十几日的参观访问过程中，习仲勋率领代表团访问了悉尼、纽卡斯尔等海滨城市和新州北部、中西部、南部的一些城市和农村，还访问了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和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行程几千里。代表团访问了政府机关、工厂、港口、码头、医院、学校、市场和科学研究机关，广泛接触了各阶层人士。

这次澳洲之行，习仲勋与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进行了多次会面和会谈，双方真正做到了增进了解、互通情况。在代表团抵达悉尼的当天，习仲勋一行就来到新州总督府拜访总督卡特勒爵士。卡特勒同习仲勋在总督府的花园里进行了热情友好的谈话，共祝广东省和新州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日益发展。11月26日晚，新州总理兰恩为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两百多名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出席了这次宴会。兰恩高度评价了这次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对新州的访问，认为这是“在中澳两国进一步发展其密切和日益富于成果的关系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赞颂了中澳两国的友谊，希望广东与澳大利亚人民能够世代友好，共同发展。习仲勋指出：“我们两省州的友谊不是在今天开始的，在很久以前，中

<sup>①</sup> 港澳工委：《习仲勋同志一行经港情况简报》，1979年11月23日。



澳两国人民就早有往来，许多广东人民移居到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其他地区，同澳大利亚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代表团这次对贵州的访问，对于增进中澳两国人民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和发展两省州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sup>①</sup>当代表团到达堪培拉时，澳大利亚联邦总督考恩和副总理安东尼，分别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考恩深情回忆了在他还未担任联邦总督之前，曾和夫人一起访问过中国，他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广州。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他只在机场里逗留了一会就飞往上海了。习仲勋当即表示希望考恩总督有机会再去中国访问，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在广州接待您。”<sup>②</sup>这几次接见都说明了澳大利亚政府对发展中澳两国的友好关系十分重视。

12月4日和5日，习仲勋和兰恩举行了两次友好会谈，并共同签



1979年11月22日至12月6日，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时，向澳大利亚总督考恩赠送礼品。

<sup>①</sup> 张汉青：《飞越重洋叙友谊——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之一》，《张汉青文集》（上），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sup>②</sup> 张汉青：《飞越重洋叙友谊——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之一》，《张汉青文集》（上），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页。

署了关于广东省和新南威尔士州结成友好省州和发展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习仲勋感谢兰恩邀请他到新州访问，他说：“我们此行处处受到州政府、各地官员和人民热情诚挚的接待，看到和学到许多东西。”兰恩说：“您看到到处充满友好气氛，这我不惊奇，因为澳大利亚和新州人民同中国人民有深厚友谊。”习仲勋笑着回答：“我们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他邀请兰恩于明年4月率新州代表团访问广东。兰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说：“我们可以向你们学习很多东西。”习仲勋说：“我们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他还向新州政府赠送了象征广州城的五羊陶瓷雕塑。兰恩高兴地说：“我觉得很光荣，在州长办公室里有这么来自广州城的珍贵礼物；这不仅是我很高兴，将来的州长也可以天天看到它。”<sup>①</sup>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尤其是高度发展的畜牧业在国际享有盛誉。当时澳大利亚的羊毛产量占全世界三分之一，新南威尔士州则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除了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办法也是新州经济发达的重要因素。代表团参观访问了牧业、谷物、水果、农机等研究中心，接触到许多先进技术。经过商谈，双方还在协助广东建立实验牧场（包括附属的加工设施）和开展热带水果合作交流方面达成协议。在新州参观访问过程中，代表团深深感到新州在经济问题上处处讲求经济效益，讲工作效率，讲竞争能力，还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哪个国家的某种技术、设备先进，采用后又最能赚钱，他们就引进。这些都给了习仲勋及代表团成员很多启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代表团在访问过程中，处处都感受到澳大利亚人民的友好和热情。参观途中，沿途见到的澳大利亚朋友都主动向代表团招手致意。有一次一个澳大利亚妇女见到代表团，赶紧从汽车旁走来和习仲勋握手，还要求和他合影留念，习仲勋愉快地接受了。她非常高兴能见到中国朋友，临走时一再和习仲勋握手告别。在特然吉农业和畜牧研究

---

<sup>①</sup> 张汉青：《飞越重洋叙友谊——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之一》，《张汉青文集》（上），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中心参观时，研究所所长萨维尔博士，专门为代表团的每个人准备了一套中文的文字介绍资料，并在封面上注明了每人的名字。这份细心和热情让代表们十分感动。“在参观中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代表团副团长曾定石回忆说：

澳大利亚人民很热情，当地的风俗是牧区来了客人后，各家会自己带上牛肉，凑在一起烤肉吃。所以在参观完特然吉研究中心的牧场、种牛和羊群后，所长萨维尔博士在研究所的院子里为我们举行了别有风味的野餐。我们在大树下，摆了餐桌和椅子，就在炉子上烤小牛肉吃。这次野餐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吃牛肉时有很多苍蝇在周围飞，我们中国来的同志都忙着赶苍蝇，可澳大利亚的朋友们都不动，反而笑着说：“没关系，这里的苍蝇吃下去也没有细菌的。”我们听了都忍不住笑起来，但心里还是很震动，这里的生态环境真的这么好？澳大利亚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关系方面的经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sup>①</sup>

习仲勋率领代表团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还与当地华侨华人亲密接触。据当时数据统计，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侨和华人约25万，大多数原籍广东。为了准备欢迎代表团的到来，当地华侨华人专门组织了筹备会，从代表团到达前半个月就开始筹备。代表团参观了悉尼唐人街的侨青社、澳华公会和悉尼中文学校。代表团首先来到了悉尼的雪梨中文学校，在那里学习的华侨和华裔儿童看到祖国的亲人十分高兴，他们向习仲勋送了花篮，并请他题词留念，习仲勋挥笔写下“祝中澳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青”。接着，代表团来到悉尼的唐人街——德臣街。这里的街道和建筑有着浓郁的中国气氛，同广东许多城市十分相像。习仲勋一行来到了有几十年历史的侨青社，又到了澳华公会会址，看了许多陈列的图片、国画和有关的资料、会刊。当地的华人

<sup>①</sup> 访问曾定石谈话记录，2004年7月9日。



中有不少已经成为有名的医生、教授、工程师、科学家，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祖国的解放和强大让他们更感自豪。中午，华人和华侨代表在唐人街举行了50多人参加的欢迎午宴，热烈欢迎祖国亲人来到唐人街访问。11月25日晚，19个华侨、华人团体又联合举行了近四百人出席的盛大欢迎宴会。州政府的一些部长也出席了。大家频频为这难得的海外聚会而干杯，共祝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12月5日晚，习仲勋在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举行答谢酒会。兰恩总理和夫人，新州政府部长，其他官员和各界人士，当地华侨和華人代表，林平大使和总领事馆官员、中国留学生等，共200多人出席了酒会。习仲勋在酒会上发表讲话，感谢新州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接待，赞颂了中澳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并强调指出今后两州间发展友好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他说：“通过这些日子的访问，我们对新南威尔士州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有深刻的印象，并为此感到高兴。”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我们两省州之间的合作和交流还只是开始，但这第一步做好了，就可以为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合作铺平道路。”<sup>①</sup>习仲勋代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再次邀请兰恩在明年4月率领新州代表团访问广东，兰恩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酒会自始至终充满极为热烈友好的气氛，宾主共叙中澳两国人民的友谊，表示了发展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

澳洲之行使习仲勋看到了很多新鲜事物，也了解了国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先进经验。习仲勋在谈到国外的先进经验时感受颇多，首先是机构设置和工作效率方面，习仲勋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机构很小，人员少，工作开始后没一个闲人。看了他们的计划管理委员会，下边出了乱子才干涉，平时不干涉。这种领导结构值得学习。”再有就是讲求科学精神，重视经济效益，他说：“国外很重视科学精神，各个行业都讲科学、规划、配套，讲求经济效益。农业科研不止是在研究室搞，出成果后立即到农村推广。一件事情没有十分把握不上马。”习仲勋还说到澳洲很重视利用外资，他们实际上也是

<sup>①</sup> 《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回到广州》，《南方日报》，1979年12月13日。



利用外资、外国商人发展起来的，这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广东借鉴学习。<sup>①</sup>访澳之行，习仲勋和代表团成员们开阔了眼界，找到了差距，学习了经验，这些对广东的改革开放都是大有裨益的。

12月6日，代表团结束了为期14天的澳洲之行，告别了美丽的悉尼启程回国。习仲勋同前来送行的伦肖部长和其他澳大利亚朋友和华侨、华人代表，依依惜别。在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过程中，习仲勋在社交场面上充分展示了他外交家的一面，应付自如，极有风度，给代表团其他成员以及澳洲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澳大利亚之行，正如习仲勋所说：“在两省州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大桥，今后双方发展友好合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sup>②</sup>习仲勋的澳大利亚之行为广东和澳洲双方发展友谊，开展经济、文化的合作和交流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1980年4月7日，应广东省省长习仲勋的邀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总理兰恩率领新南威尔士州友好代表团到达广州，对广东省进行友好访问。习仲勋省长，曾定石副省长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欧初，以及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机场热烈欢迎兰恩的到访。当兰恩走下飞机时，等候在舷梯旁的习仲勋，和兰恩亲切拥抱，互致问候，并给兰恩戴上一枚以广东的红棉花和新南威尔士州州花为图案的友好纪念章，表示热烈的欢迎。<sup>③</sup>

兰恩总理这次率领友好代表团的来访，是对1979年11月习仲勋省长率领的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新南威尔士州的回访。4月7日至12日，习仲勋与兰恩就发展两省州友好关系进行会谈，并达成有关协议。

1980年10月25日，应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邀请，广东省副省长刘田夫率领广东省政府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主要任务是由刘田夫与

---

<sup>①</sup> 《省委常委会议决定事项》(第69次会议)：听取习仲勋同志关于访问澳大利亚和顺道访问香港情况汇报，1979年12月17日。

<sup>②</sup> 张汉青：《友好合作前景宽——广东省友好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之二》，《张汉青文集》(上)，第265页。

<sup>③</sup> 《兰恩总理率代表团抵我省访问》，《南方日报》，1980年4月8日。

新州总理兰恩代表双方签订缔结友好省州协议书。习仲勋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兰恩，托刘田夫当面转交给他。信中介绍了刘田夫的情况，并预祝两省州签订友好协议成功。两省州友好协议书经过新州议会通过，他们称之为条约，具有法律效力。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在经济、贸易以及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卫生等方面进行交流和合作，并且成立双边交流委员会，负责具体落实执行。新州对这次缔约十分重视，定这周为中国周。当地新闻媒介增加播发中国的消息，对代表团的的活动也作了详细介绍。双方正式缔结为友好省州后，联系交往更为密切，促进了广东的经济走向多元化、国际化。

## 二、访问香港、澳门

### （一）访问香港

在访澳返粤途中，习仲勋顺道对香港进行了访问。1979年12月6日，习仲勋率领广东友好代表团从新南威尔士返程抵达香港。习仲勋给中央发电报请示：“香港同胞和我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访澳代表团路过香港，是不是顺道进行访问，增进双方的交流和了解？”中央表示同意。于是，习仲勋就率领广东友好代表团对香港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代表团抵港时，港英政治顾问魏德巍、澳大利亚驻香港专员尼可逊等到机场迎接，同去机场迎接的还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王匡等人。

代理港督姬达爵士在12月7日下午约请习仲勋会面，中方在座的有曾定石、马甫和新华分社王匡、李菊生。港方在座的有民政司李福逵、新界政务司钟逸杰、政治顾问魏德巍及助理政治顾问欧义恩。姬达首先对习仲勋在访问澳大利亚后顺道访港表示热烈的欢迎，表示很高兴能和习仲勋会面并对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随后姬达简单介绍了香港当前的经济情况，提出了与广东进行经济合作的一些设想和问题。双方谈到了广东内地居民非法来港问题。港方对广东在堵截外逃人员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十分感谢，问题是数字仍然



很高，故希望中方能尽快设法解决。习仲勋对此重申了我一贯政策。表示对设法刹住外逃潮的问题上，广东与港方是一致的，还强调说明广东省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姬达对习仲勋的答复表示满意和高兴，并再次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在谈到香港与广东经济合作问题时，姬达重申港方乐意在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与广东的经济合作，尽力协助广东的发展。并希望双方经常通过会议的形式相互交流情况和意见。习仲勋对此表示高兴，说广东与香港关系一向密切，理应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双方还就深圳工业区、海路交通运输问题、陆路交通往来问题以及关于我工人来港工作问题谈了双方的一些看法和设想。<sup>①</sup>

姬达最后表示对这次会面很满意，收获很大。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但最重要的是互相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希望双方今后能有更多机会交换意见，更好地合作。习仲勋表示同意姬达的意见，并就港方对他的热情接待再次表示感谢。整个会晤历时两个半小时，气氛坦诚友好。代表团还出席了姬达爵士举行的宴会。姬达和习仲勋先后致了祝酒词。习仲勋在致辞中祝愿正在伦敦治病的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早日恢复健康。

除了与香港官方人士的会晤交流外，在访问香港的过程中，习仲勋还调查了解香港的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市场的需求状况，为广东对外贸易商品的生产找准方向。在访问香港期间，有一天清晨5点30分，习仲勋就起来带领代表团参观九龙长沙湾果菜、塘鱼批发市场，了解香港的市场需求以及我们出口的商品在香港的销售情况。到了市场一看，发现我们的商品和国外以及台湾地区的商品有很大差距。泰国、美国、台湾等地来的东西，包装得很好，用集装箱运到香港。而我们的包装不行，致使很多商品运达香港时很多已经被压坏，造成很大浪费。此外，习仲勋一行还参观了新界、葵涌货柜码头、地下铁路和一些企业单位。港方还安排新界政务司钟逸杰陪同习仲勋乘坐专用

<sup>①</sup> 港澳工委：《习仲勋同志与署理港督姬达会见时所谈内容概要》，1979年12月12日。

直升机巡视了九龙地区，这是香港政府一种非常高的礼遇。

11日下午，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王匡在香港会议中心为广东省友好代表团举行酒会。姬达应邀出席了酒会。香港工商界、文化界人士，港府官员、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的议员，澳大利亚以及一些国家驻港的外交官员和商务专员等共200多人，出席了酒会。酒会气氛热烈，在酒会上，习仲勋对香港新闻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习仲勋在讲话中首先感谢代理港督姬达先生和有关官方人士的友好款待，以及香港各界人士和港九同胞的亲切关怀。在这次访问过程中，习仲勋接触到很多科技专家、工商界朋友、爱国人士，以及港澳同胞。他们都很关心祖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事业，都热切表示愿意为国家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这种爱国热忱深深感动了习仲勋以及代表团的成员。在对香港新闻记者发表的书面谈话中，习仲勋表达了广东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与香港的合作。他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两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和广泛的合作基础。在中英关系不断发展的有利形势下，我深信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合作和其他方面的联系，无疑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sup>①</sup>习仲勋表示：“广东省对于不论是香港有关当局或工商界朋友，不论是华人资本或外国资本进行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和要求，都将尽可能给予支持和满足。不论是在发展能源、交通运输、工商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旅游事业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等方面，我们之间都有着广泛合作的可能性，也都需要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合作。”<sup>②</sup>广东的改革开放正值一个刚起步的阶段，一些投资者对广东的政策和投资环境还持有怀疑的态度。习仲勋这番讲话表明了广东省在稳定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方面的决心，消除了投资者的顾虑，增强了投资者对广东的信心。

广东改革开放之后，与香港的交流逐渐增多，地位也逐渐上升。习仲勋这一次访问香港，礼宾规格很高。在代表团访问香港之

<sup>①</sup> 《在广东省友好代表团顺道访问香港时习仲勋主任向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南方日报》，1979年12月14日。

<sup>②</sup> 《在广东省友好代表团顺道访问香港时习仲勋主任向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南方日报》，1979年12月14日。



前，代理港督从不用中餐请客，这一次破例用中餐，可见对广东代表团领导的尊敬。代表团访港对香港影响很大，密切了同香港的联系，为经济上合作交流创造了条件。同时，代表团广泛接触了各方人士，香港同胞看到祖国亲人也十分高兴。特别是代表团早晨5点30分起来参观香港市场，树立了广东省的领导求真务实，讲求实效的良好形象。12月12日，广东省代表团圆满完成访澳、访港任务，回到广州。

## （二）访问澳门

1980年6月4日至7日，应澳门总督埃吉迪奥将军的邀请，广东省省长习仲勋访问澳门。陪同习仲勋省长到澳门访问的有：广东省副省长梁威林，省计委副主任、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省外办副主任杨可忠，省对外经委副主任王奇，佛山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姚文绪等。

6月4日上午，习仲勋一行8人乘车到达澳门关闸时，受到澳督埃吉迪奥、社会文化司麦启思、保安司江树培等负责官员的欢迎，在场欢迎的还有澳门南光贸易公司负责人柯正平、曾谷，以及知名人士何贤、霍英东、梁培、马万祺等。下午，习仲勋、梁威林拜访了澳门总督埃吉迪奥，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其中包括广



1980年6月，习仲勋（前中）在梁威林（右一）陪同下出访澳门与澳督埃吉迪奥（左一）合影。

东省向澳门供应电力，架设广东到澳门的公路桥，两地的贸易以及如何加强两地今后的联系等问题。习仲勋在和澳门总督的谈话中提到，香港和澳门与珠海是紧挨着的，广东要把珠海办成一个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活动有些特殊政策。在许多地方，珠海要与葡萄牙的国际市场接轨，希望澳门能保持与珠海的联系。另外，他还委婉地表示希望澳门保持同香港的联系，与香港进行很好的经济合作。会谈中，习仲勋所表现的严谨、睿智的风范，给同行的领导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陪同习仲勋访问澳门的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对当时的场面仍记忆犹新：

这次访问之前，我已经去过澳门多次，和葡萄牙驻澳门总督也有过较多联系。访问中我特别留意习仲勋作为一个老领导、政治家，对外事活动会体现怎样的一种风度。我通过观察发现他不仅在对党内部事务处理上十分得体，对外事活动他也很有风度。他说话很得体，不卑不亢。仲勋同志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对国际上的经济动态和信息都很了解。他说：“我了解到，澳门的经济圈与香港的经济圈有着各自的特点和联系。两个经济圈在某些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地方可以合作起来。我们广东省作为临近的地区，在与你们两个经济圈有可以共同出力的地方也希望能多加强合作。”这些话说得很好，澳门总督听了连连点头，说：“能了解到你们的计划和见解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们也当即表示愿意支持珠海的建设，整个会谈的气氛十分融洽。从这次访问中，我感到习仲勋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出色的外交行家。<sup>①</sup>

习仲勋在澳门逗留期间，还会见了澳门各界知名人士，并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发市场，了解了广东省副食品对澳门的供应情况，接触了澳门市政厅的官员，参观了路环发电厂、医院和制衣、毛纺厂，并游览了市容。澳督埃吉迪奥于6日晚在澳督府设宴招待了习仲勋和梁威林等。

<sup>①</sup> 访问吴健民同志谈话记录，2004年7月20日。



6月8日上午，习仲勋一行结束了对澳门的访问，离开澳门回到珠海市。离开澳门时，澳督和一些澳门官员以及知名人士都前往欢送。为期三天的访问，促进了广东与澳门双方信息的交流，为双方今后更好的合作铺下了广阔的道路。

### 三、访问美国

1980年10月20日至11月6日，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以习仲勋为团长、宋平为副团长的中国省长代表团，代表广东、甘肃、四川、辽宁、福建、河北、江苏等7个省，一行19人，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这是中国省长代表团第一次访美，也是对美国两次州长代表团访华的回访。

美方十分重视这次中国省长代表团访美的活动。在华盛顿期间，代表团受到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接见，在纽约、得梅因、丹佛、达勒斯、洛杉矶、檀香山等地会见了各有关州、市的领导人，参观了美国的工农商业、文教、科研、旅游等设施，同各界人士和美籍华裔进行了较广泛的接触。



1980年10月，习仲勋率中国省长代表团访问美国。



习仲勋率领代表团抵达华盛顿时，美国两党竞选正进入最后白热化阶段，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和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仍会见了代表团。布热津斯基在会见中转达了卡特总统的致意。克里斯托弗会见时也转达了卡特总统和马斯基国务卿的致意，表示中美建交是卡特最感自豪的成就，中美友好已成为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代表团还受到了各州级官员的热情接待。在所访问的六个州中，除纽约和德克萨斯州因停留时间很短且未去州首府因而未会见州长外，其余四州的州长均出面会见并设宴招待。加州州长布朗从外地专程前来洛杉矶会见并和代表团共进早餐，曾三次访华的衣阿华州长雷亲往机场迎接代表团，并向全体成员赠送代表团访问该州的照片集，其中附有他签署给每个团员的信。

访美期间，习仲勋率领代表团与美国实业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美国实业界认为，中国在实行权力下放政策后各省将有更大的自主权，因此极力向代表团介绍各自企业和公司情况。德莱塞公司、弗罗尔公司、大通银行、通用汽车公司和怡和洋行子公司都先后与代表团接触，并希望双方成为长期贸易的伙伴。

美国广大民众的热情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习仲勋和代表团成员在美期间曾三次应邀分组到美国若干民间人士家中做客，和他们共度美国的传统节日万圣节和犹太教的休息日。代表团在一些地方乘坐的汽车是私人提供的，这些美国朋友不仅亲自开车，还经常主动耐心地向代表们介绍美国的情况和沿途风光。在华盛顿宇航馆，当美方陪同人员向观众介绍习仲勋等几位省长代表中国七个省的四亿人口时，观众自发地热烈鼓掌。在美国各地外出时，也不时有人主动向代表团招手致意。这些都说明中美友好在美国是有群众基础的。

代表团的访问在华裔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华裔聚居的城市如纽约和檀香山，华人总会和中华总商会都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代表团。从交谈中代表团感到，华裔同胞们虽然已来美定居多年，但都关心国内的情况，衷心希望祖国稳定强盛。有的侨领主动同有关省长约谈，了解国内体制改革的情况；有的华裔妇女当场向省长表示要向侨乡赠送拖拉机，为四化作微薄的贡献。习仲勋等各省省长也利用



这次访问的机会，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四化的基本政策方针和国内建设情况，并积极地在华侨和华裔中宣传祖国统一。

习仲勋为团长的省长代表团在18天的访问中，突出地感到，代表团所接触到的美国朝野各界，从联邦政府高级官员到工商业资本家，从名流学者到普通群众和美籍华裔，都比较普遍地要求坚持和发展中美友好。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加强中美合作对维护世界和平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中美经济贸易往来是双方的共同需要并有广阔的前景。美国各界人士十分关心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要求同有关省份直接建立各种合作关系。华侨和华裔热望祖国日益强大，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1980年11月6日，中国省长代表团结束了对美国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启程回国。通过这次访问，习仲勋等人深刻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以及对继续发展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迫切要求。中美在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问题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尽管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发展生产、改



1980年11月习仲勋（中）和杨尚昆（左一）与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右一）等省委领导人共乘面包车。

善经营管理和培养人才等方面，美国有不少做法和经验可供中国参考和借鉴。这次访问也使代表团成员开阔了眼界，增进了省州之间的了解，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达到了访问的预期目的。<sup>①</sup>

1980年11月15日，广东省委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广州地区党政军和各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访问美国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还传达了中共中央11月9日的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免去他们担任广东省的党内外职务；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sup>②</sup>随后，习仲勋、杨尚昆和任仲夷、刘田夫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了人事安排和其他工作问题。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虽然不到三年时间，但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领导广东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落实各项政策，增强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创办经济特区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

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央指出：

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

<sup>①</sup> 参见中国省长代表团：《中国省长代表团访美总结报告》，1980年11月14日。

<sup>②</sup> 《南方日报》，1980年11月16日。



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sup>①</sup>

---

<sup>①</sup> 《习仲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2年5月31日。

## 习仲勋主政广东大事年表 (1978—1980)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两年零八个月，他坚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和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1978年

4月5日 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省委书记吴南生前往机场迎接。

4月6日 出席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讲话，高度评价省四次党代会形成的意见和成果，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一大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另外，强调要加强学习。在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

4月11日至5月8日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来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在叶剑英视察广东期间，习仲勋向他汇报了到广东工作的初步设想。叶剑英听后，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5月26日 与省委领导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等听取了省军区负责人熊飞、苏克之等向省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省军区整风运动的情况。习仲勋希望省军区继续把整风搞深搞透，做到实事求是。还提出省委要密切同军区的联系，增强团结。

6月20日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关于迅速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和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问题。

6月25日 视察广州市越秀山人防连片工程并作重要指示：“人防工作要搞得更快更好”。还出席了省人防工作会议并讲话，强调广州作为国家南大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人防工作有困难但一定要搞好。

6月初至30日 领导省委常委开展省委整风。对广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分清路线是非，肃清了流毒，统一了思想。在省委整风思想的指导下，省直机关、广州市委、各地委也陆续进行整风。

6月30日 出席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代表省委作总结讲话。要求通过揭批林彪、“四人帮”，弄清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分清路线是非、落实政策、改进作风，把领导班子建设好，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迅速扭转广东工作被动落后的局面。

7月4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并强调要联系教育工作的实际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视和支持办教育，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7月上旬 在省委书记王全国等人陪同下，到宝安视察，指示要落实政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尽快缩小宝安与香港的差距，并强调要建立供应香港的外贸商品基地，引进外资办厂，也可以搞厂外加工。

7月8日 杨应彬传达习仲勋对信访工作的指示：中央、国务院及中央部门转请仲勋同志处理的信件，必须件件落实，处理情况报仲勋同志，必要时报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

7月11日 和省委常委一起听取了统战工作汇报，并对今后统战工作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问题、民族工作、政协工作、党外老知识分子等九个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7月14日 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讲话，部署广州市委整风工作。要求广州市委整风必须以揭批“四人帮”为纲，联系广州实际，弄清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整风要贯彻“敢批、敢揭、坚持实事求是”三条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同时边整边改。

7月18日至24日 在省农委副主任杜瑞芝和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到梅县地区考察了兴宁、梅县、蕉岭、大埔等地。习仲勋根据梅县的实际情况，对梅县抓纲治梅、加强山区建设、大打农业翻身仗作了重要指示。

7月24日至8月4日 到汕头地区检查工作，先后视察了饶平、汕头、南澳、潮安、揭阳、揭西、普宁、潮阳、惠来、陆丰、海丰等县（市），听取了地委、汕头市委和各县县委的汇报。习仲勋强调：汕头地区要抓纲、抓海丰大反彭湃烈士的问题，要注意培养干部，进一



步落实党的政策；农业要上去，同时要根据汕头特点，发展轻工业、加工业，建成外贸出口基地。

8月4日至7日 到惠阳地区宝安、河源、龙川、惠东、惠阳、惠州、博罗等7个县、市进行调查研究。7日，主持召开了惠阳地委和惠阳县、惠州市领导干部座谈会。会上习仲勋总结了这次在梅县、汕头、惠阳三个地区的调研情况，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紧密联系群众，要把农业摆在第一位，打好农业翻身仗等几点要求。

8月12日 听取国家经委调查组关于汕头集体企业产供销情况汇报，肯定了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很好，在插话中强调了汕头地区要重视办好社队企业、注意搞好外贸企业等问题。

8月18日 胡耀邦给省委和习仲勋打来电话，转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一段话：“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些话表达了党中央对习仲勋在广东工作的肯定和巨大支持。

8月21日 看了《内部参考》第85期“辽宁省中医工作调查报告”后批示，指出中医生在“四人帮”横行时深受迫害，要求省卫生局按辽宁卫生局办法作一次深入调查研究，在整风中落实中医生政策，把问题解决好。

8月21日至9月4日 参加省委召开的全省地委书记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错误路线，用整风的精神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决心在较短的时间内扭转广东农业落后被动的局面。

8月23日 听取省财办副主任、省养猪领导小组副组长徐烽关于广东省集体养猪问题的汇报。习仲勋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希望能将报告发给参加全省地委书记会议的同志们传阅。

9月17日 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在广州连续举行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会。和与会者一起，联系广东的实际，用实践标准总结解放后28年来的历史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广东农业问题，并



通过对建国头17年与“文化大革命”10年广东农业发展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清路线是非与政策是非，统一认识，统一步调。

9月18日 出席广州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作了讲话。讲话中回顾了自7月以来广州市委整风的情况，总结经验，提出问题。最后，强调要把整风和工作同时抓起来。

9月19日 出席广东省民兵工作大会并讲话，强调要认清形势，大力加强广东省民兵建设，更好地发挥民兵的作用。

9月20日 《人民日报》以《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加快前进步伐》为题，报道了习仲勋主持广东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的情况。导语说，广东召开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学习会，联系实际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有重要实践意义的问题。

9月24日 在看到《内参》登载的关于广东外事人员给专家教授进行对外学术交流设置障碍一文后作出批示，严厉批评了这个现象，建议找相关部门专门谈一次，严肃规章制度。

10月5日 出席广州市委召开的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对广州市委整风工作谈了几点意见：一是对整风的重要性要有足够认识；二是总结了这次市委整风的收获；三是强调一定要坚决整改。

10月15日 出席暨南大学开学典礼和建校20周年校庆大会并讲话。

10月20日 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人发了一封信，将惠阳地区检察院干部麦子灿给习仲勋的来信、习仲勋的复信及省委书记刘田夫关于接见麦子灿的电话记录发给各地党委讨论。要求各地党委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

10月30日 主持召开第106次省委常委会议，议题是关于成立省旅游工程领导小组和加工装配和技术设备引进领导小组问题；成立省物价局问题；以及研究省直机关整风问题。

11月8日至12月15日 和省委书记王全国、省委常委薛光军参加



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向中央作《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抓纲整风和广东如何大干快上的问题。

12月11日 中共中央通知，任命习仲勋同志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尚昆同志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12月18日至22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2月26日 经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习仲勋个人署名的题为《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文章，以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

## 1979年

1月8日至25日 在广州主持召开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1月9日，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大家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25日，作大会总结发言，强调要把广东农业搞上去，并代表省委对“反地方主义”等11个历史遗留问题谈了看法，提出要解决好一批重大的遗留问题，落实干部政策，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1月20日 参加广东省党、政、军和各界代表隆重举行的悼念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陶铸的仪式。习仲勋在讲话中郑重宣布：林彪、“四人帮”一伙把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许多干部称为“陶铸死党”、“陶赵死党”等诬蔑不实之词，均应推倒。

1月24日至3月17日 先后五次接见“文化大革命”时被错定为反革命集团进行处理的“李一哲事件”的主要成员李正天等人，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帮助他们认识了自己的问题，也指出了省委过去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存在错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2月6日，省委在广州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大会，宣布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

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

2月5日至7日 带领工作组抵达肇庆，听取了肇庆地委的工作汇报，并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希望肇庆各级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

2月9日至17日 在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等陪同下，先后视察了四会、广宁、怀集、封开、郁南、罗定、云浮等县，同正在参加各县三级或四级干部会议的代表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习仲勋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精神，着重指出要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抓好农业，稳定党在农村的政策，发扬民主，关心基层干部。

3月12日 在省委党校县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读书班开学大会上发表讲话，和与会者一起讨论广东当时的形势和问题，一再强调还要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希望与会者按照三中全会文件精神，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

3月15日 省委发出通知，决定由习仲勋兼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

4月2日至3日 主持和参加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的意见，并要求将深圳、珠海、汕头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吸引外商来广东投资办厂。

4月5日至28日 与王全国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习仲勋在会上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试办“贸易合作区”。会议期间，在中南海向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直接汇报，建议将深圳市、珠海市和汕头市办成对外贸易合作区，邓小平表示赞同和支持，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对广东、福建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发展地方经济。

4月21日 省委决定成立省农业委员会。习仲勋兼任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亲自抓农业。

5月4日 与刘田夫、李坚真、吴南生等出席共青团广东省委、共



青团广州市委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习仲勋在讲话中指出，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而指明这条道路并使之成为现实的只有中国共产党。

5月6日 与王德、薛光军、杨应彬等省委、省革委会负责人接见广州地区一批农业专家、教授和科技人员，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首先把农业搞上去。

5月11日至6月6日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两省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向工作组汇报了广东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计划，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决定起草一份文件。20日，再次与谷牧交换了起草文件的意见。

5月14日至6月10日 参加省委在广州召开的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了广东的形势以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强调了要根据中央对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加快广东经济发展以及加强党的领导、搞好党风等问题。

6月1日 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接见了在广州参加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叶剑英对广东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特别强调要认真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广东作为全国的试点，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习仲勋代表与会者表示一定要努力做好工作，以答谢中央领导对广东的关怀和鼓励。

6月6日 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提出实行新体制和试办经济特区的要求。

6月11日 听取省委党校的工作汇报，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学习中联系实际、增强党性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党校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一是对干部进行教育，一是抓党风，希望党校和省委多联系，多配合。

6月20日 与省委常委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与会的有地委常委以及宝安、惠阳、惠东等沿海地区的县委书记。习仲勋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广东省的一件大事，

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

6月23日 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习仲勋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了谈话。叶剑英对广东的工作提出了要解决能源问题，要利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众多的条件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要利用山区的特点加快山区建设等要求。

6月23日至24日 前往深圳、珠海检查偷渡外逃工作，要求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

6月25日 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详细分析了偷渡外逃的特点，偷渡外逃风造成的严重危害性以及造成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和性质，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反偷渡工作。

6月29日 到珠海考察，并在珠海市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珠海由县改市，不是单纯名称的改变，而是要将珠海建成一个特区。

7月5日 《文教动态》第3期转发了省委书记习仲勋对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印发的《当前我省教育事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作的批示，希望各地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力挽广东省教育事业的危机。

7月7日 致电中央报告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的情况，提出对于反偷渡外逃广东省委已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既要抓好围堵外逃人员，也要努力改善广东自身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中央复电肯定了广东前一段反偷渡外逃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同时指出任务仍很艰巨，希望广东继续抓好这项工作。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即中发〔1979〕50号文件）。

8月4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习仲勋等同志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

8月10日至21日 出席省委、省革委会召开的省农田基本建设会



议，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坚持大搞，二要坚持实事求是，三要注意政策。

8月11日至23日 出席省委、省革委会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并讲话。号召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工作上来，解放思想，认真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工业生产搞活，依靠群众切实搞好增产节约运动，并要求各地在县属工业企业中，推广清远县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办法。

8月15日至18日 参加政协广东省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如何进一步发挥政协作用的问题，同时对政协工作和政协的任务提出意见和建议。

9月13日至21日 出席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并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报告会。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和陈云的讲话精神，强调各级党委要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加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在总结发言中，习仲勋号召大家巩固和不断发展大好形势，把农村工作向前推进一步，特别要注意加强党的领导。

9月22日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习仲勋等省委领导人，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谈话。谷牧指出：广东的对外经济活动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小脚女子小步起不了这个作用……不只是两个特区，而且全省都要很快搞上去。

1979年秋 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视察中山温泉建设现场。

10月24日 在省委召开的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和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精神，重点强调了基本建设、调整经济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合理利用外资等问题。

11月5日至9日 出席省委邀请本省农业专家、教授在从化温泉宾馆召开的座谈会，商讨如何加快广东省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问题。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必须把农业科学技术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上，从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搞好农业科研工作，加强党对农业科研工作

的领导。

11月22日至12月6日 带领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进行了友好访问，广东省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结成友好省州。

12月6日至12日 率领广东友好代表团在访澳返粤途中，顺道对香港进行了为期6天的访问。参观了九龙、新界，葵涌货箱码头，果菜、塘鱼批发市场，地下铁路和一些企业单位。12月7日下午，习仲勋与代理港督姬达会面，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1日下午，对香港新闻记者发表了书面谈话。

12月15日至27日 出席在广州举行的政协广东省四届二次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精神，动员、团结全省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实行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加快广东省国民经济发展，为打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一战役而努力贡献力量。

12月16日 出席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预备会议，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动员全省人民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搞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扩大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打好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

12月17日至26日 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隆重举行，习仲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提出了今后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并强调要抓好大力发展农业，发展轻纺工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业，积极试办经济特区等几项重要工作。大会决定设立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并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改为广东省人民政府，选举习仲勋为省长。

## 1980年

1月8日 省委决定，习仲勋不再兼任省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



任职务；省委书记王德兼任农业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

1月17日 在中国科学院综考会阎铁关于鼎湖山自然保护区问题的信上作出批示：“一切按去年省革委会文件办，凡超出此范围的旅游建筑一律暂停。”

1月21日 致信罗兰士嘉道理先生，提出广东茂名、海南油母页岩资源丰富，欢迎罗兰士嘉道理派出专家组进行考察，并和广东省经济工作委员会及电力局、石油化工局探讨合作开发、利用的可能性。

1月25日 出席省委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省、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报告，并围绕这个报告谈了三点意见：一是报告极为重要，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二是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满怀信心地搞四化；三是坚决贯彻中央50号文件，紧紧抓住调整这个中心环节，继续把经济搞活，加快广东省经济发展步伐。

1月29日至2月5日 出席省委在广州召开的地委书记会议，重点研究农业问题。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从广东的特点出发，把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同对内调整国民经济和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结合起来。继续把经济搞活，加快本省经济发展步伐。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3月17日至23日 参加省委四届二次全会，作关于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在闭幕会上，强调要紧紧密结合广东省的实际，贯彻五中全会精神，调整、充实领导核心，整顿党风党纪，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3月21日至31日 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传达、学习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加强科技工作的问题，提出广东省要着重抓好农业、能源、轻纺工业和新技术等四个方面的科技工作。习



仲勋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广东省科技工作的报告。

3月24日至30日 与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等广东省党政领导人参加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这次会议检查总结中央1979年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指示贯彻执行情况，进一步研究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

4月1日 与宋志英、谢非、李海东及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讨论有关社会动态问题，希望大家努力维持好社会的稳定。

4月18日至20日 到南海县调研，询问了县委新班子选举的情况和代表们对县委工作报告的意见，参观了平洲的一家电子塑料玩具厂，找新产生的县委委员座谈，勉励大家跟群众打成一片，使南海在全省各县中做到先走一步。

4月27日至5月17日 陪同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海南、梅县等地。在梅县习仲勋作了讲话，指出叶帅对梅县工作的指示很中肯也很重要，非常切合梅县地区工作的实际，对全广东省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梅县同志们搞好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团结，共同努力建设梅县。

5月14日至27日 参加省农村工作会议并作总结讲话，深入地分析了全省农村的形势，提出了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指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使农村尽快富裕起来，同时强调要加强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 and 党对农业的领导。

5月24日 收到港澳工委来电。港督麦理浩委托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简悦强转送一封信给习省长，希望习仲勋考虑能否接见简悦强。

5月下旬至6月上旬 前往海南行政区检查工作，就加强场社之间的团结，制止乱砍滥伐林木歪风、加快海南区的经济建设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6月4日至7日 到澳门进行友好访问，会见了澳门各界知名人士，并到蔬菜、水果和家禽批发市场，了解了广东省副食品对澳门的供应情况，接触了澳门市政厅的官员，参观了路环发电厂、医院和制衣、毛纺厂，并游览了市容。



6月10日至21日 参加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工交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工作会议,并于19日和21日发表讲话,分析了广东当时的形势,号召大家继续解放思想,进一步把经济搞活,强调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另外要注意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6月25日 中共中央致电广东省委,建议增补习仲勋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请广东省委按照法律手续,于近期内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补选,选举结果报告中央。

7月5日至15日 到韶关地区调查研究,先后考察了清远、阳山、乳源、韶关、仁化、佛冈等地。习仲勋此行主要是了解清远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情况,总结推广清远的经验。

7月29日至8月8日 参加省委在广州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利用中央给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有利条件,加快广东省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步伐等问题。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抓紧工业生产,大力推动联合;搞活流通渠道和外贸;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抓好计划生育;抓好党风和改进工作作风。

8月1日 出席广州解放纪念像揭幕仪式,缅怀革命先烈,同时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3周年。习仲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纪念像是一座纪念碑,是军民团结共同战斗的象征,同时又是号召书,激励广州人民为实现四化宏伟事业继续努力奋斗。

8月5日 出席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总结了广东省教育工作的成就和问题,指出了广东省教育工作的形势,并介绍了当时省委关于拨乱反正和发展工农业的情况,强调要切实抓好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

8月12日至18日 主持召开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批转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会议。会议通过认真讨论,对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解决场社纠纷,支持海南岛经济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问题作出重要决定。

8月23日 接见省、市纪委处以上干部,座谈纪检工作问题。认真听取了干部们对省委提出的意见,希望与会者有什么困难就提出

来，便于省委了解情况，进一步搞好纪检工作。

8月27日至9月2日 到受强台风袭击的灾区——湛江市郊和徐闻、海康、遂溪等县考察，了解当地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的情况，看望受灾社员群众，同各级干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下一步发展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等问题。

9月23日 港澳工委致电习仲勋，转达港英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的港督麦理浩希望赴穗会见习仲勋的要求。麦理浩希望能够和习仲勋会面，共同商谈关于反偷渡外逃以及粤港经济合作等问题。

9月23日至24日 与杨尚昆、刘田夫等赴京向中共中央作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如何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办好经济特区问题与习仲勋等人进行了讨论，9月28日形成了《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明确指出了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目的和要求。

10月3日 听取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王越丰关于海南问题的汇报。对汇报的情况表示同意，并强调要先把场社纠纷停止下来，另外要注意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10月11日 参加全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讨论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后广东该如何发展，一定要统一思想、鼓足干劲，把措施拿出来；要立志改革，办好特区；贯彻中央75号文件，搞好农村工作；高度重视抗腐蚀问题。

10月20日至11月6日 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习仲勋为团长的中国省长代表团，代表广东、甘肃等7个省，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8天的友好访问。访美期间，习仲勋率领省长代表团与美国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华裔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5日 广东省委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广州地区党政军和各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大会。习仲勋在会上作了访问美国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中央工作；任仲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习仲勋

主政广东

12月26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电，同意广东省委意见，习仲勋仍参加广东省出席十二大代表的选举，作为中央分配到广东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

## 后 记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编写在《习仲勋传》（广东部分）编委会领导下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委副书记刘玉浦，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后改任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肖志恒十分关心本书的编写和修改。省委副书记蔡东士主持本书的编写工作。张德江还为本书作序。

本书主要依据广东省档案馆保存的习仲勋主政广东时的文稿、讲话和谈话记录；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文件和有关的会议记录。还根据《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等报刊资料；有关书籍和资料。同时，还访问了与习仲勋有过直接接触的任仲夷、林若、吴南生、焦林义、郭荣昌、朱森林、王全国、杜瑞芝、方苞、曾定石、张汉青、吴健民等一大批当时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的老领导、老同志。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口述、文字和图片资料。杨应彬、梁广大以及广州、中山、梅州、汕头、东莞、肇庆、云浮、河源、揭阳、湛江等市委办公厅（室）或党史研究室，为编写组提供了习仲勋有关资料以及视察当地情况材料。广东省档案馆张凌、南方日报社范向群、广东电视台刘仁玉等为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做了部分资料的收集工作。

本书分别由卢荻（负责第一、二、四、七、九、十章）、陈宪宇（负责第五、八、十一章）、周珺（负责第三、六、十二章）编写。周珺和省委办公厅陈江帆合写了习仲勋主政广东大事年表。卢荻对全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并负责定稿。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俊凤审定了全部书稿，并作了



一些修改。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汉青，习仲勋夫人齐心，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谭一鸣，广东省档案局（馆）副局（馆）长张平安，习仲勋原任秘书和有关人员范民新、张志功、俞惠煜、贾延岩、陈茂田、夏蒙等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

对于上述领导以及有关同志的关怀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根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撰写，力求翔实可靠。但由于书中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广，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2007年3月